

加强党的建设 永葆先进风采

为跨越发展、崛起腾飞提供坚强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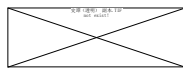
※ 本刊评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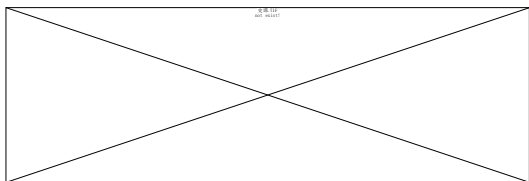
2007年是我市跨越发展的大突破之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只有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承担起跨越发展的组织领导责任;才能统一全市思想,振奋干部群众精神,凝聚跨越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才能强化各级组织,提升干部队伍,打牢跨越发展的组织基础;才能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清廉形象,创造有利于跨越发展的党风政风环境。

一要突出先进性建设抓党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新的历史时期,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紧密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紧密结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必须始终抓住党员队伍这个主体。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增强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意识,激发其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重点在于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整体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要强化管党责任抓党建。党要管党。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断强化“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切实抓住党建工作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不撒手,紧紧扣住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松劲,牢牢扭住党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不放松,确保思想到位、力度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要坚持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做到目标双定、任务双下、工作双抓、奖惩双挂、成果双要。要严格落实党要管党责任制,各级党组织“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党建分管领导要直接承担组织领导责任,党务部门要专职专抓,其他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党务部门牵头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的党建工作格局。

三要紧扣跨越发展抓党建。跨越发展是市委着眼连云港洼地崛起、提速赶超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市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全市的工作大局,是全市上下举力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党建工作只有围绕跨越发展这个主题,才能有依托,才能有方向,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各级党务部门要把推动跨越发展作为党建工作的第一要务和第一航标,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意识,切实找准在跨越发展中的坐标点,切实找准服务跨越发展的着力点,切实找准党建工作与跨越发展相互促进的结合点,多为跨越发展出凝聚力、出向心力、出生产力,多为跨越发展搭班子、配干部、选人才,多为跨越发展塑清风、树形象、造环境,坚定不移地作跨越发展的支持者、服务者、推动者。





2007年第3期 总第51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连云港史谭》编委会

主 任 李 东
副 主 任 孙长贵
董 忠
陆瑞萍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洪景 王运良

王 滨 时明安

邱仕明 张亚平

姜龙才 耿学贵

李 军 戴义春

主 编 李 东

副 主 编 孙长贵

董 忠(常务)

陆瑞萍

责 任 编 辑 邱仕明

李仕红

张伟敏

文 字 总 校 张骏鹏

刊 名 题 字 吴加庆

目 录

卷首语

1 加强党的建设 永葆先进风采 为跨越发展、崛起腾飞提供坚强保证
本刊评论员

特 载

4 小平同志与连云港的不解之缘
胡柳君 董丽霞文, 张晓晖图

纪念连云港市地方党组织建立80周年专栏

6 忠勇为党, 彪炳千秋
王秋艳
——记原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烈士

8 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党组织建立 80 周年大事要览
本刊编辑部

9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海属地区党的组织序列
本刊编辑部

史志人

10 用心修志, 以情著书
秋明
——访新浦区政协原副主席、《新浦区志》、《新浦年鉴》主编韩世泳

峥嵘岁月

12 连云港 1937, 抗日烈焰初燎原
时明安

14 抗战烽火映红的童年
杨书范讲述 徐进整理

17 他, 见证周法乾的灭亡
李自见
——访在京离休干部曹石亭将军

史志研究

20 浅论年鉴如何更好地成为志书基础资料
何惠明

23 试述志书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
张定国 王君敏

26 地方志网站建设的三个方面
谭 浩

往事追忆

27 我市举办的第一次花果山书会
夏兴仁

史海钩沉

29 从一张 50 年前的老照片看连云港渔业一段辉煌的历史
张明亮



31 抗战初期海属地区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宋继奎

《西游记》文化研究专栏

33 “淮海”释地 李洪甫

36 2006年《西游记》研究述略 苗怀明

37 金苏大涧与《西游记》 蒋金明

历史考证

40 李桢考(续) 李正耀

史志小知识

42 港城历史名人(九) 本刊编辑部

43 中国共产党名称和建党方案的最早提出

43 板浦曾经“城”建制 俞政海

史志信息

44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来我市调研 连史宣

44 我市开展系列活动隆重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 连史宣

45 我市组织业务骨干参加全省地方志专业人员业务培训 连史宣

45 东海县委党史工办编纂出版纪念安峰山事件60周年文集 东海县委党史工办 王文岩供稿

45 新浦区地志办深入基层督察《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及二轮修志进展情况 新浦区地志办 徐一德供稿

风物览胜

46 卧游太白涧 张树庄

史海探秘

47 中共党史上的书记处 李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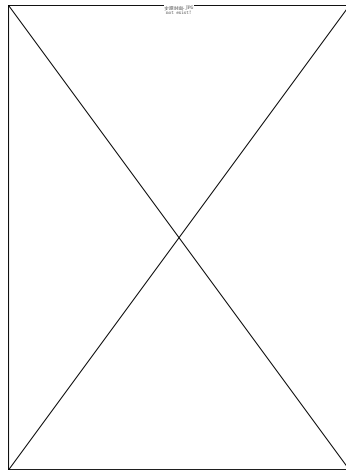
四封说明

封面:2007年5月26日省委书记李源潮来连云港调研考察(摄影:张晓晖)

封二:新浦区同和社区

封三: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活动剪影

封底:作品欣赏穆家善《二君敲诗图》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关注热点服务决策

地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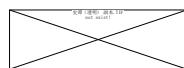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电话:(0518)5825137 5804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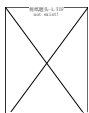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传真:(0518)5802365

印刷:连云港市市级机关印刷厂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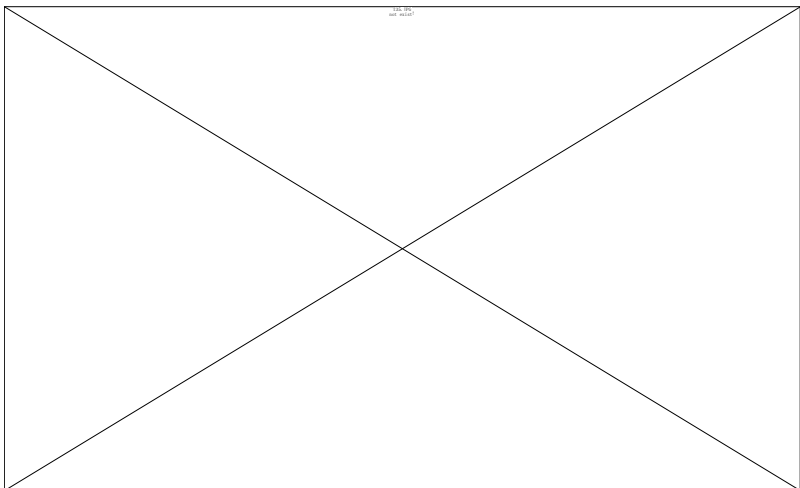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07年6月





小平同志与港城的不解之缘

※ 胡柳君 董丽霞 文 张晓晖图



[伟人与连云港]

邓小平与连云港的不解之缘

59年前(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小平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指挥了东起连云港西至河南商丘的淮海战役,书写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23年前(1984年3月),得益于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连云港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与四个经济特区在沿海形成我国从北到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10年前(1997年3月),小平同志的骨灰从连云港撒向大海。最后告别仪式在连云港市民航机场举行。新华社长篇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中写到:“……穿云破雾,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2007年6月15日,“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群雕落成揭幕。群雕背依青山、面向大海,接近小平同志骨灰撒放海域,最能体现小平同志亲手掀起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壮阔波澜,最能体现一代伟人大海般广阔的胸怀,象征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和伟人精神与山海同在、与日月同辉。

[家人喜欢群雕]

“父亲还跟我们一起,
他还跟人民在一起”

6月14日,小平长女邓林、小女邓榕携子女专程



2007年6月15日上午。中国,连云港,连岛,菠萝山。

红绸揭起,小平神采奕奕地站在知识分子、劳动者、军人、青年和儿童中间,面朝大海,微笑中透着自信与坚毅——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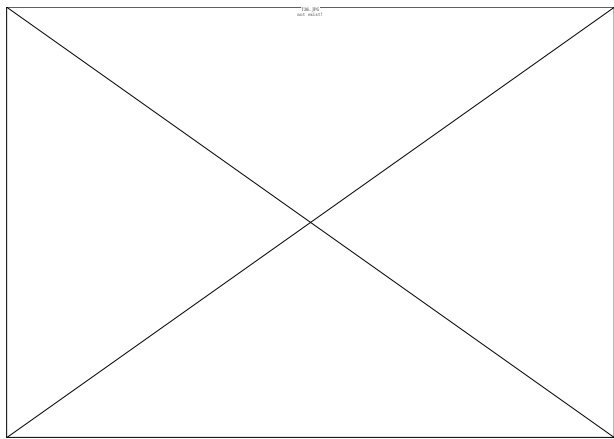
连云港人面朝大海庄严承诺:继续践行小平同志的开放理论,抢抓新一轮开放机遇。按照中央和省委对连云港的新定位、新要求,尽快将连云港建设成为国际性的海滨城市、现代化的港口工业城市、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

赶来参加雕像揭幕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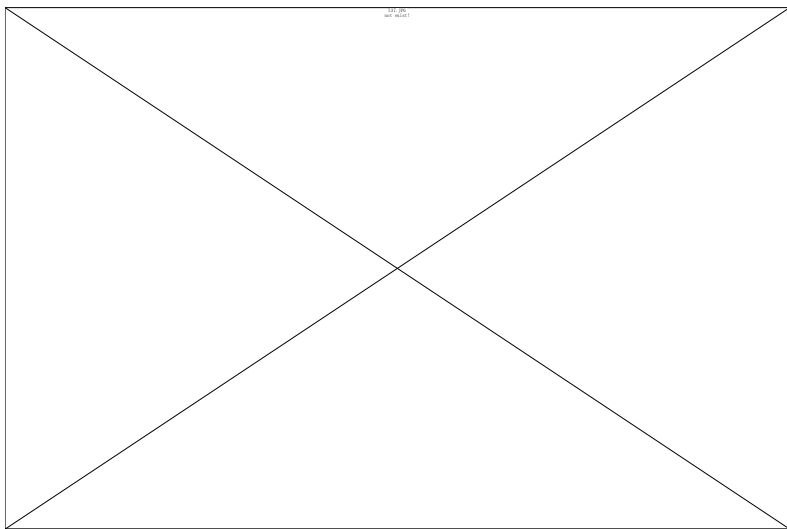
1997年3月2日,遵循小平同志的遗愿,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卓琳等小平同志的亲属,乘坐飞机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将小平同志的骨灰撒入连云港东部附近海域。

10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邓林、邓榕及其子女们激动万分,感慨万千。他们围绕雕塑环绕一周,仔细端详父亲的塑像。

揭幕仪式结束后,邓榕心情很激动,她告诉记者:“十年前,父亲从连云港起飞,走向大海,他热爱大海,他喜欢在海里面游泳,最后在他过世之前,他曾经留下遗言,把他的骨灰撒向大海,我们尊重他的遗愿。从连云港出发,他拥抱了大海。十年后,我们到这里来揭幕他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雕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很感动,看见这个雕塑,我觉得父亲还跟我们一起,就跟他这个雕塑体现的意义一样,他还跟人民在一起。”



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采访邓榕



邓小平家人参观邓小平图片展

在回答香港媒体提问时,邓榕说:“父亲曾说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香港回归了10年,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年的发展,现在的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个已经为世人所承认,为世界所承认,国外媒体就这点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作为邓小平的家属,我们为香港、为香港的发展感到骄傲。”

[港城大地的承诺]

跨越发展崛起腾飞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市委书记王建华在致辞中说,“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群雕及公园的建成,是连云港“跨越发展、崛起腾飞”征程中的一件大事。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连云港以重要的战略区位,日益明显的港口岸线、产业用地、电力供应、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等比较优势,以及正在创造的呈几何变量的商机和低廉的投资成本,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条件,全市对各类经济要素、各种人流物流的凝聚力、吸引力明显增强。温家宝总理今年元旦亲临连云港视察并将连云港摆上国家战略层面来定位,要求连云港成为连接沿海地带包括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以及浙江、福建的一个中间环节,成为陇海线经济发展与沿海经济发展相沟通的一个纽带。江苏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连云港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举全省之力振兴连云港,将连云港建设成为振兴苏北的龙头、全省开放的新增长极和全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经济枢纽。总理的视察与指示,省委常委会的研究与部署,更是给连云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和扩大开放的广阔空间。

处于跨越发展、崛起腾飞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践行小平同志的开放理论,抢抓新一轮开放机遇,把开放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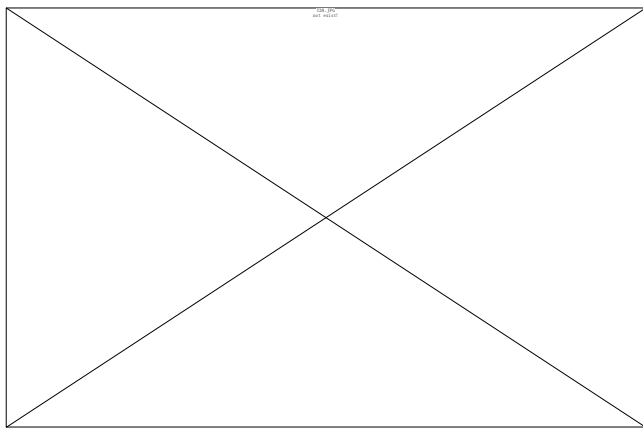
略作为全市的首要战略,全面开放,全方位开放,加快汇聚各种发展要素和优质资源,主动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全力构筑“一体两翼”的组合大港、“一心三极”的国际性海滨城市、一纵一横的“T”型产业走廊,按照中央和省委对连云港的新定位、新要求,尽快将连云港建设成为国际性的海滨城市、现代化的港口工业城市、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努力承担起东部沿海连接南北、沟通东西重要经济枢纽的历史重任。

新闻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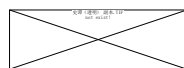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群雕

群雕公园位于连岛东端的菠萝山上,公园核心区域总面积5万平方米,占地5万平方米,总投资3100万元。项目具体包括“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群雕、配套绿园、亮化设施、背景音乐、景观道路改造等。园内绿树掩映,芳草萋萋,青石和木质的台阶,把游客从环岛公路旁引领到菠萝山上的“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的群雕前,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群雕背依青山,面向大海,群雕人物形象由邓小平和知识分子、劳动者、军人、青年、儿童组成。群雕采用优质铜材铸造,总重量六吨,群雕底座为红色花岗岩,长八点五米,宽四点六五米,正面为45度斜面,其他三面均为93度。底座正面刻着“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雕塑名称,背面题刻着邓小平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群雕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李象群精心创作而成。自然生态的优美环境与纯朴、厚重的群雕浑然一体,成为连岛一个新的亮点。

(转自《苍梧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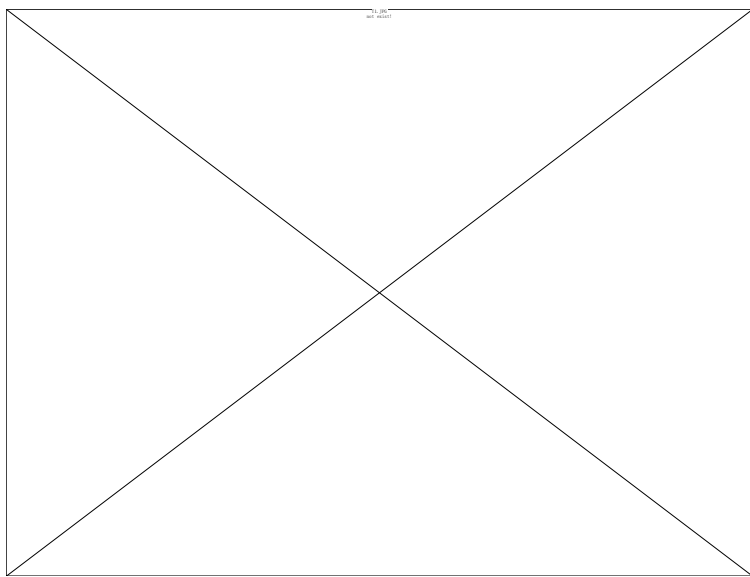
日新月异的连云港东部城区



忠勇为党，彪炳千秋

——记原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烈士

※ 王秋艳



图为由30多公斤子弹壳熔炼而成的符竹庭铜像

创建滨海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任115师教导2旅政委的符竹庭率领部队由鲁南进入滨海，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日寇正在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敌将赣榆县伪军两千多人编成“剿共军”三个团，安设的据点有青口、城里、海头、兴庄、下口、寺后、大沟南、大沙河、墩尚、李城等处。为了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和“以战养战”的计划，符竹庭、曾国华率教导2旅，在山纵2旅的配合下发起青口战役。由符竹庭、曾国华、孙继先、江华等组成前线指挥部，实施战役指挥。

符竹庭认真分析了敌我的形势，果断作出决定，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突袭的战术，乘敌不备，

发起青口战役，夺取战斗的胜利。战斗的第一步，消灭青口外围据点之敌，相机袭入青口；第二步进逼东海，控制陇海路北地区。参战部队分为三路纵队，一纵队主攻青口，二纵队解决青口以南各据点，三纵队在青口、县城之间活动，打击增援部队。

3月19日晚，在符竹庭的指挥下，一纵进攻海头，揭开了青口战役的序幕。各路勇士英勇奋战，至23日，连克海头、兴庄、寺后、大沟南等据点，25日下午10时，各线同时动作，展开总攻，突击队迅速占领敌人仓库，大批军用物资被我缴获。

在对张城、李城的进攻中，符竹庭指示向守敌进行政治喊话，瓦解了守敌的防御力量，张城伪军三百多人缴械投降，李城二百余伪军一部投降，一部企图突围，被我军俘获。敌人正在青口东面的出海口下口装运数万斤粮食，亦被我军缴获。

在符竹庭的指挥下，青口战役大获全胜，攻克敌伪海头、兴庄、李城、张城、寺后、大沟南等据点，毙敌伪200余人，俘虏伪军800余人，缴获大炮3门，步枪800余支，驳壳枪40余支，毁汽车2辆，缴获子弹和军用品无数。

青口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寇，敌军龟缩到青口、县城、大沙河三个据点，陇海路以北地方大部分为我军控制，成为抗日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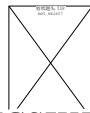
赣榆县巍峨的抗日山烈士陵园内，一座灰色花岗岩砌成的六角形墓令人注目。墓碑前挺立的铜质烈士头像，气宇轩昂，光彩照人。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原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

符竹庭（1912—1943），江西广昌县头陂乡曹家边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红军，并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团主任。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调任八路军115师686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1938年10月，符竹庭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与肖华（司令员兼政委）一道率部挺进敌后，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底调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15师343旅政治部主任。1940年冬任115师教导2旅政委兼中共鲁南区委书记。1941年率部进入滨海地区。

在赣榆一带，符竹庭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他身经百战，忠勇果敢，富有指挥天才，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每一次著名战斗都与他的名字连缀在一起。罗荣桓评价他是“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很有能力的优秀干部”。





据地。打破了敌人的海上封锁,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胶东、华中等地的联系,控制了大片盐滩,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创造了条件。赣榆县委遵照中央指示,大量发展党员,到1942年底全县共有党员1014人,分布在170个村庄。从此,赣榆县党组织的建设,抗日政权的建设,群众运动的发展,以及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开展大生产运动

滨海平原原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盛产鱼盐、粮食、花生,是个经济富庶之地。可是在日寇蹂躏、生灵涂炭之中,民不聊生,部队军需供应日趋困难,只得用黑豆、豆饼、地瓜秧和糝子为主食,服装与武器装备更为匮乏。

符竹庭和旅长等领导商量后,在全旅指战员中开展了一场“认清当前形势,坚定抗战信心,搞好生产运动”的思想教育。他多次召集干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各团检查指导思想教育开展情况。符竹庭带领干部深入调查研究,认识到滨海开展大生产运动大有可为。他充满信心地带着大家干了起来。全旅从旅、团首长到每个战士,个个劲头十足地参加开荒、种地、养猪、晒盐、运盐、办作坊等劳动。符竹庭组织各团、营、连、排之间开展竞赛,进行评优选模活动,用先进典型激发指战员参加大生产的热情。全旅涌现出许多像四团李传有式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1941年,符竹庭、萧华等领导率教导2旅,在柘汪开辟了甘南、林南、柘东、大洋沟四处盐田534亩。在符竹庭的号召下,沿海群众纷纷整修新开盐田,到1942年底,赣榆县盐池达到2000多亩。晒盐、运盐,成为部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他选派得力的干部,办起了油坊、粉坊、被服厂、皮革厂、兵工厂等,鼓励指战员们学着纺线、织毛衣、织袜子。自办的兵工厂土法上马,从生产子弹、手榴弹发展到生产“八二”迫击炮弹。他指导有关干部学会做生意,有计划地与青岛、上海等地进行海上贸易,用当地的土特产换回部队急需的钢材、西药等物资。

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同时,一个勤俭节约的高潮也开展起来了。符竹庭开会号召大家补衣补鞋,一身棉衣穿两年,一点东西不浪费。他亲自规定办公用纸要用三次,先用铅笔后用毛笔;信封也要用两次。为了发展根据地的土布生产,符竹庭要求各团一律穿土布,自己带头穿,膝盖破了打了补丁也照样穿。由于符竹庭等旅领导言传身教,全体指战员都更自觉地勤俭节约,从一点一滴做起。

符竹庭认真钻研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常抽空穿便衣到农村调查,他的笔记本随身不离,随问随记,他问得又细,有时地方干部具体情况没掌握,就会被“考”住。他还多次召集滩户、商人、士绅开座谈会,虚心请教,判明情况,大胆地取缔了“盐槽子”,调整了税收比率,既保护了广大滩户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又增加了根据地的税务收入。他提议滨海根据地通用北海票,从而稳定了金融,促进了贸易发展。他提议并经研究决定,滨海区建立区工商管理,各分区建立工商管理分局,各大集镇建立工商管理所,这在整个山东地区都是抓得很早很有成效的,对打击不法奸商、活跃市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符竹庭等同志组织领导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滨海抗日根据地在抗战

相持阶段最艰苦的1941年和1942年,不仅没被日伪“蚕食”掉,相反,她物资充盈,物价稳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繁荣兴旺,生活改善。她成为人民心中的明灯和希望所在,吸引着敌占区人民。1943年春季,由敌占区逃来滨海根据地安家的各阶层人士和普通群众就达五万以上,不少外逃地主也重返乡里。

赣榆因他而改名

1943年3月,115师奉命改编,取消师、旅番号,实行一元化领导,军队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符竹庭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11月,为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他和陈士榘发动并亲自指挥了赣榆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的赣榆,是敌军“扫荡”与“蚕食”我滨海根据地沿海地区的前哨阵地,由伪军第七十一旅李亚藩部共2000余人驻守。1943年11月,日寇集结两万多重兵,对我鲁中和清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伪军旅长李亚藩,奉日寇上村密令,伺机“扫荡”滨海,企图打通海州到青岛的沿海公路,策应日军对鲁中和清河区的“扫荡”。为粉碎敌人的阴谋,符竹庭与陈士榘分析敌情后,决定利用其内部矛盾,争取伪军一部为内应,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攻克赣榆城,歼灭李亚藩旅。11月19日晚9时30分,我军内线带领化装成伪军的突击队员以催给养之名返城,当被争取过来的守城伪军打开城门后,进入城内。接着符竹庭指挥主攻部队迅速突入城内展开激烈的进攻。伪军141团团团长黄胜春被我军争取,不予抵抗。我军集中兵力打击伪旅部和另1团。在猛烈的军事打击下,符竹庭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李亚藩写了两次劝降信,并发动干部战士喊话,瓦解敌人军心,李亚藩于20日上午率部投降,赣榆城宣告解放。

赣榆战役由于我军对敌工作深入细致,里应外合奏效,军事打击出敌不意,政治攻势配合密切,仅以牺牲3人、伤37人的微小代价,获得了全歼伪七十一旅两个团和伪保安总队、盐警总队2000余人的战果,并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机枪8挺、掷弹筒40余门、战马30匹、汽车2辆及其它战利品。由符竹庭政委指挥的赣榆战役,是抗战中我军敌军工作的一朵奇葩,而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册。

赣榆战役后,敌军开始报复扫荡。11月26日晨,新浦、青口之敌600多人,偷袭滨海军区机关驻地——赣榆县西北方向的巨头村。符竹庭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1岁。

符竹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军政兼优的杰出的八路军青年将领,滨海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他果敢刚毅,历经百战,机动灵活,富有指挥天才;对于政治工作,经验丰富,颇有建树;对于财经生产,他虚心钻研,领导有方。他在滨海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也是滨海党政军民的重大损失。滨海军民为了永远铭记符竹庭将军的功勋,在抗日山为他修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六角亭式的石墓,熔炼30多公斤子弹壳为他铸了一尊铜像,陵墓周围的石壁上,镌刻着悼念碑文。为纪念和缅怀符竹庭将军,赣榆人民创作了题为《纪念符竹庭》的颂歌,至今还在传唱着。1945年,在他牺牲2周年之际,山东省人民政府将赣榆县更名为符庭县,直到1950年恢复原县名。

(作者单位:赣榆县史志办)



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党组织建立 80 周年大事要览 (1946—1949)

※ 本刊编辑部

1946 年

1 月 国民党军第六路军司令郝鹏举在台儿庄率部起义,编为中国民主联军(后为华中民主联军),司令郝鹏举。

2 月 东陇海铁路东起白塔埠西至大许家正式通车。

3 月 8 日 蒋介石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求退还被解放的淮北盐场,遭拒绝。

3 月 中共滨海地委决定重新成立中共海州市委和海州市政府。

5 月 灌云县开展土改运动。

5 月 中共新浦地下党发动新浦、海州、南城等地近万名灾民于 16 日爆发了索粮斗争,同大批荷枪实弹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了搏斗,迫使当局停止发粮,进行复查。南城灾民千余人将灌云县领回的 6 车粮食一抢而光。

6 月 26 日 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

7 月 竹庭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9 月 中华救济总署名誉主席宋庆龄借运送救济物资的登陆艇,从苏北盐垦公司堆沟坨地装运淮盐 3 万担至上海兑换法币 13 亿元,由做地下工作的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送中共南京办事处,受到周恩来嘉奖。

9 月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决定,滨海地委于 10 月 3 日成立国军工作部,部长华诚一;10 月成立国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谷牧。

11 月 中共淮北盐特委在陈家港成立,杜李任特委书记。淮北盐务管理局同时成立,孙笃生任局长。

12 月 竹庭县在大体完成土改任务后又转入动员参军工作。1 日就有 3000 多名青年参军。

1947 年

1 月 4 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海防委员会、海防司令部,山东省政府同时成立了海防办事处。

1 月 国民党商巡总队第 3 支队侵占了灌云重镇大伊山以及下车、大柴市、同兴、大纪圩、丁圩等乡镇,灌西也遭到“扫荡”。

1 月 华中民主联军司令郝鹏举叛变,被蒋介石委任为第 42 集团军司令兼鲁南绥靖区司令。郝叛变后疯狂进攻解放区,袭击我东海县政府。2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 2 纵在白塔埠地区发起讨郝战役,至 7 日黄昏战斗结束,歼灭了郝部两个师及集团军司令部,计 5000 余人,生俘郝鹏举。

2 月 国民党商巡总队的三个大队合击灌云县政府机关。县府机关、县大队及杨集、陈楼、东辛、同兴、四队等区的干部、民兵、群众转移到大兴沟时,被敌包围。血战一天,晚上突出包围,撤到潮河南。

2 月 2 日 高广珍爆炸大队炸死向路北东海县进犯之敌 18 人,炸死炸伤战马各两匹,受到滨海武委会和军分区传令嘉奖。15 日山东军区也嘉奖了高广珍大队,并记集体特等功一次。

2 月 北撤山东的沭阳、灌云、东海(路南)、宿迁等县及专

直机关干部,在 20 日返回淮海区途经安峰山时,遭国民党军第 28 师合击,近千人牺牲、被俘、失踪,大批枪支、文件丢失。

2 月 竹庭县组成支前总队,下辖五个大队,共 9120 人,每个大队 120 副担架,于中旬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转战 3 个多月,有 7336 人立了功。6 月 12 日滨海支前司令部授予“钢铁担架队”光荣称号,劳模董力生被评为担架英雄。4 月 22 日又组成常备担架队,共 9216 人,1669 副担架。

3 月 中共淮北盐特委创办盐务干部学校。至 1950 年 5 月,共举办 7 期,培训干部近 2000 人。

5 月 敌商巡总队和盐警大队趁敌第 44 师向盐阜“扫荡”之机,纠集 3000 余人和 20 条海船,向盐特委机关驻地陈家港逼进。25 日新四军主动撤出陈家港采取“坚持新滩,游击灌东”方针。

7 月 竹庭县常备担架队,10 日由金山出发,随华东野战军转占鲁、冀、晋、豫四省 37 个县,历时 4 个多月,于 11 月 2 日凯旋,县委、县政府为担架队召开了庆功大会,宣读了滨海专署的贺信。

8 月 中共灌云县委城工部发动云台山区数千名群众向地主开展借粮斗争。从地主手中“借”粮上万斤。

9 月 敌突袭驻小姜庄的中共路南东海县房山区委机关,区委委员仲佩森等 10 人当场牺牲,区委书记徐祥甫等 18 人被捕,除 2 人保释外,徐祥甫等 16 人惨遭杀害。

10 月 17 日 竹庭县芦阳、金山、吴山 3 个区首批青年 3200 人参加主力部队。到 25 日其他 5 个区又有 5000 多名青年参军。至月底,全县共有 9986 名青年参军。

12 月 华中行政办事处于 16 日决定淮北盐务管理局与五地委的泰山公司合并组成两淮盐务管理局,局长孙笃生。中共淮北盐特委根据华中工委指示,更名为中共两淮盐特委,书记杜李。

1948 年

春 路北东海县、竹庭县以及淮北盐场特区普遍开展“三查三整”运动。

4 月 收复陈家港。后又经两次反复,终于 8 月 31 日最后收复陈家港。

5 月 路北东海县独立营,扩编为滨海军分区独立团。

6 月 14 日 苏北兵团 2 纵第 6 师一举攻克新海外围敌重要据点墩尚,歼敌第 44 师第 484 团第 3 营。至此,竹庭县全境解放。至月底基本扫清新海外围的据点。

6 月 21、22 日 苏北兵团 12 纵 35 旅配合地方武装攻克房山、上坊、新坝、平明、城头、高流、龙苴、大伊山等 13 处据点,击毙国民党江苏省第八专署上校保安大队长周法乾以下 200 余人,俘虏 1200 余人。至此,陇海铁路东段、沭新公路以东、通榆公路以西,南北 70 余里地区宣告解放。灌云县委、县政府迁到大伊山办公。

10 月 竹庭县组成万人小车队(编为滨海第二小车队),支援淮海战役。





11月6日 淮海战役打响。

11月 新海连地区地下党为迎接解放积极动员组织群众保护自来水厂、电厂、磷矿及连云港机务段机车。

11月 灌云县、淮北盐场及新海连地区分别于6日至9日全境解放。9日,成立新海连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谷牧任主任,中共新海工委和新海办事处随之撤销。

11月 灌云县于17日成立了支前总队,支援淮海战役。路北东海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组织三个大车团,支援淮海战役。

11月 鲁中南行署转山东省政府命令,成立新海连特区专员公署,李云鹤任专员。下辖新海市、连云港市、云台办事处。

12月12日 新海连特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共新海连特委,隶属中共鲁中南区党委,谷牧任特委书记。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于中旬成立,司令胡定千,政委谷牧。

12月 新海连特区废除国民党保甲制,普遍建立了基层民主政权。

12月 东海独立团和新海公安大队在云台山区进行了

多次剿匪斗争。

1949年

1月 新海电厂开始发电。

2月 中共淮北盐特委创办《盐务工作》,并成立新华社淮北盐场支社。同时,成立新华社新海连支社。

3月 国民党海军“黄安”舰于13日起义,抵达连云港。

4月 国民党空军伞兵第3团于15日乘坦克登陆舰起义,抵达连云港。

4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海连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5月 路南东海和潼阳两县于25日撤销,两县所辖地区分别划归灌云县、沭阳县和新安县(今新沂市)。

5月 国民党军第123军第334师师长(原商巡总队总队长)徐继泰,在上海市真如镇被擒获。1950年1月被处决。

8月 新海连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中共新海连特委和专署紧急动员,组织党政军民3万余人奋战3天2夜抗洪救灾。

9月 新海连特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6日至18日在新浦召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海属地区党的组织序列

※ 本刊编辑部

中共东海组织(一说小组,一说支部)1927年秋至1928年

9月,隶属中共江苏省委。

负责人(一说书记)顾浚泉(又名顾恩远)

中共板浦小组(1928年春-秋)

负责人 李静山(又名李玉堂)

中共赣榆县欢墩小学支部(1928.9-12)

负责人 陈亨州(1928.9-12)

张春范(又名张瑞甫 1928.10-12)

中共东海特别支部(1928年秋-12)

书记 李超时

隶属中共江苏省委。辖:

中共东海中学支部(1928.8-12)

书记 吕镇中

中共板浦支部(1928年秋-12)

书记 宋沛然

中共郁圩支部(1928年秋-12)

书记 张淦清

中共白塔埠小学支部(1928年秋-12)

书记 孙鲁轩

中共板浦乡村师范学校小组(1928.10-1929.5)隶属淮(安)

涟(水)县委

负责人 宋沛然(1928.10-1929.2)

武同儒(1929.2-5)

中共东海县委(1929.1-5)

书记 李超时

隶属徐海蚌特委,辖:

中共灌云县委(1929.4-6)

书记 朱士吉

中共东海中心县委(1929.5-1930.11)

书记 李超时(1929.5-7)

黄惠荣(1929.8-12)

贾从香(1930.1-7)

蒋 培(1930.8-11)

隶属徐海蚌特委,辖:

中共灌云县委(1929.5-1930.11)

书记 朱士吉(1929.5-7)

宋沛然(1929年秋-11)

管作霖(1929.11-1930.8)

孟祥祯(1930年秋-11)

中共赣榆县总支部(1929.底-1930.4)

书记 卢伯玉(1929年底-1930.4)

中共白塔区委(1929.3-1930.12)

书记 冯硕仁(任离职具体时间不明)

冯寿华(任离职具体时间不明)

张兆谦(任离职具体时间不明)

中共房山区委(1929.6-1930.12)

书记 尹振球(1929.6-1930.12)

中共大村区委(1929.3-1930.12)

书记(缺资料)

中共南区区委(1929年夏-11)

书记 李守栋

中共东海(海州)特委(1930.12-1933.5)

书记 朱秋白(1930.12-1932.6)

曹 甦(1932.7-1933.5)

隶属江南省委(1931年1月后为中共江苏省委)。辖:

中共灌云县委(1930.12-1933年夏)

书记 孟祥祯(1930.12-1931.7)

张开基(1931年秋-冬)

孔昭明(代理,1931年冬-1932.4)

管海萍(1932.4-19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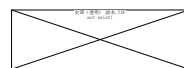
冯家驹(1933.2-1933夏)

中共沭阳县委(略)

中共郯城县委(略)

中共大浦码头支部(1930.11-)

书记 孔兆朗(1930.11-)



用心修志,以情著书

——访新浦区政协原副主席、《新浦区志》、《新浦年鉴》主编韩世泳

※ 秋 明

韩世泳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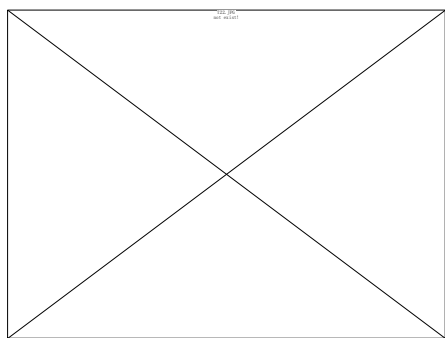
新浦,是我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浦成陆至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了解新浦的发展历史,可以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战略中心东移,建设国际性海滨城市的战略构想上来。《新浦区志》真实地记载了新浦的形成、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连云港市中心城区从形成走向兴盛的历史教科书。日前,我们走访了新浦区政协原副主席、《新浦区志》、《新浦年鉴》主编韩世泳。

个人档案

韩世泳,连云港市海州人。1937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曾先后就读于海州中学、东海师范(后改称海州师范)。师范毕业后,任教于新海连市陈港中学。1958 年至 1973 年 1 月,任《连云港报》(《连云港日报》前身)社记者。1973 年 1 月起,历任中共海州区委宣传科干事,海州区政府副区长,新海区政府副区长,中共新浦区委常委、新浦区政府常务副区长。1990 年,任政协新浦区委员会副主席,1998 年 6 月退休。现为连云港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连云港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新浦区志》、《新浦年鉴》主编。

钟情地史 倾力调研 编纂出版《新浦文史资料》

1990 年,韩世泳同志任政协新浦区委员会副主席。为了



《新浦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六辑)

充分发挥政协的职能,进一步了解新浦区的历史文化和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从中探索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征集、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韩世泳同志上任伊始的第一课题。为了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韩世泳同志徒步深入老街小巷调查,走访了许多“老新浦”,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亲自撰写稿件,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先后以“新浦兴盛百年研讨会专辑”、“新浦区政协成立十周年专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等为题,编辑出版了《新浦文史资料》一至五辑。1998 年 6 月退休后,应区政协领导之邀,他又编纂《新浦文史资料》“纪念新浦解放五十周年专辑”(第六辑)。

《新浦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六辑)的编纂出版,为日后开展的首轮《新浦区志》的编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热爱故乡 用心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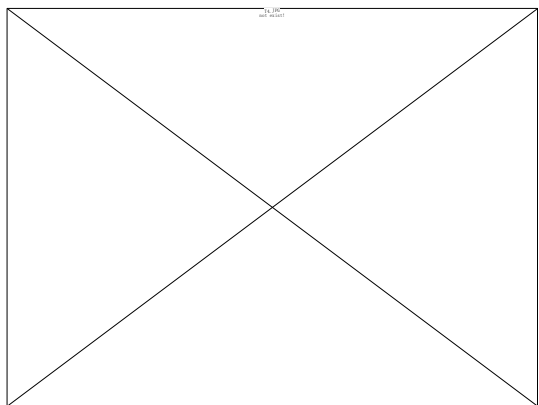
圆满完成首轮《新浦区志》编纂出版任务

1990 年 7 月 13 日,新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政协新浦区委员会副主席的韩世泳同志任编委会副主任。其后的 1992 年 3 月、1993 年 10 月、1996 年 6 月的三次编委会成员调整,很多同志因为工作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只有韩世泳同志一直任新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98 年 6 月,韩世泳同志正式退休。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韩老,政务倥偬,本想着退休以后,可以在家颐养天年,过上安静的晚年生活。没想到退休在家不到一个星期,新浦区的领导亲自登门,邀请他再度“出山”,主持编修《新浦区志》的工作。怀着对新浦这块土地的热爱,怀着对地方文史事业的深情,韩老重新披挂上马,担任《新浦区志》主编。“我是土生土长的海州城人,对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我同样热爱仅有 200 多年发展史的新兴城市新浦。因为自 1958 年春至今,我基本上都工作与生活于新浦,目睹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新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韩老如是说。

首轮《新浦区志》的编修工作,始于 1990 年。至 1996 年,





《新浦区志》、《新浦年鉴》

初稿基本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初稿评审后,《新浦区志》的编纂工作被搁置了下来。韩世泳正式接手后,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他首先从搭班子、建队伍入手。重新充实了修志队伍,由从市委统战部退下来的周志明、曾编修过《新浦区教育志》的徐一德、张绍民等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班子。班子组建后,他们对原志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原稿的基础上,对篇章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新浦区志》,重点要反映新浦之‘兴’,真实记录新浦‘兴起’的过程。因此,《新浦区志》的编纂要以商贸为重点,而商贸的发展,必然对文化、教育等产生重大影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商贸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谈到首轮《新浦区志》的编修,韩老目光矍烁,神采飞扬,如数家珍。在他的主持下,他们果断地把商贸篇调前,加以突出、强化,对文化、教育事业加大记述力度。

指导思想明确,结构调整完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充实内容。韩老和几位老同志一道开始了繁重而细琐的资料搜集和查找工作。新浦区档案馆由于建馆时间较短,很多资料根本就没有收存。他们就到市档案馆及市公安局、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查找。他们顶寒风,冒酷暑,不辞辛劳,忘我地工作着。为了弄清新浦形成、发展过程,韩老反复研读《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知州唐仲冕撰写的《甲子河记》等资料,两次骑自行车到海州东门外,沿甲子河旧河道进行考察,查阅新浦、海州老地图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撰写了题为《从古海州志辨新浦之初四疑》的论文,为记述新浦的历史,提供了资料。

为了弄清民国及解放之初的相关情况,他们深入市档案馆不下10余次,终于从民国年间的有关档案和地方报纸的广告上,发现了新浦商贸发展的雏形。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他们查到了1947年东海县同业公会的花名册,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浦解放之初商贸业的状况。为了弄清新浦第一家皂厂——大同皂厂的情况,和韩老在一起的徐老走访了很多老人,终于得知海州有亲戚家尚存大同皂厂生产的连云皂木质包装箱。他便骑自行车赶往海州,将木箱取回。韩老见了如获至宝,又是清洗、拍照,又是笔录资料。作为一个新兴的商贸集镇,门牌号码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为了寻找新浦的“老门牌”,韩老他们在七八月间,冒着三十七八度的高温,走街串巷,寻访失落的“城市记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搜集到了10来块大小不一的“老门牌”。谈到这个,韩老激动

地说:“当时我们几个老头,在一户人家的门上发现了老式的本质门牌,在征得户主同意的情况下,用锤子、钳子撬了好半天,终于被撬了下来。由于年代久远,门牌上落满了灰尘,把我们几个老头子弄得满脸是灰,但我们还是非常高兴。”韩老说着,专门把他的“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虽然年代久远,但门牌的木质还很坚硬,都是杉木制的,最早的一块门牌是新浦解放初期新海连特区新海市政府制作的。

在韩老的主持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倾注了他们心血的《新浦区志》终于在2000年11月7日,新浦解放纪念日举行了首发式,圆满地完成了首轮《新浦区志》的编纂任务。在2001年举行的省第三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中,《新浦区志》被评为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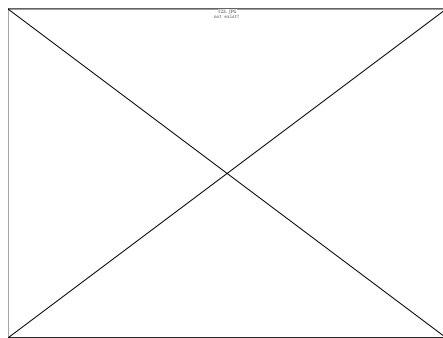
老骥伏枥 以情著书

反映新浦区及我市地情的系列书籍相继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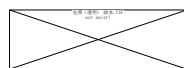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在圆满完成首轮《新浦区志》的编纂出版任务后,为了给修志工作积累资料,全国地方志系统先后开始了年鉴的编修工作。韩老又带领一班人,从篇目和框架结构入手,开始了《新浦年鉴》的编纂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2001年,首部《新浦年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发行,成为介绍新浦区情,扩大新浦区影响,提升新浦区美誉度的又一靓丽名片,是市各县区中第二家出版年鉴的县区。6年来,一辑辑散发出油墨香味的《新浦年鉴》相继在韩老一班人手中付梓面世。其中《新浦年鉴(2004)》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二等奖,《新浦年鉴(2005)》获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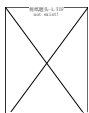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多年来,韩老忘情于地史研究,利用余暇,读书著述。他善于积累,勤于动笔。十余年修志编鉴经历,十余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地情资料。饱含了对家乡对热土的爱,一本本充满了浓厚乡土气息的地情著作相继面世。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新浦史话》,正在准备出版的《连云港方志》以及他参与编著的《连云港碑刻大观》无不倾注了韩老的心血。由银河出版社出版的《海州方言》在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评比中获地情类书籍二等奖。

目前,韩老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一轮修志的伟大实践中。像韩老这样的地方志工作者,全市史志系统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忘我工作,用心修志,以情著书。有这样一支队伍,我市的地方志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新浦史话》、《海州方言》





连云港 1937,抗日烈焰初燎原

※ 时明安

编者按:今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70年前,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愿做亡国奴的连云港地区人民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因早期党组织被破坏而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勇立潮头,多方联络进步青年、仁人志士,奔走呼号,迅速点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烈火。谨以此文,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对华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后,即以30万兵力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犯上海。由于连云港地处陇海铁路起点,是距离日本本土较近的海陆交通枢纽,为此,日本海军于9月13日就侵占了连云港附近的车牛山岛,并在连云港海面集结多艘战舰,企图以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使连云港成为日军的重要补给通道。

日本空军为配合海军的登陆作战,于1937年9月17日出动数架飞机,首次轰炸连云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州,炸毁东海师范部分校舍和多处民房,炸死居民2人。9月20日至23日,日军连续出动10多架次飞机和数艘军舰同时袭击连云港港口,港口设施悉遭破坏。铁路专用线被炸断,仓库被炸塌,火车脱轨,车厢被焚,使车站、码头、港口陷于瘫痪。此后,连云港地区的新浦、青口、城头、欢墩埠、石桥、白石头、墩尚、小道口、小东关、沙河、柘汪、九里、黑林、板浦、大伊山、新安镇等城镇都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狂妄滥炸,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迅即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立即得到全中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拥护。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从而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愿做亡国奴的连云港地区人民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因早期党组织被破坏而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勇立潮头,多方联络进步青年、仁人志士,奔走呼号,迅速点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烈火。

当年夏天,东海县早期共产党员周晓江、郇华民、李铁民等人联络了一二十名进步青年,聚在一起阅读革命书籍,收听电台广播,讨论国家大事,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抗日救亡,并将这种聚会称之“时事座谈会”。在聚会座谈中,他们都迫切希望建立较紧密的抗日组织,以便拿起武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效仿“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做法,于9月在郇圩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义勇团”,推选周晓江等为领导,不久,在郇圩、房山一带发展了五六十人。义勇团成员自觉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方针,分头活动,到处串联,争取各界人士一道抗日,足迹遍及白塔埠、小兴庄、丰墩、桑墟、竹墩、高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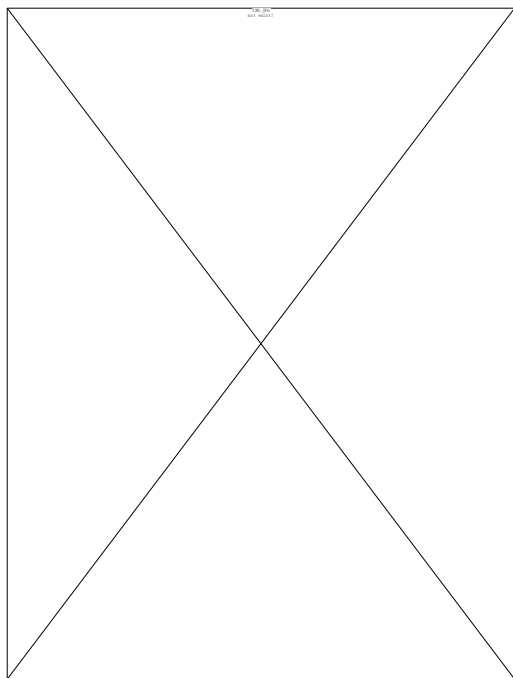
乡镇,使抗日之火在东海人民心中熊熊地燃烧起来。

与此同时,一批被捕获释的早期共产党人也纷纷返回家乡,联络进步青年投身抗日斗争。灌云县的早期共产党员孙海光、孙存楼、孙若溪、厉国桢等人在出狱后四处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孙存楼到灌云县城板浦动员孙笃生卖掉汽车公司,购买武器回灌三区组建抗日游击队,并在张湾(今灌南境内)发起成立了以团结各方进步力量、推动东灌沭一带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抗日团体——“腊九社”,有教师、学生、农民、地方民主人士几十人参加。孙海光组织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灌云县抗日救亡巡回宣传团”;孙若溪、厉国桢等人则在灌云县孙河口办起了附设初中补习班的孙家渡小学,紧密结合抗日救亡宣传开展教学工作,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些外地青年也来到连云港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12月,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第二队的陈飞、冯国柱、孟东波、吴建、俞铭璜等二十余人到达响水口,应灌云县抗日青年的挽留,在当地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及演唱《流亡三部曲》等,并分组到农村去宣传抗日。嗣后,宣传队的吴建、陈飞、冯国柱被留下在响水口、上马台、汤沟等地做抗日宣传工作,成为连云港地区中共党组织重建后的第一批党员,并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骨干,陈飞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赣榆县的早期共产党人陶君彦等也以在墩尚小学任教为掩护,组织了“青救团”、“醒民剧团”,发动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组织的形成和发展。1937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为保卫南京和武汉,决定以徐州为中心设立第5战区,李宗仁任司令长官。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做李宗仁的工作,使李宗仁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共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李宗仁在徐州发布了主张坚持抗战的《约法七章》,11月底成立第5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并邀请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担任动员委员会委员,中共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组织部总干事。连云港地区各县随即建



日机轰炸后的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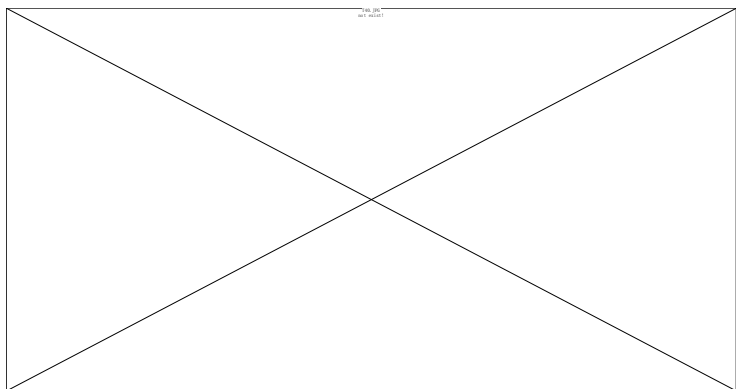
立了县、区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参加了各级动员委员会的工作。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一方面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促使各级动委会聘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利用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的有利条件,先后向各县动委会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动委会指导员,其中向赣榆县动委会派出了共产党员于化祺担任指导员,张树仁等人任委员。第5战区派到赣榆县的动委会成员还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发表演说,演出节目,号召民众振奋民族士气,救亡图存。第5战区还向东海派出由共产党员孟宪禹、阎西珍等人组成的工作团。他们到郇圩找到周晓江、郇华民、李铁民等人,共同分析时局,讨论东海的抗日工作。周晓江等人提出首先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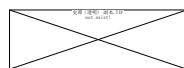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宣传队,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后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打算,得到了工作团的赞成和支持。在工作团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就组织起“东海县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全县进行巡回演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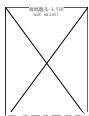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下半年,由于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早期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努力,连云港地区的抗日烽火迅速成为燎原烈焰,燃遍城乡,为此后重建中共党组织和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连云港地区的革命斗争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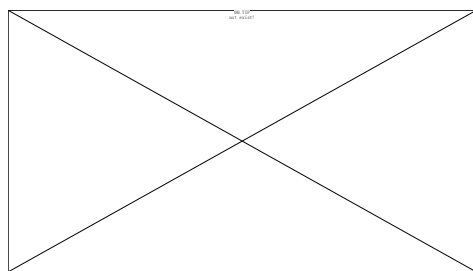


救亡怒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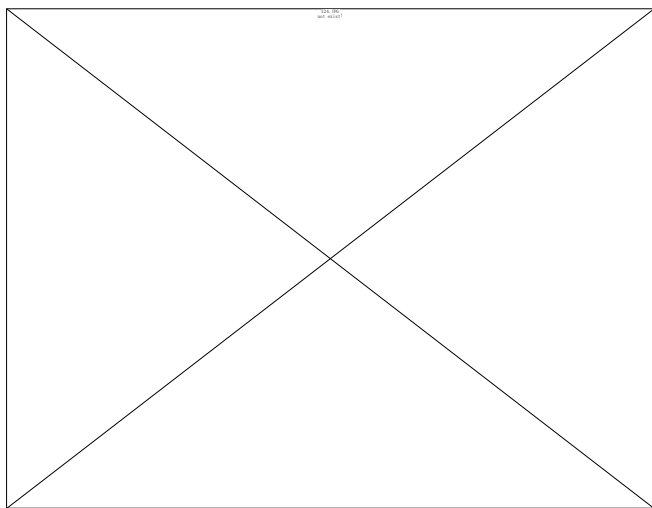


抗战



映红的童年

※ 杨书范讲述 徐进整理



誓死不当亡国奴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莒县长岭镇杨家下庄村，那里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日本侵略者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沦陷区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3年初，我大哥奉肖华（时任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命令打入“莫旅”做地下工作。“莫旅”为抗战期间，莒县人民对莫正民所辖部队的简称。莫正民是莒县人，贫苦人家出身，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员王东年共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正民任旅长。不久他脱离高树勋部队，在日军的逼迫下当了伪军。那时我大哥的身份不能公开，村里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家冷言冷语，说我大哥杨书森到莫旅就是当汉奸、当土匪。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家不能向外界说明真相，为此我家在那个年代里受尽了磨难。我父亲当时是村里的农会主席，他时常向我讲述大哥杨书森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革命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誓死也不能当亡国奴，一定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决心，由此我产生了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

1943年3月滨海军区成立，陈士榘任司令员，符竹庭任政治委员。当时滨海地区范围南起现在的连云港陇海铁路，北

2007年5月，笔者有幸与杨书范老人相识，向他了解60多年前他的童年生活。通过杨老的讲述，一个多世纪前旧中国儿童所面临的生活苦难，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杨书范，男，1935年8月生于山东省莒县，1948年12月从江苏省赣榆县入伍。曾任陆军149医院副政委，1991年3月离休，2004年12月按国家政策规定移交地方，目前在连云港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休养。





至山东半岛的胶济铁路,东滨黄海,西界沂河,地形长方,由东北斜向西南,东西约400华里,南北约600华里。其中贯通着沂河、沭河,交杂着台维、海清、日苕等数条大公路干线。那时,因为对敌斗争的需要我家成了滨海军区的一个地下交通站。虽然我年龄小,但我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经常要求父亲给我布置任务。有一次,一名负责敌后工作的谷大叔领着几个人在我家开会,让我在村东头放哨,如有鬼子汉奸来,就赶快跑回家报信,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会后,一位叫老丁的大哥建议说:“现在敌我斗争残酷,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杨书森同志小弟送到抗小上学为好。”没几天,我父亲就带着一封滨海军区敌工科的介绍信把我作为一名战士送到了革命干部抗日子弟小学,那年我刚满8岁。

抗小生活淬火成钢

抗小是由滨海行署办的,校长和老师都是由解放区的政府干部担任,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抗小因受战争环境影响,学校无固定的校址,学校随中共滨海区党政、军事机关而动,曾一度在滨海区的莒县、莒南县、赣榆县、临沭县一带办学。我们这些同学都是革命干部及烈士子弟,享受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吃穿及生活用品都是由根据地政府供给。我们的生活实行与部队相同的军事化编制,大一点的同学每年分期分批送到根据地政府和部队中去,每当送去一批,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同学总是急得不得了。所以每去一批,老师总是教育我们安心学习,等学好文化,长大了再到前线去。

在抗小学习,不但学习了文化知识,也使我懂得了穷人为何穷,富人是怎样富起来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穷人怎样才能翻身得解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侵略中国等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革命道理,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我们除了上政治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进行军事学习,我们背扛着木棍,有的还扛着红缨枪,感到很神气。我从小性格活泼,好动,要强,还参加了抗小组织的合唱队,曾在莒县垛庄、大店、小店等村庄演出。为提高我们学生的抗病能力,保证我们身体健康,学校定期组织打防疫针。我第一次打防疫针时,当看到医生拧着针管,针头很长,我吓跑了,一天多没回学校,老师急得不得了。由于我没有打防疫针,在一个深夜里,我病了,并且高烧得厉害,烧得迷迷糊糊,老师拿被子把我包起来,和老乡用一个木轮车子将我送到了莒南县延滨镇镇海三所,经诊断得天花病。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下,我不久便痊愈出院了。接着我们学校又流行腮腺炎,同学中大部分染上了这种病,坏人乘机放风说这是学校破庙砸神,激怒了玉帝得到的惩罚。后来不少村里的孩子也得了腮腺炎,学校的医生在给我们治疗的同时,还帮助村民们防治这种病,很快病就治好了,那种迷信谣言不攻自破,老乡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迷信思想,相信科学和共产党的领导了。

当敌人扫荡时,为避免我们跑散,走失,老师给我们每一个同学的衣角上缝入写着我们名字和盖着学校印章的纸条,以便当地村干部群众护送返校。由于敌人的扫荡,环境愈来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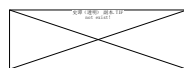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恶劣。虽然政府部队以及老乡们的日子十分困难,但是政府还是想方设法保证我们学生的供给,学校领导尽量想办法使我们吃得好,穿得暖,使我们这些革命火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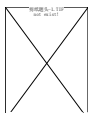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1944年的春天,我八路军老六团在薛家垛庄的东南岭上与从富城来扫荡的鬼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抗小大一点的学生跟着庞老师和乡亲们一起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虽然冒着枪林弹雨,但毫不惧怕,因为有老六团在。当时解放区都这样讲:“老六团呱呱叫,毛主席亲手缔造。”当战斗捷报传到学校,我们这些小同学就坐不住了,大家纷纷讨论,战斗结束后,庞老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当庞老师他们回来时,大家欢呼着争着去迎接,庞老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弹壳,我们都别提有多高兴了。但当我看到从战场上抬回来的牺牲的战士时,真想立刻扛起枪上战场和日本鬼子拼一下。后来解放战争全面打响,1948年我由抗小入伍走向了人民解放战场,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浴血奋战、努力奋斗。

坐穿牢底也决不当叛徒

1944年夏,日寇垂死挣扎,他们一边负隅顽抗,一边更疯狂地向我解放区根据地大肆掠夺粮食、物资,人民群众恨死了日本强盗和汉奸。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粮食埋在地下藏起来,一粒米,一点物资也不留给他们,用“坚壁清野”对抗“三光政策”。因我母亲得了痲病,我便从抗小请假回家照顾母亲。一个晚上,我还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大海,日本鬼子来了,快到西园躲起来。”我和父亲刚一出村,因为我中弹,我和父亲都被捕了。另外一同被抓的还有村上的李斗、辛子贵等十几个群众,我们被敌人驱赶着连夜押到莒县城东献借庄村,那里驻扎着敌人伪军的一个团。敌人把我们关押到一个南屋几间破草房里,里面潮湿得很,散发着酸臭的气味。牢门天天锁着,牢房里一片黑暗,我们被允许每天放风半个小时,只能在那半小时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见点阳光。我们牢房里铺着一点麦秸草,时值盛夏酷暑,铺草爬出了一些蛆虫。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活。我腰上的伤口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化了脓,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伤口才愈合。直到今天,我腰部的枪伤还明显存在。

抓我们的是日伪汉奸董效仁的部队,他们是臭名昭著、凶残狡诈的家伙,落到他们手里,大家都很担心,我猜想自己可能要死在这牢房里了。一天拂晓,大队长刘廷贵和一个外号叫张黑子的,手拿电筒,一个个地照我们。他们俩在那里嘀咕着明天杀这个,后天杀那个。当时我想,杀头是个什么滋味,心里很悲伤,我这么小就要死在狱中,但我又想起大哥杨书森,他当红军,当八路军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是我崇拜的偶像,他现正进行策划莫旅起义的秘密工作,我想要是大哥能带部队来救我们就好了。一想到这里,在贴着父亲的耳边说:“我大哥会不会来救我们?”“父亲听后,赶紧掩住我的嘴,悄声说”千万不能叫敌人知道你大哥是八路,也不能说出你在抗小学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就连我们的命也难保。”我牢记父亲的叮嘱,暗暗的下决心,就是将牢底坐穿也不能当叛徒,就是死也不能





暴露大哥的身份!

不久,可怕的事情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天清晨,两个汉奸把我父亲带走了。审讯的地方离我们的牢房不远,就听见他们叫:“你家有没有当八路的?”然后是皮带的抽打声、叫骂声、威吓声以及呻吟声,都清清楚楚地传过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父亲便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但是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更激起了我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一天下午,不到放风时间,审问又开始了。还是那两个狗汉奸,把我和另一个叫小兴的小孩一起带到敌人的炮楼下。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我一看又是那个可恶的汉奸大队长刘连贵,他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大刀。见到我后二话没讲,举刀便将一根木垛子一劈两段,接着他又把雪亮的大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用恶狠狠的口气对我吼:“小东西,我问你什么,你要老实地讲。你刚才看这刀快吧,你要不说真话,就砍下你的脑袋!”然后,他逼问我村里谁家有当八路的,村里有多少民兵,有多少杆枪。当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牢记父亲的叮咛,心想我死就死,可绝不能泄露我们的机密,不然我和父亲及大哥就没命了。于是,我就坚决的回答:“不知道!”然后我就知道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村的真实情况,我就编着谎话回答道:“我大哥看树行子,二哥种地,我在家放驴。”敌人审来审去,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以后敌人几次提审,我的回答都一样,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后来敌人看在我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也就不提审我了。

我在牢狱期间,耳闻目睹了许多事实,数十天的时间,使我从一个没有斗争经验的孩子逐渐地了解抗战的艰难,敌人的凶狠锻炼了我的意志。有一次,天快黑了,我还在睡觉,两个汉奸押着一个身穿八路军服的人闯进我们的牢房。那个人自称是老六团的一名指导员,在横山作战时被敌人俘虏。由于他是八路军,我就很亲近他,他就教我唱《你是灯塔》、《密云笼罩着海洋》、《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当他问我是什么村的,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等情况时,父亲就把话题引开或用脚踢我,我才没有向他讲真实情况。后来敌人提审他几次,但他身上从没见过伤痕,却见敌人给他的生活待遇忽然变了,我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又黑又硬的煎饼,却给他送来又白又好的馒头,另外还有菜给他吃。我问他:“怎么给你这么好的东西吃?”他没有理睬我。没过几天,他被敌人提审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一天我突然从门缝里看见了那个人,然而他身上的八路军服装却换成了汉奸服,还背着匣子枪。我想这家伙肯定是投降了敌人,或许他以前本来就是汉奸是扮成八路来骗我们的情报。我一面在心里狠狠地咒骂他,一面又为自己没有向他说出我大哥也当八路和我在抗小学习的事而庆幸不已。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很熟,忽然一个站岗的看守一边喊叫一边拍打着牢门,将我从梦中惊醒。牢门开了,我看到看守那张凶狠的面容,他叫喊着:“刚才,谁说话了?说了什么?快说!说!”敌人端着刺刀划过每一个人的脸庞。父亲和其他的几个

人忙回答:“老总,我们没讲什么,只是做梦讲的梦话。”敌人嘟囔着走了出去。此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后来才明白,同村一个叫李斗的人做梦时叫我父亲:“四叔,快给我两个手榴弹,鬼子汉奸来了……”好险,要是真的叫看守听清楚了,那么势必会引起很多麻烦事。

有一天下午,一个看守把牢门打开,他小声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讲话了,今天鬼子打了败仗,马上就回来,你们可不要讲话、更不能咬耳朵,如果鬼子知道了,他们要拿你们出气,就要枪杀你们”。过了一会就听见马的嘶叫声,我从门缝中一看,果然见小鬼子头子骑着大洋马腰中挂着大刀,后面跟着一群小鬼子,满身是泥,很狼狈,一看就知道是打了败仗。看他们那个熊样子,我心中很高兴,心想:老四团、老六团你们要狠狠地打小鬼子,给我们报仇!每逢八路军打了胜仗,我们总是偷偷地唱“老六四,呱呱叫,毛主席亲手缔造,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加谁光荣”等革命歌曲来鼓舞我们的斗志。

在黑暗的牢狱中,我整整过了6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中午,突然牢门打开了,敌人把我和父亲带了出来,并对我们说:“你们俩,可以滚了”。这时我内心非常高兴,这难道是真的吗?因为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多日不见太阳,乍见阳光,我的眼睛就是睁不开。只能眯缝着眼睛,赤着脚,跟在父亲后面,走了好几里路才恢复过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是党组织得知杨书森的亲属被捕后,谷风鸣(时任大股伪军工作团团长,1967年8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亲自安排,通过多方关系,并由“莫旅”旅长莫正民拿出100块大洋给了敌团长董效仁,才把我们救出来。今天想来,我这小小的年纪在那种环境里,要不是党的关怀,我也许早就没命了。

出狱后,为了我家安全,组织上把我们转移到山西五莲县的一个叫杨沟子村里。有一天,丁大哥、杨大姐等地下党员到我家开会,丁大哥很风趣地摸着我的脑袋说:“别看这小脑袋瓜,还行,他在关键时候没有供出党的地下组织,是块材料,这100块大洋,值!”我听着心里美美的,心想我也做了一件大事。由于我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地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44年11月14日下午,八路军在莫旅起义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莒县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日军教官和军事顾问等。莒县解放后,莫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2旅的番号,并由莫正民任旅长(解放后莫正民任黑龙江省黑河市委书记)。莫旅3500余人顺利起义,有力地破坏了日军奉行的“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投降后,山东伪军大多数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的战场。而1944年山东军区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对蒋介石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作者单位:市民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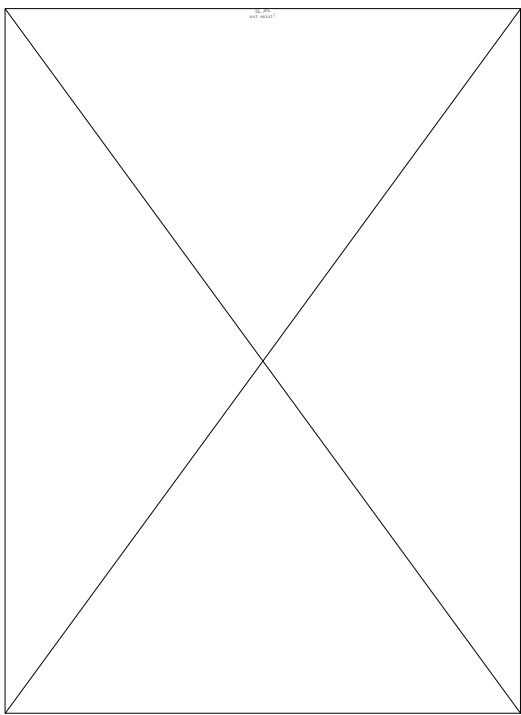




他，见证周法乾的灭亡

——访在京离休干部曹石亭将军

※ 李自见



1958年曹石亭任南京海军学院合同战术教员

1921年7月，曹石亭出生在原东海县二区西圩乡曹口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现为沐阳县西圩乡曹口村），童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少年时投靠陡沟冯圩村姑母家上了几年私立学校。

1936年10月经爱国民主人士冯季皋先生推荐参加国民党东海县政府在海州西大岭办的壮丁训练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二区在陡沟乡冯圩村举办抗日教导队学习，后转入战时中学，经陈飞等人引导和帮助，积极投入敌后抗日救亡工作，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1948年，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35旅、104团第二营营长的曹石亭，担任攻打龙直战斗中的前线指挥，并见证了国民党保安大队三县联防指挥官周法乾被击毙的全过程。

值龙直战斗胜利59周年之际，把封尘半个世纪的真实战况奉献给港城人民，以告慰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激励家乡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这块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周法乾的发迹

周法乾原是国民党沐阳县常备大队王绪五的第二中队长。1939年夏，周法乾在汤沟诱杀我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团长江曙红后，因反共有功受到王绪五的重用。1940年8月，王绪五在涟水地区遭我八路军东进第五纵队三支队围歼，周法乾带伤率其残部数十人逃脱。后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伪军灌云县保安大队长，盘踞在原灌云县南部王马庄，仰仗日本鬼子的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残害抗日军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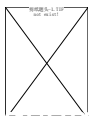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周法乾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专员夏铸禹的第八专署上校保安大队长，兼东、灌、沐三县联防指挥官，拥有500余人地方部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100余人。装备齐全，各类枪支400余支，仅轻机枪就有6挺，重机枪2挺，八二迫击炮2门。同时还拥有威力较大的日式155重炮1门，炮弹300余发。周法乾自以为拥有重兵和装备精良的先进武器，在东、灌、沐三县中心陡沟地区驻守，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打击周法乾的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我军先后攻克陡沟周边小据点，迫使周法乾放弃陡沟据点退到龙直。不甘失败的周法乾退到龙直后，又在上房、新坝、邹庄、大小伊山、两眼望地区构筑十几个据点，以龙直为中心，组成十字型防御体系固守，控制我东、灌、沐地区主要交通要道。并且还经常出动部队支援还乡团侵扰我解放区各区乡政府，烧杀抢掠，破坏边区农业生产，对我解放区构成新的威胁。

战前动员与部署

为了彻底铲除周法乾这个毒瘤，苏北党委和苏北兵团首长决定由第35旅，攻克房山至大伊山一线顽军各据点，扩大我解放区，缩小新海连敌占区，孤立新海连之敌。我第35旅接到命令后，迅速开赴淮海区柴米河以北进行战斗部署。35旅





各团的任务是：103团攻克上房、老黄荡、大小穆庄据点；104团攻新坝、龙苴及周边据点；105团攻克大小伊山，两眼望及的周边敌各据点。

龙苴古镇是海州南重要门户，又是三县顽敌总指挥周法乾的老巢，是我军必克的重点对象。这一艰巨任务自然由104团担任。因为104团大部分指战员都是东、灌、沐地区的人，尤其是二营。二营的前身是灌云县警卫团的二营。二营绝大部分指战员深知周法乾残暴，对周法乾有着刻骨仇恨。

1948年6月19日下午，各部队按上级部署从涟水高沟以急行军速度连夜赶至各战斗岗位。103团以上房为主，重点攻克周边敌据点；105团配合灌云县独立团攻打大小伊山及周边各据点；104团首先攻下新坝及其周边据点；龙苴南边及东南边几个据点由104团的一营配合陡沟区大队及乡队攻打。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6月21日上午，上述地区敌人的各据点先后被我军攻克。104团和105团随即转入对新海连方向援敌进行阻击。

6月21日下午，104团二营、三营撤出新坝，包围了龙苴。当晚，曹石亭带领二营配合一营攻打龙苴街上周围几个据点守敌，战斗持续一整夜，天明时一举攻克，消灭敌100余人。其余之敌逃进周法乾核心据点坚守待援。曹石亭决定先攻打龙苴周边外围敌据点，断其肢腿，封其退路。最后采取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战法，力争一网打尽。

攻坚战斗

这个核心据点位于龙苴街东北角，是在原破旧庙宇基础上，经日本侵略军多年修筑并在此驻防，后被周法乾接手加固，是众多被我攻克的据点中最为坚固的据点。据点碉堡的东边是外壕和围墙，北、西、南三个方向是深沟和高墙地堡。中间有一个大炮楼，呈圆柱状，墙厚一米有余，炮楼高20余米，如此高大的建筑，加之周法乾顽军的先进武器装备，配155重炮1门，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20响的驳壳枪20余支，火力能覆盖一二公里范围，对我军的行动构成很大威胁。

根据地形与敌情，曹石亭营长命令五连、六连及机枪连立即从敌据点北边古城遗址处，利用高粱地隐蔽挖交通壕，向敌据点逼近；同时，命令四连由龙苴街内利用打通民房等障碍物掩护向敌据点接近。很快据点守敌发现我军行动，加大了对龙苴街道内四周的火力压制。为了避免伤亡，四连及时找来了3辆大车，改装成土坦克。这种大牛车有3个轮子，前小后大，车身前低后高，宽约2米，长约4米，高约1米，两边上面和前面用门板和土坯加固起来再用浇上水棉被覆盖。经过这样的改装，土坦克就可以防敌机枪子弹，每辆车可掩护一个班的兵力向敌推进。在我们各连积极准备进攻时，据点内守敌拼命使用轻重机枪向我军进行扫射，并使用八二迫击炮和115重炮进行轰击，对我方造成极大威胁。见此情形，曹石亭营长及时电话报告团首长请求炮火支援。

在团里的安排下，团炮兵连3门八二迫击炮配属曹营长指挥，向据点内的敌人进行猛烈轰击。发射了数十枚炮弹后，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军在据点内来回移动着155重型火炮寻找打击目标。此时的周法乾认为围攻据点的是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是主力部队，没有重型武器，奈何不了他，拒绝投

降，继续顽抗。

为了彻底打消周法乾负隅顽抗、坚守待援的念头，6月22日104团请示兵团首长同意调来第六军分区山炮一门，为92式大开架山炮，炮阵地设在古城遗址东南冯庄。旅长指示山炮必须发发命中。因当时炮弹非常紧缺，这次旅长同意使用炮兵，也只给了3发炮弹，其目的主要是吓唬一下周法乾。炮兵连长施文周亲自进行瞄准、测距，定方位。

上午9时开炮，第一炮打出去了，炮弹像闪电，带着惊雷声冲向敌人炮楼。炮弹将炮楼顶上的一个墙垛打掉，向远处飞去，在农田中爆炸。第二炮是一枚穿甲弹，炮弹在炮楼中间穿了一个大洞，炮楼摇晃几下还直立着。第三炮炮弹在炮楼内发出猛烈的爆炸声，炮楼在大火中倾斜了。

此时的周法乾被三炮打乱了阵脚，急忙召开军官会议，决定突围。突围方向有两个：一是向北突围，这个方向地形开阔，都是麦茬地，出去以后可以快速散开逃走；二是向东而后再转向东北板浦，即当时国民党灌云县政府驻地，逃出共军包围圈就进入古城老河道，这是一大片高粱地，便于隐蔽逃跑、减少伤亡，那时天黑了共军难以追击。

周法乾非常狡猾。他首先是在据点东围墙挖了个洞，把部队撤出据点，进入东外壕内隐蔽，并将外壕沿墙挖成阶梯状便于攀登。他将部队编成3个突击组，每组配备轻机枪和短枪，将20响驳壳枪全部集中在突围队伍前面，突围时突然猛烈射击，打开突破口掩护大部队突围。他决定将突围时间定在我军开始向他发起攻击时。因我军开始向据点总攻开火时火力一时调整不过来，他妄图抓住这一机会突出包围。

末日来临

6月22日，整个下午据点内很少有枪声，阵地上显得很寂静。下午5时，曹营长命令四连一个排的兵力，用土坦克作掩护从西南方向接近佯攻一下，看看动静。四连按照营长的指示开始佯攻了，土坦克一直推到敌据点西南门桥上，没有遇到敌人反抗。四连一排长此刻当机立断，率领全排战士冲进据点。冲入据点后的一排仍然未遇到任何抵抗。

曹营长随即命令在外围待命的四连兵力全部攻入据点。攻入据点后的四连由南向北逐个房间攻击搜索前进。据点内的各类房间、伙房、马棚约有三四十间，据点院内一片混乱，还有十几具尸体，并无抵抗的敌人。当搜索到马棚时发现两名惊魂落魄的马夫，在战士的讯问下，他用手向东指着说，他们的部队都已到东边外壕沟里准备突围了。得知这情况，四连长一边集中部队组织向东侧外壕进攻，同时打电话向曹营长报告。营长当即指示四连投入战斗，同时命令五连、六连向敌人突围方向进行包抄。周法乾发现我军行动时，如惊弓之鸟，阵脚大乱。原准备等到夜幕降临进行突围的计划被迫改变。周法乾命令部队不顾一切地提前突围。顿时，枪声四起，激烈的各类子弹如暴雨般向东方倾泻。敌人除小部分抵抗四连的打击外，大部分敌人分左、中、右3路在强烈火力掩护下迅速逃出壕沟，突进高粱地，借助青纱帐掩护，向东北的大尤庄方向拼命逃窜。曹营长指挥五连、六连分左右两侧向敌人进行阻拦射击，追击逃散之敌。同时电话向团长报告了敌人逃窜方向，团长命令特务连参加追击。枪声越来越激烈，双方猛烈进行射击，震





耳欲聋的枪声已分不清敌我。

突围的敌人以班、排为单位,自以为武器装备精良,拼命用轻、重机枪压制我军追击部队,边打边跑。但急于突围的心理状态,受到我军猛烈打击后,便自顾不暇,很快失去整体战斗力,纷纷各自逃命。部队追击出五六华里后,敌人的枪声逐渐稀少。考虑到天色已近黄昏,对逃散之敌已形成包围,曹营长命令各连部队沿追击路线返回,对高粱地进行搜索,捕捉俘虏,查找周法乾,收缴枪支弹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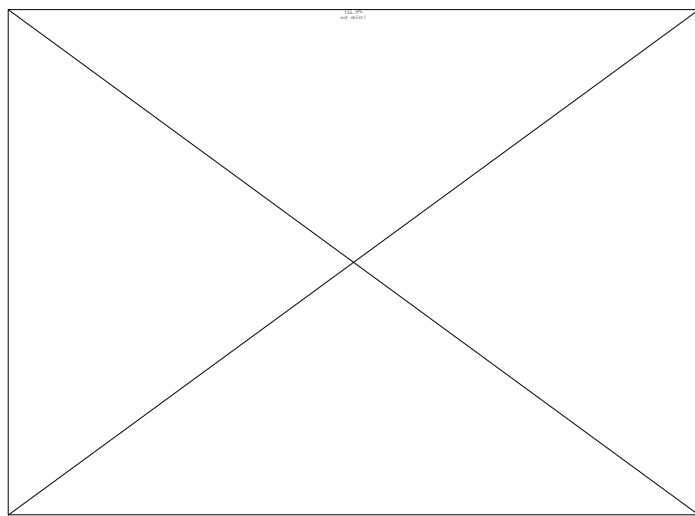
天色逐渐黑了下来,曹营长带通信班随部队一同进行搜索,当搜索到一块高粱地的田埂处时,发现一个敌人伤兵,这个伤兵拖着一条断腿正在艰难地向前爬行。这个伤兵成为俘虏后,连连磕头请求长官饶命,并说:“我姓刘,是据点北边古城村人,是周法乾的勤务兵,周法乾已被打死了,绝不骗你们,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周法乾的尸体。”听到俘虏这么一说,曹石亭很高兴,但又不放心,怀疑这个家伙在捣鬼,就让他带路去找周法乾尸体。

这个家伙前面带路,他边爬边诉说家中有年老父母和老婆孩子,是被周法乾逼出来的,不跟他干,周法乾手下的小军官就要霸占他的老婆,没办法才当了个差使,他哀求千万别杀了他。他一边气喘吁吁地快速爬着,一边讲述了他和周法乾在一起的最后情景:“突围开始时,周法乾身着便衣,两个卫兵架着他随中路部队突围,我跟在他们后边。我们四人刚刚跑出高粱地,进入一片瓜地时就被一个排枪打倒。当时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3人当场被打死。看到这个情况我只好先隐蔽起来,等到天黑你们走后再想办法爬回家。”

不一会儿,这个俘虏就带曹石亭等人来到一块瓜地。在这瓜地中间,看到有3具尸体头朝东面趴在地上。俘虏指着中间的那个说:“这个就是周法乾!”曹石亭让通信班的战士将周法乾的尸体翻了过来。尸体脸上、头上都用泥巴糊着看不清。俘虏解释说:“这是突围前,周法乾专门进行伪装的。长官如果不相信,他还有一个胎记在左屁股上。”曹石亭让战士解开周法乾的裤子进行检查,结果真的有一个胎记。这是真的周法乾,可惜是个死的。尽管这样二营指战员还是十分高兴。为人民除掉了一个祸害!随即检查了周法乾的全身。

周法乾的右手握着他的“马八音”手枪,左手还拿着一个弹夹,衣服口袋里还有两个装满了子弹的弹夹。曹石亭拿起了周法乾的手枪闻枪口没有火药味,可见这个刽子手一枪未发就被我军击毙了。周法乾的左手上带着一块金壳手表,上衣兜内装有一块金壳怀表,一支派克钢笔,腰间布袋里装有30余块玉器,胸前脖子上挂着一个如来佛玉像。那个伤兵俘虏说:“这些玉器能保佑平安。打仗时,他都要将这些玉器带在身上”。看到眼前的情景,充分证明周法乾的罪恶及虚伪心态,他戴再多的玉器也难逃人民的惩罚。

曹石亭让通信班的战士将周法乾身上的东西全部取下收好,这时四连长也到了。四连长来报告搜索情况,曹石亭让四



1948年曹石亭(右)与战友王维宽

连长去找人将周法乾的尸体抬到据点内继续进行辨认,以防差错,四连长叫来4个战士,前后各两人,拽着周法乾的胳膊和小腿向据点走去。

几个战士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唠叨着:“营长叫我们把这个大坏蛋抬到据点里有什么用,还不如分尸八块喂狗吃呢!”听到战士们的议论,曹营长对他们说:“要他的尸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继续辨认,二是要让东、灌、沐的人民都能看着周法乾的可耻下场。”

游乡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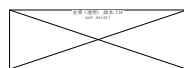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周法乾的尸体被抬到据点后,战士们找了一块门板,将尸体放在上面,用冷水将尸体清洗干净。这时,发现周法乾的死是致命的一枪,子弹从他左耳射进由右耳穿出,枪口很小出血不多,尸体很完整。曹营长让战士找来一张芦苇席盖住尸体,等到天明后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灌云县陡沟区区长夏秋带领大批民兵拿着铁锹、铁锨等工具来到据点,准备着手摧毁和铲除炮楼。曹石亭让他们先去看看周法乾的尸体。曹石亭带着几个地方领导一边查看周法乾的尸体,一边向他们介绍战场上的情况。经辨认,几位领导对周法乾的尸体确认无疑。请示上级后,曹石亭即将周法乾的尸体交给他们,由当地政府处理。

区乡领导对击毙罪大恶极的周法乾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表示要将周法乾尸体抬到陡沟、南岗、汤沟等地示众,给人民看看这个恶魔的下场,以解人们多年的心头之恨!区乡领导接收了周法乾的尸体,叫来几个民兵用门板将周法乾的尸体抬走了。

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周法乾的尸体经陡沟、南岗、汤沟等地示众后已逐渐变腐发臭。当时的条件只能往尸体上浇上一些白酒,消除腐尸臭味,最后让民兵把这具腐烂的尸体丢进六塘河里。这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可耻下场!

(作者单位:市烟草公司)



浅论年鉴如何更好地 成为志书基础资料

※ 何惠明

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定位于“资料性文献”，归属于地方志范畴，引发了笔者对地方志与年鉴的比较研究，经对两者的性质功能、体例特征、资料状况、文句文风等方面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年鉴与地方志书从总体格局上应该是相通的，从具体情况来看两者还存在诸多不同点，从发展趋势来看两者应该走到一起来。至于哪些是“相通的”，哪些还“不同”，怎样才能“走到一起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怎样使每年编纂的年鉴与20年编一部的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怎样使年鉴资料更好地为修志工作服务？为此，笔者作出了如下一些分析与研究，以求教于方志界和年鉴界的同仁们。

一、年鉴的性质定位问题

地方志书与年鉴，一个是我国土生土长，一个是从国外传入；一个是若干年编一部，一个是每年编一本。观其体例体裁、资料特点等总体上还是比较相似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地方志书的性质给以明确定位，确认是政府主修的资料性著述，而对每年在编纂的年鉴的性质定位却显得比较模糊，一般称其为政府公报性质的书籍。由此而论，年鉴是什么？是公报性的书，是信息类的书，是总结式的书，是著述性的书，这些似乎都不确切。笔者认为不妨也给年鉴定位于政府主修的资料性的著述，当然这样的定位并不完全符合现在年鉴的实际情况。但笔者主要想阐明，在现在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归属于地方志范畴的形势下，我们将年鉴性质靠向地方志作如此的定位还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本属同一性质的两类书籍在国家管理的层面上把它们归属到一起。这也是地方志工作者早想看到的理想结局。显而易见，把年鉴归属于资料性文献，从而并入地方志范畴，对我们继承和发扬地方志事业的优良传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旧时代曾提出地方志书60年修一次，

现在《条例》又提出地方志书20年修一次，如果简单地讲几十年修一次地方志书，给人感觉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好像是阶段性工作任务。以前曾规定60年修一次地方志书，而实际还不止，由于清末、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很多地方地方志书都断修百年以上，松江曾断修了105年之久。可以说是数代人才修一次地方志书，由此造成很多人不知道修志为何物。《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了地方志书20年修一次，同时明确了两轮修志之间的地方志资料工作任务，从《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可看到两轮修志之间的资料工作的主体无疑是每年编辑出版的年鉴工作。可以认为，这是国家以条例的形式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长期搜集地方志资料的大平台，有了年鉴作为地方志书的基础资料，必将有力推进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

回想起我们第一轮修志，可谓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军万马去搜集资料，而结果收效甚微，依靠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和走访一些老人所收集到的资料可以说是非常少的。民国以前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建国初的资料也是非常少见。特别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情况过程资料，更是难得其全。虽然方志界在充分肯定了首届志书的总体质量，无论科学性、时代性都十分鲜明，旧志无法与之比拟，但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诸如史实不全、史料失真、特色不明、客观性的资料不多等现象，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编写年鉴，充分利用这个当时人写当时鉴的资料平台，收集比较全面的资料、真实的资料、特色鲜明的资料，真正弥补上轮修志时碰到的资料欠缺的问题。如果年鉴真正成为未来地方志工作重要的资料基础，那么对以后的修志必然具有极大的便利。

现在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笔者在编纂第二轮志书时，虽然这时间段内每年基本上都编有一部数十万字的年鉴，年鉴文字的总数达上千万，但在编纂续志从年鉴中选择资料时





却发现可用的资料很少,据几位富有经验的编纂人员分析,现有这些年鉴可供续志书录用的资料还不到五分之一,有些内容看似可用,真用起来其实是不完整、不准确、不具体、不实用的,甚至还不如重起炉灶进行收集。为此,笔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每年编纂的一部年鉴成为20年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既得心应手又非常翔实的基础资料,起到类似我们第一轮修志时曾搞过的那种资料长编的作用。据此,我们不妨回首对现在各年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作一番分析研究。从地方志书的编纂角度,以地方志书的基本要求来评判一下,可以从哪几个方面使年鉴更好地成为地方志书的基础资料,从而使年鉴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实质上真正归属于地方志范畴。而从现在的年鉴情况来看实际还处在地方志的客体位置上。一是现在年鉴的资料成分大多是党政部门文件、工作总结、日常简报、情况反映,行业概况等,不少报告、总结、简报稍作改头换面即收入年鉴中。这些总结性、文件性、报道性、概况性的内容,与地方志的内容要求、记述方法、语言文风很不一致。那么怎样变客体为主体呢?怎样使编入年鉴的内容真正成为编纂地方志书可信、可用,全面、准确的资料?当然我们并不奢望到时把年鉴的资料编编排排即成地方志书,只要年鉴的多数资料能为地方志书所用就是我们地方志编纂者的理想目标了。据此,我们有必要很好地分析一下,方志和年鉴发展到今天,两者之间真正有机结合点在哪里?重新来认识一下:“志鉴趋同论”观点的重要含义。鉴于社会对年鉴的需求,鉴于开展年鉴依托政府的需求,以前我们总把年鉴的内容和总结经验、研究工作、宣扬成绩相结合,暂且不妨让年鉴性质定位存有多元化,可以兼顾党政公报性,又兼顾地方百科性,在资料性的前提下,存在一些总结性成分。但鉴于《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年鉴归属于地方志范畴这样大格局的形势下,我们年鉴编纂者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给予这“党政公报性”的官书,以更多的客观性、资料性和社会性。

二、年鉴与地方志书接轨问题

鉴于《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年鉴的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使年鉴资料真正成为地方志书的基础资料,我想从总体上有点值得我们思考与重视:一是年鉴体例要更好地采用地方志的横排竖写方法,横排还须加强,以达到收集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更多的资料;二是年鉴要像方志那样从自然、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各方面开拓门类;三是年鉴的记述方法在述而不作方面要下一番功夫;四是年鉴的语言、文风要向地方志书平实、简明方面努力。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一阐述:

(一)大力拓展年鉴资料的收集面

一要加强传承性内容的记述。是指跨年度的事物的起始、发展及其结果在年鉴中的连续反映,这样可以使读者了解事物的发展概貌,由此增强年鉴资料性的作用。二要加强专业性资料的收集。应重点记述本行业重要工作的业绩和重要事件,从而系统地反映一个行业年度发展与变迁以及在一地的地位及影响。这些资料仅依靠部门提供是不全面的,不确切的,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走向社会广泛收集。由此才能较全面反映一个行业的基本概貌。三要加强调研报告性资料的收集。每年党政研究部门对热点、难点、重点领域开展的调查研究,掌握

的第一手资料,写出的很多货真价实的材料,这些资料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指导和参考价值。另外,现在的年鉴主要采用书面的文字资料,较少社会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年鉴编纂者应在这方面作出比较大的努力,要把收集实地调查资料、口碑资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年鉴编纂如注重实地调查,那么因调查的事情刚刚发生,调查的人都在,这些资料一是十分鲜活,二是便于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加上我们采用方志的取材方法、编纂方法,由此而载入年鉴的资料一定更翔实可靠。四要加强趋向性史料的收集。对新形势下的新材料、新事物、新问题,我们要善于抓住苗子、抓苗头。如社区管理、社会保障、希望工程、社会和谐、就业市场等,要善于发现这些带有趋向性的重要内容,收集信息、发掘资料,加强记述。

目前,笔者见到的不少年鉴中,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体制改革、市场建设、私营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新内容、新事物反映比较贫乏,一是未加强,二是不集中,三是遗漏多,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来地方志书中十分需要的资料。为此,我们现在在编辑年鉴中,首先要加强认识,年鉴编纂者,要注意扩大信息资源渠道,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拓展年鉴内容题材,增加刊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有研究价值的深层次信息、新兴领域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

(二)年鉴在记述史料时要尽力弥补年度的局限

因年度的年鉴一般只记事物的终端面貌,既缺少某一时间段范围内的比较,更缺少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的比较,给人们了解、利用有关资料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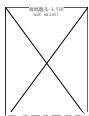
对此,我们可以努力从两方面去做,一是适当增加一些纵向比较的史料,还可采用图表等形式,由此反映出事物的发展过程、历年的发展水平;二是可以补充一些横排比较资料,放在全市的水平上比、与周围的区县比,由此看清当地当时的有关水平,也可以看清存在的差距。

在年鉴编纂时,碰到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跨年情况较难全面反映其轨迹时,可采用一些变通的方法,在当年人物、事件处于结果阶段可适当追溯前几年人物、事件的起因、过程等情况。

在数字的运用上,年鉴注重横断面,一般单纯地记录年度数据。对一些重要数据,可以采用列表的形式、附上数年间或阶段性的数据比较表,使局部的、年度的数据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展示其特有的作用,由此提高数据资料的存史价值。

在搜集资料时,要注重阶段性资料的搜集,如完成五年规划一些综合性的资料,党政机关五年一届完成的一些汇总资料,对一些重点工程的完工时的跨年度资料,对几年评选一次先进的有关资料,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跨年的)的资料,对国家在本地进行试点或作重点总结的有关资料要加强搜集,这些资料存史价值高,是未来地方志书中的重要资料。另外可以部分地采用史的记述方法。笔者有一位同学在研究日本从本世纪开始出现地方志“史化”的倾向问题,我们尚不论它的优劣问题,其中有点我认为可取的,就是史志如何有机结合,在一些篇章中在横排门类的同时,适度吸收史体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长处,在部分内容中适当的断面和单元内以史的笔法记录一些有特色事件。这样可能会创造出一种主体





突出、简洁明快、内容厚实、见人见事又见物的效果来。

(三)年鉴在“述而不作”方法上要下大力气

年鉴与地方志书比较,在直书方面存在较大欠缺。我国地方志千百年一直流传至今,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史实为依据,靠资料说话,比较客观真实地载录一方全史,其中在记述方法上突出表现在“述而不作”上。所谓“直书”就是不经过中间渠道而直接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不需要“穿鞋带帽”,不必写观点倾向,不能议论是非,不用道明成败得失,均寓事实于记述之中,让资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不施脂粉,只须白描。

“直书”就是要求记事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展现事物和事件的真情,“言必及事”。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客观历史就是客观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面画蛇添足地加以评论。地方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话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见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年鉴中比较多见的是信息含量中水分多、内容空泛、语言空洞的问题比较多。

如一些类似工作总结、领导讲话的语言,中央怎样讲、市里怎样讲、区里怎样讲,以什么为指导、以什么为动力等等,大话、套话无实质性内容,此外很多内容中议论比较多,经验总结比较多,解释性的文字比较多,这些都应该大力删减,要向方志那样惜墨如金,恰到好处。

要使年鉴更好地与地方志书接轨,要让现在从事年鉴编纂的很多办公室秘书人员努力从政府报告、政府文件、单位简报、新闻报道等写作形式中跳出来,要较好地改变那种总结报告中习惯用的上级如何指示、兄弟单位如何支持、下级如何努力等,特别是那些夸大之词、溢美之句、过头之语等,还有那种硬凑的所谓三大成绩、四条经验等等都应该大力地删去。要像地方志书那样“述而不作”地客观真实记下事情经过。

(四)年鉴的大事记要提高档次、增加门类

对年鉴中的大事记收录标准完全可以沿用我们第一轮修志时确立的标准为基本要素,当年地方志书大事记主要有如下一些要素:行政区划的变革及主要机构的增设与撤并;重大决策会议的召开;重要法令文告的颁行;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的军事行动;主要人物的活动情况;重大的经济、文化等建设成就;重大的发明创造科研成果;特大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主要物产的盛衰变化;文物古迹的发现、保护及兴废;重大生态变化;重大涉外事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特殊的大事。

由此对照现在年鉴的大事记,从收录范畴来讲远没有如此广泛。笔者认为可以用地方志书大事记的要求来重新审视一下年鉴的大事记,适当扩大收录范围,使年鉴大事记为以后编纂地方志书提供更多的大事记资料。

(五)年鉴中人物资料要大力增加

地方志书一直严格恪守着“生不列传”原则。但从搜集资料的角度是否对年鉴可网开一面,可采用让生人事迹入鉴的方法,这样有利于当年鉴记当年人、事迹比较清楚。

但入鉴的人物可列个标准范围,所记内容可列个要求,注意反映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人

的活动、人的创造、人的贡献,充分展示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参照地方志的人物列传标准,年鉴可收录地方著名人物的简介资料。如党政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专家学者、特大型企业企业家,对经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者,著名教师、医生、运动员、宗教界著名人士、能工巧匠、社会名流等。总之,年鉴人物资料的收集范围比较地方志书人物传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以便更好地为未来地方志书编纂人物传服务。

(六)年鉴的文字要大力精简

一般年鉴都在抢时间出版,缺少琢磨的功夫和缩水的工序,有的可能缺少编纂的人才等,诸多因素,出版的年鉴,文字方面的精炼简洁与地方志书比较相差甚远。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志书的精炼简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是十分突出的。正如明代吴纳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讲到:“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胡乔木同志对新方志的语言文字要求也很高。他说:“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不多,一句不少。如果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还说:地方志的文字“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

方志讲文约事丰外,又要朴实无华,要做到不浮、不华。方志的语言如李白诗所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一种白描之美、本质之美、朴素之美。

地方志书八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比较普遍。而年鉴大多如“急就章”,一两个月编好,半年即出版,我想以后我们编年鉴中也应该在磨字上多下些功夫。

(七)加强年鉴编纂队伍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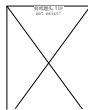
为了使年鉴资料、编纂等更好地符合地方志资料需求,更好地为方志编纂服务,当务之急我们要在方志理论指导下,根据方志工作的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围绕方志理念、方志体例体裁等方面,对年鉴工作人员进行一次系统的培训。同时要扩大年鉴的撰稿队伍,从以往完全由党政部门及所属单位专门人员供稿,发展到党政机关以外的企业、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方面面有一支特约的供稿队伍,如时机成熟的话,笔者认为还可以建立一支特约自由撰稿人队伍。由此更广泛地向社会征稿。

另外,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在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过程中,在队伍建设方面思想可以解放一些,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套地方志书、年鉴采编制,争取获得像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一样的采访权限。由此,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更好地做好采访收集资料工作。

上述这些粗浅的想法,仅为笔者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我也知道以上这些问题虽想到了,但真正要做到谈何容易,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不断实践、不懈努力,相信在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过程中,年鉴、地方志书一定会相辅相成,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





试述志书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

※ 张定国 王君敏

我市新一轮续修志书的时间断限为 1984~2005 年,这期间,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走向深入,给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事业诸方面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地方都被打上了鲜活而生动的个性印记。一部好的志书不能只是对这些鲜活而生动的个性变化内容的简单堆砌,而应当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去组织材料,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笔者以为,续修志书大致可采用以下几种结构形式来组织材料。

结构形式之一:纵线+横面

从续修志书的整体方面来说,组织材料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纵线+横面”的结构形式。作“纵线”记述,体现着志书的历史的纵深性;作“横面”记述,体现着志书的现实的广博性。续修志书,先确定事物发展史这条“纵线”上的“起点”、“转折点”、“终点”等变化点,对于对出现这些变化点时社会各项事业的“横断面”上的材料的记述是很重要的。

如编修《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在收集开发区管辖区域范围方面资料之前,先明确开发区 1984~2005 年间管辖范围的变化点,对于资料收集及志稿撰写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些标志着开发区管辖区域范围的阶段性的变化点主要有:

1、1984 年 12 月 19 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规划面积 3 平方公里)。

2、1985 年 10 月,原云台区中云乡管辖的范庄的第 6、9 生产队划归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3、1990 年 3 月,原云台区中云乡管辖的范庄、山后和焦

庄 3 村划归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4、1992 年 10 月,云台区的中云乡(10 个村)和云台区猴嘴镇的新光村划归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5、1995 年 3 月,宋跳工业区划归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6、2001 年 11 月,朝阳镇交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7、2005 年 4 月,猴嘴街道办事处交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同时重新明确中云街道办事处交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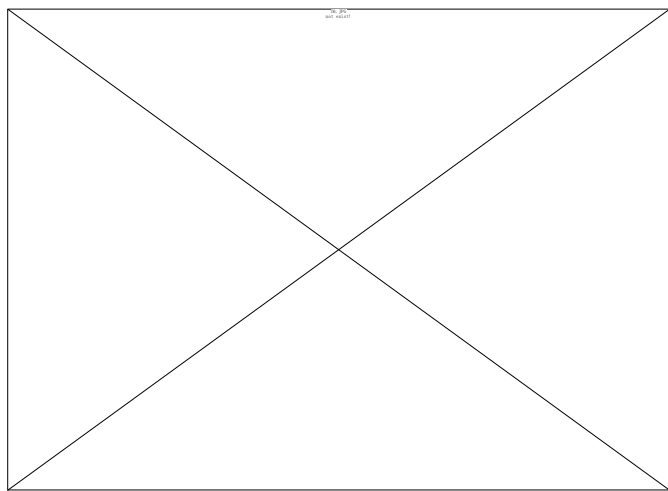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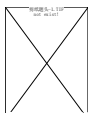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事件就是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发展史这条“纵线”上主要的变化点。每出现一个这样的变化点,开发区的人口、土地、教育、经济、规划、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些方面实际上就是出现这些变化点时社会各项事业的一个“横断面”的情况。

一本志书,由于时间跨度大,收入的资料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面对纷繁复杂的资料,首先找出社会每一个行业系统发展史这条纵线上的变化点,再收集出现这些变化点时的社会各项事业“横断面”上的材料,才能使志书记述的内容重点突出、有代表性。编修志书时有所谓“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要项)”的要求,这实际上也从侧面表明了志书成书采用的最主要的结构形式就是“纵线+横面”。

结构形式之二:概括+具体

这里的“概括”是指将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来写的概括内容,“具体”是指对事物的个性特点进行细化介绍的内容。





市开发区一角

“概括+具体”的结构(即总分结构)形式在志书中运用得也很普遍,比如志书卷前的综述(概述)以及设置的篇、章、节下面的概述就是概括来写,而紧接着篇、章、节下面的内容就是对概述内容展开来记述,比较具体。当然,在节下的目中也运用“概括+具体”的这种结构形式去组织材料的。

这里,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在组织材料方面所采用的结构形式情况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卷前的《综述》,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1984~2000 年间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概括的记述,相对于《综述》部分,志书接下来的篇、章、节、目中所记述的内容即是对“综述”内容的具体化。这是志书从整体上来说在组织材料时采用的“概括+具体”的结构形式。

再来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中的“第五篇招商引资”在组织材料时所采用的结构形式。在“第五篇招商引资”下先对招商引资情况进行了概括地记述,接下来分“招商组织”、“招商政策”、“招商活动”、“项目服务”、“产业园区”、“引资成果”等六章对招商引资情况进行具体记述。其中“第五章产业园区”中的“第一节微电子工业区”、“第二节逸仙科学工业园”、“第三节化学工业区”、“第四节保泰工业园”、“第五节区内园区”中都首先设“概况”一目,对产业园区的情况进行概括记述,接下来再从不同的方面对产业园区进行了具体记述。在“第一节微电子工业区”下的“二、组织机构”一目中,又先对微电子工业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概括地记述,接下来又分别设“(一)微电子工业区管理局”和“(二)微电子工业区总公司”两个子目,对组织机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记述。

“概括+具体”的这种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的运用,对选入志书的材料既有从宏观上进行的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又有从微观上进行的具体的关照,避免了内容的空洞、干瘪。

结构形式之三:共性+个性

《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书”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由此看来,一

个区域的地方志书无不打上深深的地方印记,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即“个性”。但是,一个地方的志书在成为众多志书中的“这一个”的同时,又与其它志书有着诸多的共性,即社会性。认识到并处理好志书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对于使志书既能反映社会、又能彰显社会之一区域的个性大有裨益。

在志书中,志书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一些共性事件体现的。新一轮修志的时限断限为 1984~2005 年,在这期间,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发生的一些影响全国的共性事件,无不对一个地方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此处略举共性事件如下:志书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一些共性事件体现的。

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1984年)、“撤社建乡”(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希望工程”(1989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1992年)、股份制企业的试点(1992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印发(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1993年)、“分税制”的施行(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1994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199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1996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1997年)、全国行政机构改革(1998年)、“再就业工程”的启动(1998年)、“三讲”教育(1998年)、“法轮功”事件(1999年)、“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抗击‘非典’”(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3年)、“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2003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年)。

一个地方的志书,可以说主要是由“个性”化的事件按照一定的结构构筑而成的。但是为了凸现志书中的“个性”,必须关注“共性”,即“社会性”。一个地方发生的个性事件,大都是在共性事件的影响下出现的,可以说,是共性事件的个性化的体现。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有关记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的文字:

2003年3月以来,在全国部分地区发生了非典型肺炎疫情,国家商务部于2003年6月16日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指导意见》(商资发[2003]146号)(注:以上录入的是共性事件,主要体现了社会性)。在这样的形势下,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整了招商策略,主攻日韩和欧美,巩固台港,搞好台港企业二次招商。拓展了面向日本、韩国和欧美地区的招商渠道。调整了招商方式,采取电话招商、网上招商、委托招商、以商引商等方式(注:以上录入的是共性事件影响下出现的个性事件,主要体现了区域个性)。

这样的结构安排,兼顾到了共性事件与个性事件,并且略写了共性的事件,详写了个性事件,不但能让人了解一个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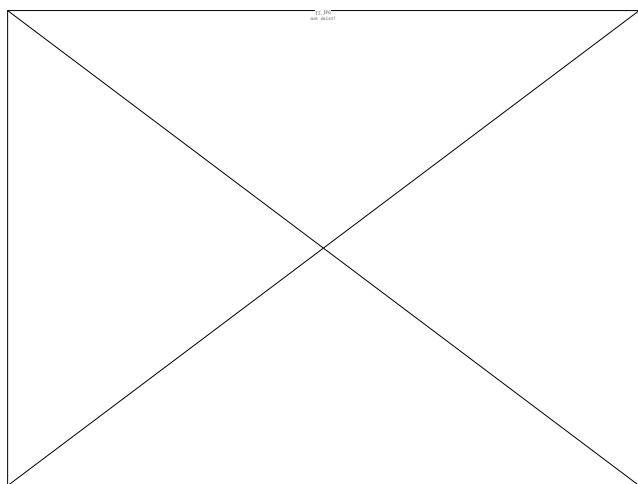
在某一时期出现的个性事件——知其然,而且,也能了解一个区域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个性事件——知其所以然。这样记述出的个性事件不唐突,体现的区域个性完整而丰满。

结构形式之四:静态+动态

这里,“静态”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性质、意义等静态内容。事物所包含的静态内容,大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动态”指事物在内因或外因作用下发生的变化等动态内容。如文化遗存的发掘、文化景点的开发、产品的创新、事件的发展、事物的变迁等等都是动态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录入能够鲜明地展示事物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志书的“资治”与“教化”作用。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记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藤花落遗址(2006年6月,藤花落遗址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字:

1988年3月20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经七路施工建高压电塔挖塔基时发现两个灰坑,出有石斧、石镑、箭镞等原始物品,尤其是有件鸟头状灰陶鼎足,鸟头造型双目一睁



藤花落遗址

一闭,栩栩如生。原中云乡文化站站长王继澄怀疑此物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部落有关,遂立即通知了市文管会。

藤花落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序幕由此拉开。

1996年6月14~25日,由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乡文化站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藤花落遗址进行了试发掘,初步确定该遗址为江苏省内涵最丰富的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同时还发现了岳石文化遗迹。此次考古发掘中,连云港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发掘保护事宜,并亲临现场慰问考古工作人员,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1万元现金支持,中云乡群众开来了运土机,带来了铁锹、扁担,挖土、运土,挑来了河水,并每天在水中帮助手洗陶物几千片。

1998年1月,由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市文管办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文化站等单位组建的藤花落考古队对藤花落遗址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发掘和钻探。首次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遗迹。

1999年11月~2004年5月,经过考古队多次对藤花落遗址进行大面积的发掘,最终揭示藤花落遗址具有内外城结构的聚落遗址(下图为考古发掘现场一角)(注:以上录入的有关藤花落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材料为动态内容)。

藤花落遗址位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乡西诸朝村南部,处于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之间的谷地冲积平原上,海拔高度为6~7米。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其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城周1520米,面积约141375平方米。内城平面近圆角方形,位于外城内的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哨所组成,城周806米,面积40560平方米。内城内发现35座房址,有长方形单间房、双间房、排房、回字形房和圆形房等多种形式。其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外间面积达110平方米,内间面积31平方米,被认为是一座与宗教、祭祀或其他大型集会等活动有关的建筑设施。藤花落遗址中还发现夯土台基、奠基坑、灰坑、灰沟、道路、水沟、水稻田、石埠头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炭化稻米、木桩以及各类动植物标本2000余件。藤花落遗址是全国迄今

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全国发现的50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对研究国家的形成、城市文明的起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藤花落遗址荣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藤花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田野考古评审会”上,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注:以上录入的有关藤花落遗址的方位、大小、构成、出土文物、性质、意义等材料为静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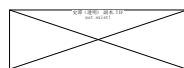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这样,在记述重点文化遗存存在的形式、蕴含的内容以及所具有的价值等静态内容的基础上,还把历年来政府与民间对这一遗存所进行的发掘与开发的动态内容也记述下来,以此展现政府与民间对待文化传承所持的态度。

总之,在一本志书所采用的诸多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中,可以说,“纵线+横面”的结构形式类似一棵树的主干,其它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则类似于从主干上生发出来的枝节。有了这些不同的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的运用,一本即使包含了浩如烟海的材料的志书也能显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

(作者单位:市开发区地方志办公室)

参考文献:

- 1、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中华书局2004年12月第1版
- 2、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 3、《连云港市博物馆考古大事记(1956~2005)》《连云港史谭》2006年第2期
- 4、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地方志网站建设的三个方面

※ 谭浩

编者按：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地方志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志书的资料性功能，促进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开设史志网站成为当前各级地方史志部门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网站硬件设备的选择”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地方志网站建设需注意的相关问题。

网站硬件设备的选择

网站硬件设备是网站的基础，良好的硬件设备可以提升网站的运行能力，减少运行中出现故障的几率。地方志网站一般都存储较大的数据量，在建设网站时不要选择虚拟空间，尽量购买自己的服务器。虚拟空间受制于租用空间的大小，影响网站的升级发展。网站的服务选择知名品牌，比如惠普，质量和服 务都比较有保障。服务器的数量取决于网站规模的大小，像省一级志办的网站，服务器至少有两台，一台用作数据库服务器，另一台用作 WEB 服务器；条件好一点的可以再加一台邮件服务器。这样做的好处是数据库服务与网站应用服务分离，既能提升网站的访问能力，也有利于数据的安全与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购买之前要考虑服务器是否需要托管，服务器托管是按外观大小收费的，服务器越大收费越高。如需托管，建议购买机架型服务器，机架型服务器尺寸小，性能配置也不错，节省了网站运行的开支。

网站的数据加工

数据加工是指将纸质志鉴资料信息化处理，转变为数字的形式加以保存。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建立地方志网站的前提。数据加工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没有源盘，用文字资料去扫描，进行 OCR 识别，这没有什么好谈的，记住加工时要求的差错率不要超过万分之五即可；第二种是有源盘，但在入库前需要做格式转换。源盘最好是付印前的大样定稿排版文件，后缀名是 PS、PS2、S2、S72，这样转换后得到的文件，文字准确且版式与原书一致。格式转换软件市场上有成品，作者使用的是 PS2NET。这个软件功能比较实用，兼容方正飞腾、维思等排版系统，能够将大样排版文件转换成 PDF 或者 HTML 文件。随文图片也能够转换，但需要注意的是，随文图片转换时，图片要与排版文件位于同一个目录下，否则转换后图片不能显示。

网站数据库的建设

数据库建设是地方志网站的核心技术，主要担负着网站数据的储存和检索功能。在地方志网站中，数据库存储着所有的志书、年鉴以及其他数据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下面从数据库的选择、数据库库结构的搭建、数据的入库等方面谈谈地方志网站数据库的建设。先谈数据库的选择。地方志网站因其需要存储志鉴等大量的文本资源，要求能够快速准确地

供用户检索访问，在数据库选择上首先要有全文检索数据库。全文检索数据库的优点是支持海量存储，能够存储近十亿条文本数据资源；具有强大的全文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特别是快速的在大量文档中进行检索，这些都是其他关系数据库不可比拟的。目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内技术比较领先的是 TRS (拓儿斯)公司出品的 TRS SEVER，这个产品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功能非常强大，很多图书馆、报社的数据库都在使用，好几家省级志办的网站也在使用，推荐作为地方志网站的全文检索数据库。

除全文检索数据库外，地方志网站数据库还需要关系数据库。全文检索数据库虽然有着存储量大、检索速度快的优点，但仅限于对文档资源的管理与检索。对于较为复杂的关系数据，还需要关系数据库进行分析管理。现在主流的关系数据库有 SQL SEVER2000、ORACLE 等，ORACLE 数据库价格比较昂贵，适合大型网站数据库使用，SQL SEVER2000 价格相对便宜，适合中小型网站数据库使用。地方志网站属于中等规模网站，主要利用关系数据库存储网站的动态信息及交互信息，使用 SQL SEVER 2000 数据库就能满足需求。为了保持全文检索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的内容同步，两个数据库之间需要通过网关进行连接。

其次谈数据库库结构的搭建。数据库其实是由很多张表组合而成，每一张表都容纳着表对象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称之为表对象的属性。例如有一张表内容是学生信息，那我们可以通过学号、姓名、年龄、班级等属性对一个学生进行描述，设计好一个学生的各种属性，实际上就是搭建了学生表的库结构。同理，在搭建地方志网站数据库库结构时，就要把志书年鉴的各种属性确定下来。一本志书或年鉴，最基本的属性为名称、书号、出版日期、作者等，年鉴的刊号只有一个，可以再添加一项“期别”属性予以区分。这些属性的确定，就等于成功搭建了地方志网站数据库的库结构，剩下只需往库里添加数据内容就行了。当然，一个数据库结构要比上面提到的复杂，这些只是最基本的要素，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扩充。

最后谈数据的入库。数据的入库是指把资料内容添加到数据库中。当数据量比较小时，可以手工添加入库，但如果数据量比较大，像地方志网站，要有上亿字的资料入库时，手工入库就显得费时费力了。通常一本五六十万字的志书需要几天的时间，这时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入库软件。第三方入库软件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成品。入库软件能够自动的提取资料内容，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将内容传输到数据库中。一本五六十万字的志书，借助入库软件可以在二十分钟左右完全入库，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市举办的第一次花果山书会

※ 夏兴仁

自古以来连云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境内的名山秀水,繁花茂林,更为迷人,曾吸引了历代文人来此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成了文艺荟萃的海角,特别是书法艺术石刻琳琅满目。秦始皇东巡,留下了秦东门篆刻;汉人在连岛刻界域,留下汉隶;隋人在孙家山钓鱼台刻了巡视诗,留下介于隶楷之间的隋书体;唐人在云台山郁林观东岩刻了唐隶;宋人刻了宋篆;明人刻了明楷,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留下的书法石刻众多。由于刻在石上故能保存至今,形成市区多处书艺石刻群,如:孙家山钓鱼台石刻群;前云台飞泉石刻群;孔望山龙洞石刻群;花果山、万寿山、凤窝山、石棚山,白虎山等都分布书艺石刻,有的石刻被宋代文人赵明成、李清照夫妇收入《金石录》,传名于世。石证如山,证明连云港地区的书法艺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书艺水平之高,为全国书法家所称羨。

在连云港地区的书艺史上,出现过不少知名的书法家,但其作品多数失传。经史家发掘搜集,载入志书的,从宋代到明清也有十多位,其中以云台大村人章兰溪最出名。清光绪年间,他到皇都卖艺,誉满京城,京都的商号牌匾,多数是他书写,闻名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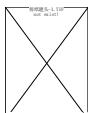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为了继承发展本地区书艺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连云港地区政府文化部门非常重视和支持书法艺术活动,各文化馆站、学校、厂矿企业的工人俱乐部,经常组织书法艺术比赛和书法艺术作品展览,曾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举办过全市大型的书画展览。

1980年秋,连云港市文联和市书法篆刻研究会相继成立,

其主要任务就是联合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开展文艺活动,培养人才,创作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当时兼任市书法篆刻研究会秘书长、市教师进修学院陈凤桐同志,本着弘扬中国特有的书法、楹联传统文化艺术,首创征集编辑《当代楹联墨迹选》,得到市教师进修学院的赞同和支持,以连云港市教师进修学院和连云港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名义,联合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书法家,发去“关于特邀当代书法家书写楹联的函”,受到了各地书法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共征集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书法家作品1200多幅,从中选编了380多幅为《当代楹联墨迹选》,由全国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书名,周汝昌作序,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畅销全国,曾经再版,为国家文艺宝库增添了精品;为提高连云港市知名度开了先河;为举行第一次花果山书会奠定了基础。

根据征集、编印、发行《当代楹联墨迹选》与全国知名书法家通联的信息,市文联研究,为了以书会友,宣传正在开发的西游记文化与我市花果山景区建设的知名度,决定在花果山举行一次书法艺术笔会,由市文联向全国知名书法家发函邀请,并由市文联副主席刘国华、夏兴仁,市书协主席杜庚、副主席陈凤桐,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陈振纶,市博物馆馆长张正渭等同志组成筹备组,进行筹备。筹备期间,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省文联李进主席亲聆筹备情况的汇报,并作具体指导;省文联秘书长吕博然,省书协主席武中奇等领导同志自始至终参与书会的领导工作,保证了书会的顺利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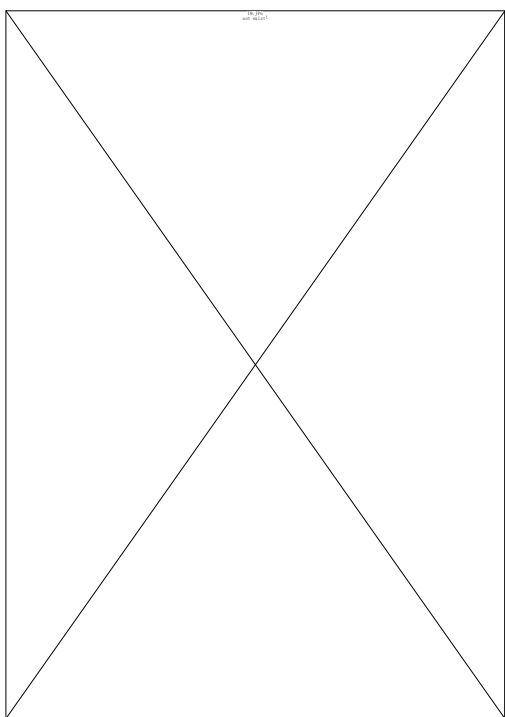
1983年7月22日,连云港市第一次花果山书会在新开张的云台宾馆举行,应邀出席的各地书法家和来宾有北京的陈乔;南京的武中奇、陈大羽、尉天池、肖平、常国武、吕博然,张学隶;无锡市的徐静渔、吴炳伟,史克方;常州市胡一飞;苏州市的沙曼翁;徐州市的汪水石,潘岳;扬州市的秦子卿;泰州市的张舜德;滨海的李敦甫;宿迁的吴应宇;湖北省杨白菊;湖南省的吴越中,张进贤;上海市的沈鸿根;福建省的蒋平畴;我市的杜庚、陈凤桐、顾铁依、张正渭、赵斯武、温广宇、许厚文、薛栋、周庚如、朱仲萍,李觉生等30多位,因故未能出席的书法家:北京的溥仪、沈鹏、史树青、夏湘平、孙永田、法乃光、冯景昶;上海的陈祖范,应野平;广东的刘振威;湖北的吴文蜀;安徽的张翰;山东的蒋维崧;河南的王澄;甘肃的黎泉;南京的宋

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各地书法家对市区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赞不绝口,即兴赋诗作联,用各自的擅长书体书写了出来,为我市留下了近百幅书艺墨宝。名家武中奇挥毫劲书了“神州一仙山”赞美花果山大字;陈大羽用娴熟的篆书写了“青山碧海连云起,幽涧飞流花果垂”(见下图);福州书法家蒋平畴,挥毫写了自赋诗:“承恩笔下此仙山,雪浪白虹大圣还,今朝翰缘来揽胜,分明好景在人间”。

在游览花果山三元宫、“自在天”时,市文联和书协特邀各地书法家,评饮花果山云雾茶和品尝特产葛藤粉。当时一阵山雨过后,山景青翠欲滴,薄雾朦朦,使花果神山,更加幻密莫测,激起各位书法家诗涌胸怀,意染笔端,在南京艺术学院陈大羽教授的倡议下,与书法家徐静渔合作一副楹联:“喜今朝,八方俊,花果山中集会,挥毫墨墨。溯昔日,一品猴王,水帘洞外称霸,耀武扬威”,请在座的每位书法家用自己拿手的书艺,在四尺宣纸上,依次各书一字,盖上印章,作为这次书会的集体作品,博得了各位书法家响应,顿时真、草、隶、篆斗艳,各方名印落红,一幅珍品弹指即成。连云港市文化宝库中又添一幅难得的珍品。

这次书会,对提高我市知名度和开发花果山风景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书会圆满结束时,市文联刘国华副主席代表市文联、市书协,感谢各位书法家光临书会,挥汗参加笔会活动,并热情期待诸位书法家光临第二次花果山书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24年过去了,第二次花果山书会尚未举行,但第一次花果山书会仍是连云港市文艺史上一次创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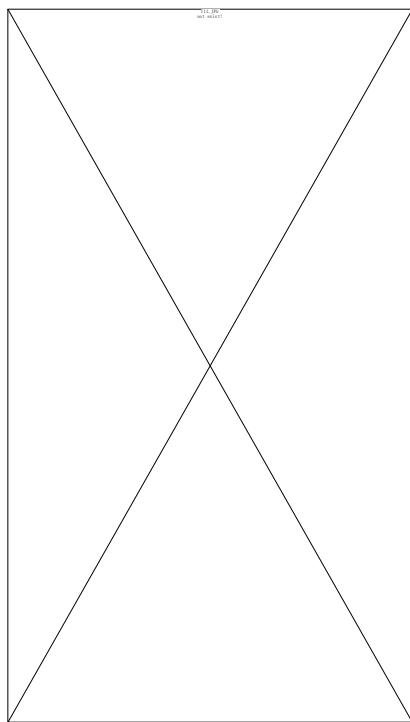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市文联)



沈鹏的祝贺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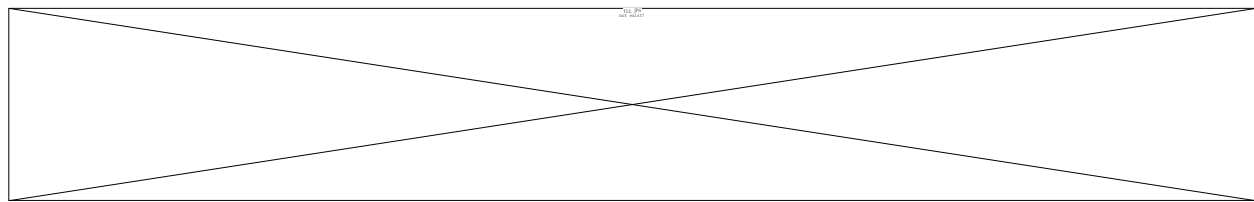
文治、黄养辉、肖娴、魏紫熙,亚明;苏州的费新我;扬州的魏子楨;南通的张晏等,他们以发电报、寄书信、赋诗、填词、撰楹联,表达未能参加盛会的遗憾和歉意。如北京的冯景昶的遗憾诗曰:“连袂名山上,云台临海边,书应志贤妙,会有九洲贤,艺术新承旧,文明后胜先,盛游未如愿,举首望南天”,用每句诗的第一个字构成了“连云书会,艺文盛举”八字句,表达心意;全国著名书法家沈鹏(曾任全国书协主席现为名誉主席)用亲笔书艺表函祝贺(见上图)

花果山书会开幕时,市领导龚来宝、林永、胡为德、刘余隆等亲临开幕式,并会见各地书法家,合影留念。书会期间,除了举行笔会进行书艺交流,印发交流论文外,还组织参观游览市区的花果山、水帘洞、宿城山等风景名胜,鉴赏文物古迹和历代书艺石刻群,乘船游览港口建设新貌。在鉴赏研究飞泉石刻群时,苏州的书法家沙曼翁对连云港市文物工作者译写的宋朝祖无择三言诗篆刻的错字作了指正。



陈大羽作品





从一张 50 年前的老照片 看连云港渔业一段辉煌的历史

※ 张明亮

在历史上,海州湾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渔场之一,连云港渔业生产在全国沿海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解放初期的渔业恢复和发展,连云港逐步成为江苏省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连云港的渔业产值始终居全省前列。尤其在合作化时期,连云港渔业呈现出红红火火的生产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开拓进取、公而忘私的好干部和勇于奉献、扎实若干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为连云港发展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说起连云港渔业的辉煌历史,要从一张老照片说起。在对连岛渔民进行调研走访中发现这张老照片,让我肃然起敬,感到十分珍贵。

这是一张 50 年前的历史照片,是满载着连云港人民、尤其是连岛人民无限光荣的照片;这是一张 1500 多人合影的巨幅照片,是 1957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时的合影;这张照片,反映的是解放初经济恢复时期老一辈连岛渔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定走互助合作化道路,使连岛渔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恢复和发展时而呈现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刚解放时,连岛设有西山、东山、大路口、水岛、东连岛五个行政村,2000 多口人,渔民大多是一家一户松散型作业,而且不像对岸的陶庵、墟沟、海棠有黄花船那样的大船可到远处的“南洋”捕黄花鱼,整个连岛只有 10 余条小渔船在近海小取,大部分渔民靠在海边张钩、钓鱼、拾海、推虾皮、做生意、上山种地、砍草等维持生活,连岛生产和渔民生活尤为困难,许多渔民家无余粮、人无分文,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根据这一情况,1949 年政府成立救灾委员会,在全市沿海建立了 9 个渔业水产供销社,组织干部深入到渔民中去,制定生产计划,为渔民发放贷款,扶持发展渔业生产。1951 年市水产科在连岛乡进行互助合作试点,建立了以谭宝庆为组长的全省第一个渔业互助组。通过互助合作活动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党和政府在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 1953 年发挥渔业供销社的经济杠杆作用,为渔民家家解决入股基金,为每户渔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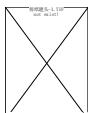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发放贷款 300 元人民币,解决了渔民置网和口粮等生产、生活资金问题,使渔民生产迅速发展了起来,紧接着在 1954 年 8 月,在市委的组织下,正式成立了以谭宝庆为社长的连岛第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即为连岛历史上颇有盛名的“八一社”,实行“人评技术网评分”,即以工具参与分红的分配制度,促进连岛渔业生产大发展。到 1955 年,连岛渔民就实现了家家有渔网,人人有活做;家家有余粮,人人有饭吃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沿海生产、生活水平最好的地区。当时连岛渔民满怀喜悦、干劲倍增,使连岛渔业很快走在了全市前列,为全市渔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从 1958 年开始,连云港开始大力发展海带养殖,充分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问题,使每一个渔民都有活干,尤其是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从而使渔民家庭收入在江苏名列第一,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在互助合作时期,连岛涌现出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党的政策、积极苦干、带头搞互助合作的先进生产者,谭宝庆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渔民代表。谭宝庆同志思想进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动渔民开展互助合作。自 1953 年以来,先后多次被评为市、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56 年,谭宝庆首次当选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7 年 2 月去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代表大会,也是连云港市第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从而为连云港渔业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这是谭宝庆同志的光荣,也是连岛、连云港市人民的光荣,更是那些与谭宝庆并肩战斗过的连岛老一辈渔民的光荣。

江苏省第一个渔业互助组

1951 年夏,市水产科根据上级领导指示精神,在连岛乡渔村进行渔业合作化试点,谭宝庆带头响应,拿来自己家里的渔网,动员了张加永、马锡福、谭立功、杨光王介等 13 人成立了江苏省第一个渔业互助组,在全国沿海也属最早的,谭宝庆任组长,张加永任副组长。他们没有钱买船,就租了一只船进行生产。互助组秋季出海就获得了大丰收,收入比同村单干户收入高出一倍。在谭宝庆互助组的带动和影响下,到年底连岛成立了 18 个渔业互助组,连云地区成立了 31 个渔业互助组,计有船只 71 只,网具 1948 条,劳动力达 800 多人。是年冬季,谭宝庆互助组自己买了一只船,而且向兄弟组进行挑战,掀起





了捕捞竞赛热潮。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所有互助组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增产计划”,使连岛和连云港在经济恢复时期,呈现出人人比干劲、比贡献、早出海、勤开网、多捕鱼,既增产又节约的生产新气象。经过半年来的生产,谭宝庆互助组就增产节约 6650000 元(北海币),为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宝庆互助组经过两年的发展,已达 20 多户、劳动力 40 余人,大网 32 条,小网 17 条、船只 3 条,采用了“人评技术网评分”的分配制度,年底一个劳力加一条网可分得 3398300 元(北海币),明显高于其他互助组的收入,为连岛及全市互助组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全市乃至苏北地区第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八一社”

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实现生产合作,扩大再生产,市委决定以谭宝庆、杨光瓚两个互助组为重点建设对象,把他们 50 多户人家 300 多口人、6 只船、78 条网具联合起来,于 1954 年 7 月 17 日组成了全市乃至苏北地区第一个以工具分红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于 8 月 1 日正式成立,定名为“八一”社,谭宝庆任社长。第一年“八一”社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冬季每个男劳力分配达 620 元(人民币),使家家分得七八袋小麦(约 1500 余斤),高于一般互助组收入 24%,解决了全年的口粮。到 1954 年底,在谭宝庆“八一”社的带动下,连岛在东连岛和西山又成立了 2 个渔业生产合作社,直接推动了全市渔业生产的快速发展。1955 年,连岛渔业产量占连云地区 2/3 还要多,连云地区产量达 1700 万斤,全市沿海其它地方加起来不足 100 万斤,可见当时连岛渔业对全市渔业生产乃至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由于连岛渔业在全市的重要地位,在全省、全国都有重要影响,许多沿海地区渔民兄弟纷纷到连岛学习,而且互助合作化时期的精神,对后一阶段连云港渔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影响,使连云港渔业不断涌现出更多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涌现出连岛的王士杰、胡广贵等捕鱼能手。王士杰一网捕捞 20 多吨小黄鱼,创产值 20 多万元,一时在全省传为佳话。

关键点:

- 1、1951 年,连岛成立了江苏省第一个渔业互助组,当时在全国也属最早;
- 2、1954 年,连岛成立了连云港和苏北地区第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即远近闻名的“八一社”;
- 3、1955 年,连岛乃至全市渔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渔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 4、1956 年,连岛渔民谭宝庆当选为连云港市第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 5、1957 年 2 月,谭宝庆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与代表们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接见并合影。

相关链接

黄花船

黄花船:载重量几十吨至近百吨,一船有三至五条桅杆,船体大,抗风浪性能强,能从事远海作业。船上配有十二人(或更多)。谷雨前后去吕泗洋打黄花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资源丰富,市场行情较好,打黄花鱼时,只开一网或两网就能

捕获大黄花鱼几十吨满载而归。为表示丰收,进港前在大桅顶端挂一面红旗(称插重旗),若特大丰收,再在头桅挂一面红旗。家人在岸边望见插着红旗的黄花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载誉归来,便奔走相告,鞭炮齐鸣,其情景十分热闹壮观。待到小满时节,黄花船换上团网打鳎鱼,夏季上坞修船,秋冬季节进行海上运输。

吕四洋

吕四洋即连云港地区所说的“南洋”,位于江苏南部长江口沿岸,属黄海南部近岸的南通启东海域。吕四洋历史上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渔场之一,以盛产大黄鱼闻名。大黄鱼又名黄花鱼,体长八寸左右、高二寸余,头大,身带黄色。由于过度捕捞,1958 年后产量急剧下降,现在属稀有鱼种。

北海币

北海币是由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主要银行。它于 1938 年秋在山东掖县(现莱州市)创建,逐步发展成为遍及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自 1938 年至 1945 年北海币各版,目前发现的有 100 多种。在迎接全国解放的胜利进军中,北海银行于 1948 年 12 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边远山区沿海,解放初仍使用了一段时间北海币。10000 元北海币等于 1 元人民币。

渔业水产供销社

渔业水产供销社是在刚解放时期政府为解决沿海渔民生活、恢复和发展渔村经济,在 1949 年建立的以供应生活、生产物资,提供生产、生活贷款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实体,为渔村发展互助合作,恢复渔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当时参与和组织连云地区搞互助合作的领导人之一的王大纲老局长回忆,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渔村贷款没有偿还的保障机制,没有人能够担保。从 1953 年起,通过渔业水产合作社为渔民进行贷款担保,一下子解决了渔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问题,使渔业从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王大纲

王大纲,山东莒县人,1924 年出生,1943 年家乡解放时参加革命,1947 年入党,1950 年到连云港(当时的新海连市)工作,任墟沟区助理员,1952 年任连云区区长,积极推动连云地区尤其是连岛渔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建设,1958 年至 1966 年任连云港市水产工作部副部长,兼水产局局长,1975 年任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1986 年退休。在解放初,渔业经济恢复时期,王老等老一辈渔业工作者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堪称连云港渔业生产的拓荒人。

人评技术网评分

人评技术网评分是在互助合作特殊时期的一种最为原始、也是最为有效的分配形式。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渔的积极性,多置网、多捕鱼,积极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政府以劳动力、网具、船只等作为进行分配的依据。当时劳动力按技术评分,一口网评多少分、一只船评多少分,到年终按照收入多少进行分红。

(作者单位:连岛度假区管委会)





抗战初期海属地区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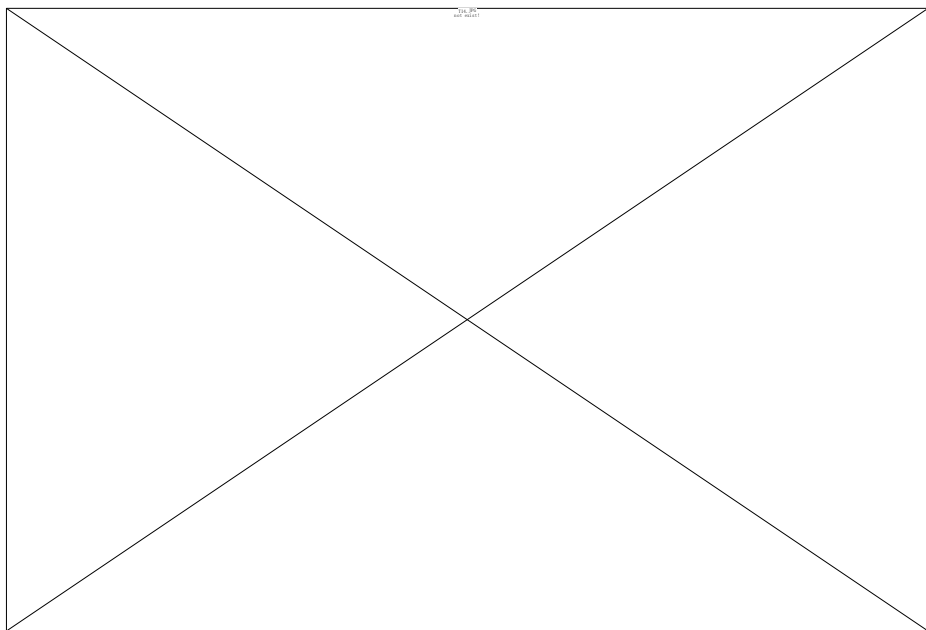
※ 宋继奎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海属地区人民为了反抗侵略者，不仅拿起了刀枪，与日本侵略军英勇厮杀，而且拿起了文化宣传斗争这个武器，去催人觉醒奋进，鼓舞人民抗战到底的斗志。

早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沭阳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就在天乐剧场上演了朝鲜爱国剧《安南前》《顽石点头》，宣传抗日，并把募集的 300 元钱献给马占山领导的东北义勇军。1936 年，沭阳县立初中的学生上街演唱《在松花江上》、《流亡之歌》等，不久又组织文艺宣

传队，宣传抗日。同年，驻海州税警团组织业余剧团，演出《在白山黑水间》《抵制日货》等宣传抗战剧目。这些宣传活动均起到了鼓舞人民斗志、揭露敌人暴行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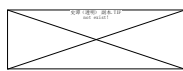
1937 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于同年 9 月 13 日侵占了连云港前三岛，随后对海属地区狂轰滥炸，人民死伤惨重。为阻止日军从连云港登陆，东北军第 57 军第 112 师奉命保卫连云港。1938 年 3 月初，中共长江局派谷牧等人在 112 师建立地下工委，发展 667 团团长方毅为特别党员，并在该团各营建立地下支部。同时，将中共领导的山东高密游击队中的中共党员、民先队员等 80 余人以新兵入伍的名义加入 667 团。这支新兵队大部分分配到各营连作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留下 20 余人在团部组成宣传队，负责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写抗日标语，还办了油印小报《火线下》，团长万毅经常给小报写稿，宣传队还对驻地民众开展宣传工作。对激励军民誓死保卫连云港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海属地区一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党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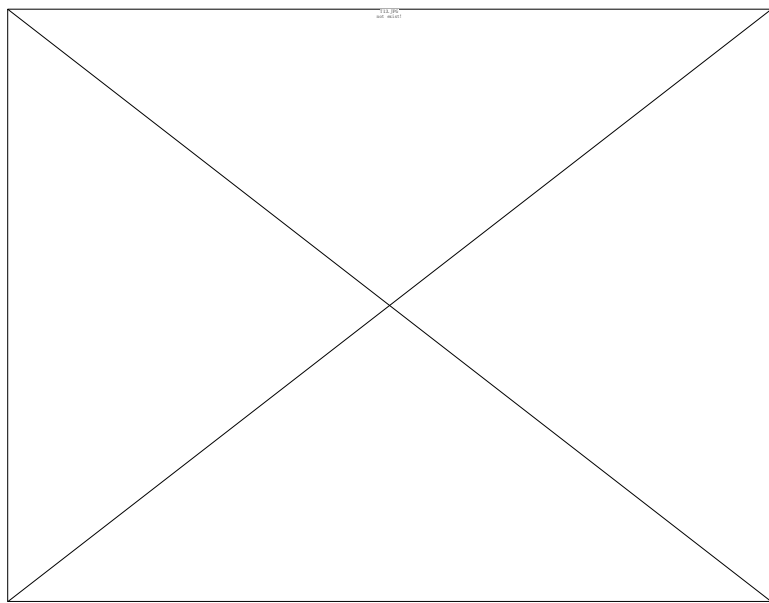


《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现场

织遭受严重破坏而中断活动，或失去组织联系而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也自觉地按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广泛团结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使党的影响在新形势下不断扩大。1937 年夏，东海县的共产党员周晓江、郇华民、李铁民等人以郇圩小学为中心，联络刘锡九等近 20 名进步青年，经常聚会阅读进步书籍，收听电台广播，讨论抗日形势。他们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义勇团”，很快就发展团员五六十人。1939 年，又在中寨村开办“文化服务社”，油印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籍，在周围几十里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灌云县的共产党员孙若溪、厉国栋于 1937 年秋返乡开办孙家渡小学，以此为基地发动师生参加救亡运动。史成章从上海回到家乡响水口，联络徐禹民等人集资创办《抗战三日刊》小报，转载各地抗战消息，报道本地发动抗战情况。孙存楼、武永嘉等几十人成立“腊九社”，推动了东灌沭一带的抗日宣传活动。1937 年秋，热血青年汤曙红在汤沟小学举办“读书会”，





抗日宣传

成员近百人,阅读进步书籍,同时组织“汤沟剧团”,走上街头演讲、演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

1938年初,赣榆县共产党员陶君彦在墩尚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青年救国团”、“醒民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老从军》等剧目,发动数十名青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在沭阳,县立初中学生王茂前等人于1938年春创办《前哨》刊物,曾全文转载毛泽东《论持久战》,引起轰动,学校当局和三青团极力破坏,他们便到一座庙里继续出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海属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1937年11月,国民党第五战区成立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该会主任。他邀请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为该会委员,中共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为该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向各县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动委会指导员。派到东海县工作团的中共党员孟宪禹、闫西珍,在郇华民、李铁民等人支持策划下,成立“东海县抗日救亡宣传队”,曾趁房山大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州血》等节目,观众达万人之多,群情激愤,收到极好效果。接着又步行到全县集镇及新浦、海州巡回演出,历时3个多月,行程300多里,影响很大。一次在东海师范礼堂为57军演出,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强烈的思乡之情,个个热血沸腾,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半夜里,一位连长因情绪激动,大喊大叫要带队伍去日照县石臼所打鬼子。由于有“东海县抗日义勇团”的活动基础和“抗日宣传队”的广泛影响,1938年8月,周晓江等串联200多人成立了“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很短时间,各区乡就成立分团24个,有团员800多人。“青救团”总部创办了《大众三日刊》、《青救周刊》、《儿童画报》,大力宣传抗日,在全县城乡掀起了抗战高潮。

灌云县四区、五区在“动委会”名义下先后创办《动员报》,以转载延安消息为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组织宣传大

队。共产党员周春如团结20多名进步青年,在县“动委会”名义下,成立“灌云县抗日救亡巡回宣传团”,到各乡镇演出《血战卢沟桥》、《宛平战斗》、《古城怒火》等节目。1938年初夏,许家屯、吴建等人通过国民党灌云县一区区长的关系,成立“灌云县青年救亡工作团”,组织了“城区歌咏话剧团”,创办了《灌云日报》,宣传抗战。1939年秋,厉国楨、孙若溪等人在进步士绅吴辟初(后任淮海区参议员,1943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资助下,创办了《实话报》,后因日军“扫荡”收音机被毁一度停刊,不久又转移到盐河东岸改刊为《胸阳报》继续宣传抗战。1938年6月,孙若溪等人先后举办“教导队”宣传训练抗日骨干,成立“抗日研究会”推动抗日宣传理论工作,组织“救亡话剧团”到各地演出;同年9月又创办“陡沟战时中学”,除普通中学课程外,还增设

全民抗战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救亡歌曲、军事知识等,后来大部分学生参加了抗日队伍。

赣榆县的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主张抗日的国民党赣榆县县长朱爱周共同抗日。朱爱周邀请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政工大队,下设抗战演剧队,演出时装京剧《忠烈图》等。并任命共产党员刘寄萍为县常备大队政训处主任;创办《新赣报》、《战斗新闻》、《新闻简报》油印小报,由中共赣榆工委书记陶君彦任主编。有力地推动了抗战。

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高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直接推动了各地抗日武装的建立。例如,在汤曙红举办的“汤沟小学读书会”和“汤沟剧团”的宣传推动下,连五、汤沟先后组织起“抗日自卫队”等武装组织。1938年春,一支2000多人参加的“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正式成立,汤曙红被推选为大队长。同年8月,汤曙红串联邻县抗日武装成立“东灌沐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下设多个游击大队,汤曙红被推选为总指挥。后来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汤曙红被任命为团长。又如,陈飞、徐禹民等人在创办《动员报》的基础上,举办武装训练班,利用当地地主等自卫枪支对数十名农民进行训练,为组织抗日武装作了准备。东海县周晓江等人搜集18支枪,成立了“青救团武装队”。有的爱国人士在抗日宣传的鼓动下也奋起建立抗日武装。曾任国民党灌云县第三区区长、时任连云汽车公司经理的孙笃生,在共产党员孙存楼的建议下,卖掉汽车公司,以其资金建立起“抗日游击队”,并请孙存楼等人负责具体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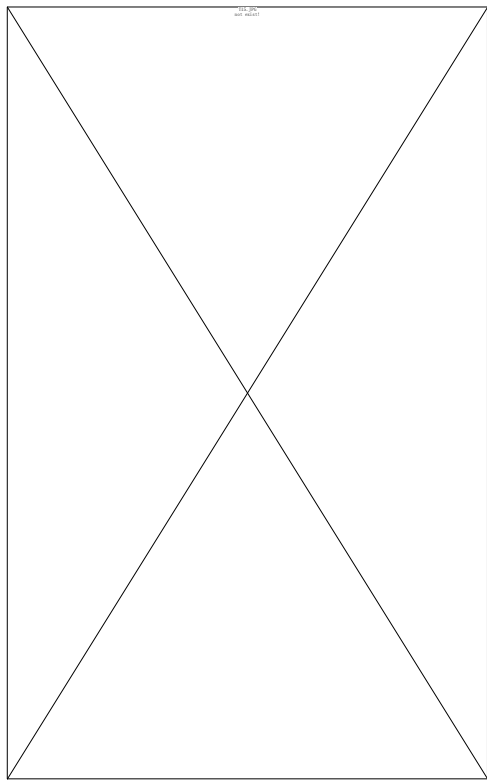
纵观在海属地区抗战初期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中,一批共产党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他们团结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高潮,为推动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作了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为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



『
淮海
』
释地

※李洪甫



射阳稿卷吴承恩在《广寿》中自称“淮海浪士”

提起“淮海”这两个字，似乎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指的是哪里，实在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可是，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追究起来，又可以说：古今文献所记载的“淮海”，具体实指纷纭不一、引述含混，甚至相向遮隐，互为抵牾……

原因是淮海之地望，幅员极其宽广：被及名山，逾越大川，汲饮了大洋波澜；淮海之人文，涵盖深邃：包孕夷、夏，滋养齐、楚，荡响着汉风吴歌……

古往今来，“淮海”这个地域概念被频繁而且宽泛地使用，即便从书面语言算起，“淮海”这两个字，也已经用了3千年，几乎遍及经、史、子、集乃至类书、稗官、笔记……其历程之久远，可以和任何一个最为古老的地名相提并论。

博大精深的中华语言文字学、传承久远的历史地理学，面对一个听起来耳熟能详的地名“淮海”，只能歧说并存；最懂得准确表述、又最擅长凝想概括的辞学家想要给“淮海”这个地名一个允当的诠释，竟然深感棘手——无论是在较为权威又颇能包罗万象的《辞海》里，还是在学究气甚为浓郁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里，都找不到“淮海”这一辞条。

想要扪触淮海文化的真谛，我们不得不通过历史的隧道去真切地体悟几千年来古人审视“淮海”的视角。

被称为中华上古历史文献汇编的“书经”《尚书》在《禹贡》里对淮海洋津乐道：

一说“淮海惟扬州”；一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好个淮海！九州大地占了两个州，天下九分而占其二！依照这一地望所指，淮海之北界，可及秦、岱、蒙、羽诸山，黄、沂诸水；南境，可揽大江、淮、泗、洪（泽）、太两湖……可谓铺天盖地，横无际涯，

难觅端倪。

是这本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不够严谨？且看，后辈的史地学者以及皇家的编史著述乃至俚俗文学对“淮海”这一地望之释解的袭承——

唐人李善曾经借《墨子》的语录以证明夏禹王朝的南部疆域达到了长江、汉水以及淮海，李善注《文选·江赋》引《墨子》曰：

“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海。”

《后汉书》也明白地提到了淮海：许汜与刘备一起在荆州牧刘表那里座谈，刘备和众人共同讨论天下的英雄才士，说到汉建安时代的广陵太守陈登，许汜感叹：

“陈元龙，淮（一说湖）海之士，豪气不除。”

这个“淮海之士”，比起“淮海居士”、高邮人秦观以及“淮海浪士”、淮安人吴承恩，那可是早了800乃至1200多年的同乡前辈啊！

《晋书》的《列传第四十二》引用“好经术，博学有高才”的郭璞的言论，提出了淮海的地望，这位以注解《山海经》且“妙于阴阳算历”、“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而享誉史学史的地理学者，不会转述一个不存在的地域概念——

“皇运暂回，廓祚淮海。龙德时乘，群才云骇。”

《梁书》的《敬帝本纪》记载，太平二年（557）正月，朝廷在发布诏书确定当朝的文物制度和选拔官吏之办法时，很清晰地陈述了淮海地区的衣冠服饰对周边的影响：

“其荆、雍、青、兖，虽暂为隔阂，衣冠多寓淮海”；

《魏书》的《志第十九》述及职官时：在“右第六品”中提出了“监淮海津都尉”；

《周书》在《列传》中也明确地记录了“淮海、山林二都尉”连《佛祖统记》一类的佛教经籍中也有相关淮海的记载：

“梁开平初，加封尚父淮海节度使”；

甚至，对于发生在淮海地域的战事，《元史》的《董士元传》，也会就战场所处的地望，作出明白的载述：

“江淮既平，伯颜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损者二将而已’”；

此处的“淮海之役”与670多年后的“淮海战役”相较，其战场所在，差之千里。

《明史》的《繆大亨传》以及《续资治通鉴》的卷二百一十四里，还有“淮海翼元帅府”以及改扬州路为“淮海府”的记录；《清史稿》在《防军陆军》里提到了一支保留建制时间很长的以淮海命名的水上部队：“其淮海水师、练军卫队，悉仍其旧。”

笔记、稗官、诗词等私人撰述里涉笔“淮海”的也举不胜举——

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曾经做过御史中丞的封演，写过一部《封氏闻见记》，以“语必微实，足资考证”见称于世，其中谈到：



“余少居淮海，日夕观潮，大抵每日两潮。”
唐人封敖在论述江西的形胜时也如此赞叹：
“为淮海之襟带，作吴楚之把握。”

《景德镇陶录》还籍“淮海”之地灵张扬了江淮的文采和物华：

西江八载赋春华，淮海乘春又放槎。

古小说里也有很多的“淮海”，不仅有地望涵盖的表意，更抒表了浓郁的淮海乡情。《窈窕》里就有“家寄淮海”、“自淮海调补金堂令”的指述，而且，引有一首怀念淮海、凄然思乡的诗，与淮海的地望准确地对应：

“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

望月独相思，诗襟泪痕满。”

尤其是历史演义型的小说，几乎篇篇有淮海：如《南北史演义》第九十回里的“谓将巡历淮海”；《五代史演义》里的“漕运总督府下设淮海道”……

以明代农民起义女首领唐赛儿故事为背景的清代小说《女仙外史》在第八十二回《收英才六科列榜》中，指说淮海之滨是隐居佳地：

“遣发妻子居淮海之滨，易黄冠，遍游天下名山，后结茅匡庐以终。”

或许因之于古老淮海拥有灵动的流韵和飘逸的风采，历代文人竞相将自己的著述寄题于斯，比如：梁简文帝第二十子萧大圆的四卷《淮海乱离志》，唐代罗隐的《淮海寓言》以及曾经为万历皇帝讲授《尚书》的孙应鳌所著的《淮海易谈》。清代著名学者、自号芸台的阮元还写有一本有盐业文化背景的《淮海英灵录》。

著名的类书《艺文类聚》收有沈约的《和陆慧晓百姓名诗》：

建都望淮海，树阙表衡稽。

井干风云出，柏梁星汉齐。

二

现代的地域词汇里，富于地域特色和人文内涵的“淮海”，被使用的频率依然居高不下。广播电视有“淮海大地”；学校有“淮海工学院”；戏曲有“淮海戏”；文学有“淮海词”、“淮海晚报”；经济学领域有1986年建立、联络四省以及14个地级市的“淮海经济区”……

许多相关淮海的人文存留，仍旧挂在人们的嘴边。在徐州，有淮海战役纪念地——淮海路，也有一个被国人唾弃的日伪政权“淮海省”；在淮安，有自号“淮海浪士”、“淮海竖儒”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高邮，有自号“淮海居士”、著有《淮海集》的秦少游；在扬州，有著名的古建筑“淮海楼”；在泰州，有称之为“淮海名区，汉唐古郡”的厚重而亮丽的城市名片；甚至在镇江，还有一座依然被人们常常提起的载入《元史》的“镇江淮海书院”，它的院长就是那位“具通《五经》大义”、官至礼部尚书的曹鉴……

所以，现今意义上的淮海，可以指述苏北、淮北、苏东北，可以涵盖苏中的镇、扬、盐、泰；其西界，领属淮河上游两岸地属安徽、河南的全部区域；其北界，兼及秦、蒙山脉和沂沭诸水；而它的东方，则是最为醒目的1500多公里的海岸线……淮海，是画在苏、鲁、豫、皖接壤地上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古老的文化圈……

就是说，淮海这个概念，沿用了30个世纪，依然可以与中国上古文献汇编中最早的一本地理规划书《禹贡》印证、对接，

在这篇短短的一千多字的上古文献中，相关淮海的陈述不过百字，却能广被万里，贯通今古。

从文献辩证、尤其是从现代考古学的立场出发去论说“淮海”地望最初的本义，还是应该上溯到原始先民的治水。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江苏灌云县人武同举说过，淮水的疏导是从大禹开始的，我想，这里也不能忽视女娲的治水壮举，他（她）们的祈望都是让淮水平安地入海，所以淮河及其下游应该是淮海的最早的地望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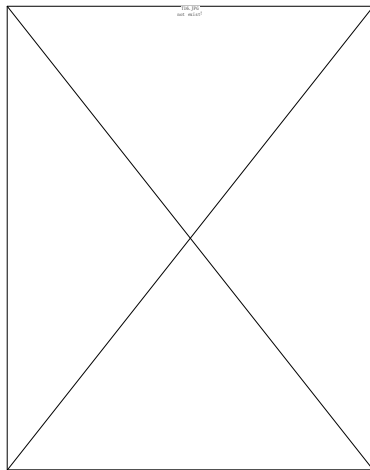
出生于淮河岸畔淮安打铜巷、祖籍一度归属淮河下游海州之涟水的吴承恩深刻地理解了古籍，十分执着地在自己的名号上冠以“淮海”二字：“淮海浪士”、“淮海竖儒”。他把长期流传的以唐僧为主人公的西游故事改创成以孙悟空为男一号的世界名著《西游记》，正因为猴王的原型之一是镇淮水平安入海的淮水水神无支祁——那是一只“金目雪牙”的猿猴。这猴子和吴承恩一样皆是土生土长的淮海籍。

五千年来，尤其是吴承恩所处的封建社会后期，淮海人最大的疾苦莫过于水害。在淮安城被大水围困之际，吴承恩就曾偕同淮安知府陈文烛一起为淮水退海而祈祷。吴承恩对淮海水害耿耿于心，在《西游记》的字里行间有充分的流露：他痛恨龙王兴起水患，借孙猴子大闹龙宫，借魏征之手梦斩蛟龙……他还期盼有一位能借助治水女娲神力的强者治理水患，于是，海州云台山顶那块传说是补天剩下的娲遗石，又成为描摹孙猴子出世的模特……

三

北界秦岱、南抵大江的淮海，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孕育了上古文明中引人瞩目的淮河文化和最早意义上的海相文化之间的融合。

源出中州、豫皖的淮河，裹挟着千百万华夏先民的欢欣和磨难，奔腾东向。或散布横流，或迂回曲返，不断地泛滥，加之黄河的反复夺道，酿成了连年的灾难。从女娲到大禹，从少昊到尧舜，无数的部落英雄和古之圣贤为之折腰，关注并力行于水害的治理。治水的长年实践，凝结为淮海的文化痕迹。淮水河畔，晾晒着一部部经济发展史、物质文化史乃至中华思想史，这些精纯的人文创建汇入了栖息在沿海山地的早期人类的觉醒，流向无限包容的太平洋文化圈……这是淮海文化博大精深合成。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吴少微



淮河水浓浓地浸泡着文明,急切地在东方寻觅着入海口。地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里对淮水入海的流向作出了毫不含糊的交待:

淮水“历朐县与沭合,又迳朐山西”,“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

此后,历代的地理典籍尽皆认同:古称郁洲山的云台是淮水的入海口。

据《大清一统志》和《江南通志》的《水利志稿》以及武同举绘制的《江苏江北水道图》,淮水及其支流在云台山境内的入海口有15处之多。云台山俯临浩瀚,傲峙于群水之首,镇淮入海的雄姿,一望可悟。明万历中叶以降,朝廷多次敕谕云台庙宇,最热衷的题名就是“海宁”禅寺、“海宁”古塔。联想到《明史》在《五行志》中痛陈“淮水大溢”的29次灾难,人们仿佛感觉到万历皇上扶笔题旨或口吐玉音时的那种战战兢兢和心有余悸。

在《西游记》中屡惩龙王的吴承恩面对惨厉的淮河水害,曾经写过一首激愤而热烈的《瑞龙歌》:

忆昨淮扬水为厉,
昌郭襄陵洶无际,
皆云龙怒驾狂涛,
人力无由杀其势。
忽然溪壑息波澜,
细草平沙得龙蛻,
峥嵘头角异寻常,
犹带祥烟与灵气。

……

高家堰报水土平,
世运神机关进退。

……

(上接第36页)与邱处机栖真地长真庵相邻的吴家花园;就云台山的风物而言,水帘洞、花果山、傲来国、玉女峰、尉迟公塔、定海神针、平顶山乃至诸多的唐王遗迹,皆在西游故事中有清晰的投影,其中花果山几次大战的古战场至今依稀可见。在《〈西游记〉与连云港市云台山“三元”》一文中,他提出:“大仙与云台山大仙庵的住持清风以及三元的中元、人参果与海州通草、大仙的徒弟清风与云台山大仙庵的住持清风以及三元宫建筑群中的清风古刹和明月庵,可能是模特与小说人物的关联;西游人物‘清风’在现实生活中与‘鲁王府’、与《西游记》书稿、与曾有王府过从的吴承恩,甚至与朱鼎臣应该有所关联;《西游记》以第9回专写陈光蕊的家世,其子唐僧在人参果的纠葛里与海州传说中的陈光蕊儿子三元中的中元相遇,并且亮出了二者的兄弟关联。因此,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接受了海州陈光蕊家世的传承材料,当是不刊之论。”

上述说法如果证据确凿、逻辑严密关得到学界同行普遍认可的话,确实能解决《西游记》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料的缺乏是关键所在,研究的突破将取决于文献的突破。

《西游记》尽管是神魔小说,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需要从前代文学及民间文艺作品中汲取营养,因此追溯其创作资源,探讨一些人物、情节的原型还是必要的。孙悟空、花果山之外,本年度研究者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原型的探讨。比如洪婧的《〈西

游记〉原型意象浅析》一文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问题,提出《西游记》是一部非常适合借用原型批评方法来探讨的古典名著。作品中隐含着灵石神话原型意象、动植物图腾崇拜意象、灵魂崇拜意象等多方面的远古原型意象,通过非现实的神话领域呈现出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观念和集体潜意识。具体探讨则有黄凌云的《〈西游记〉中“法宝”等若干意象的原型研究》、李小荣的《〈西游记〉白鼠求婚故事考源》等文章。《〈西游记〉中“法宝”等若干意象的原型研究》一文运用西方原型批评理论,对《西游记》中的“法宝”等意象进行探讨,提出《西游记》是由神秘思维和审美经验两种因子融构而成的文学经典。“法宝”等意象记录着华夏祖先的美好愿望,是《西游记》在我国民间文化中浸染数代的标记,是民族心理的折射。《〈西游记〉白鼠求婚故事考源》一文则找出《西游记》白鼠求婚故事的两个来源:“一者关于其与托塔天王的的关系,主要是受唐代以降密教中的毗沙门天王信仰的影响;二者关于其向唐僧求婚的情节,则主要是借鉴了中古以来盛行的鼠魅故事中的相关因子”。

素多雄谋而颇有作为的康熙大帝,用他那治国安邦的眼光审视云台山,对此山镇淮入海的气度,大为赞叹,于康熙三十年(1691),亲为云台山三元宫题写了“遥镇洪流”的匾额,此亦淮海地望的最清晰明了的注脚。

流程两千里的淮水,犹如一条古老的苍龙从中州奔向云台,萦绕迂回的狂涛洪波在山脚下洒向大海,淮河的千年文明得以在这里积淀。淮水入海之前,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喟,写下了一个深色的惊叹号,这惊叹号,就是云台,它的主峰,就是花果山。

16万4千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涵及了华夏、东夷各族,孕育了夏、商王朝,润泽了东周、东汉;吹拂过浪漫的盛唐诗风,倾听过绮丽的北宋词韵,何止是被及苏北、鲁南的徐扬二州!林林总总,万千风物,都溶解进流淌不息的淮河,奔向大海。

孙悟空的原型是“俾淮水永安流注海口”的淮河水神无支祁,他的诞生之地、发祥之处是“势镇汪洋、威宁瑶海”、“东海之处耸崇嶷”的花果山。此间标示出吴承恩对淮海大地文明史深刻的认知,寄寓着吴承恩对淮水的浓浓眷念。他之所以自号“淮海浪士”、“淮海竖儒”,也正是源于他对淮海地望的充分领略。在他的诗文里,淮海二字频频呈现,如《鹤江先生诔》中的“淮海盘回”、《寿师相中玄高公启》中的“某等叨官淮海”、《广寿》中的“淮海浪士,闻之欢喜”……

淮海啊!淮海!——奔流的淮河平安入海。淮海二字,蕴藏着五千年来淮海人民浓烈的爱憎和殷切的期盼。

淮海文化的源起,与中华文明的萌发同步;淮海文化的时空,于中华大地乃至亚太、中东,纵横无垠!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同类文章尚有李姗姗的《〈西游记〉中的神话原型解读》(《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婧的《论西游记前七回的神话意味》(《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等。这些较为精细的探讨对我们了解作品创作过程、深入理解作品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一领域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李思惠节选自《2007中国·盱眙西游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年《西游记》研究述略(节录)

※ 南京大学 苗怀明

摘要:2006年的《西游记》研究虽未有太大的突破和进展,但也有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成果和特点,作者、成书、原型等问题依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有新的角度和思考,作品的文化特性、文学品格等也有比较深入的开掘。如何使《西游记》研究走出目前的低迷状态,寻求新的突破和生机,这是每个研究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与以往年份《西游记》研究的红火景象相比,2006年并不是一个大年,甚至显得有些平淡。其实不光是2006年,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游记》研究似乎就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与其他名著的研究相比,研究实绩显得单薄了些,缺少让人振奋的成果。其间虽然也有一些小的论争和喧闹,但对学术研究自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推动。《西游记》研究为何如此低迷,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而且必须给出答案的严肃问题。

当然,说2006年《西游记》研究的平淡是与其他丰收年份相比而言的,并不是说这一年研究者什么都没有做,什么成果都没有。说起来这一年研究者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据笔者粗略统计,2006年,大陆地区各类报刊共刊发与《西游记》相关的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学术论著5部。在学术活动方面,8月份淮海工学院在连云港举办了西游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全国)西游记论坛”,编印《西游记研究学术论文集》及《西游记论坛通讯》。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良好的学术积累,为更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孙悟空及花果山的原型问题也是本年度《西游记》研究的一个热点。与先前探讨有所不同的是,研究者不再继续孙悟空是外来猴还是本地猴这一问题的争论,而是要为孙悟空和他的花果山寻找直接的原型,由此还涉及到《西游记》的成书问题。

福建顺昌宝山的“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神位是近年来有关《西游记》文献的重要发现。围绕这一新发现,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年度仍有研究者继续这一探讨。比如齐裕焜在《〈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一文中提出,“福建顺昌宝山‘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神位的发现,有助于对《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西游记》成书应该与福建有密切的关系”。王枝忠、苗健青、王益民《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一文中有着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福建顺昌民俗中的‘大圣’信仰和物质文化遗产,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而百回本《西游记》的刊行对顺昌‘大圣’信仰的逆向影响和巨大改造作用,同样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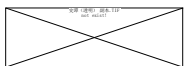
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能反映和证明哪些些问题,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对此,蔡铁

鹰写有《“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一文,其态度较为审慎,认为顺昌发现的这些新资料,“不能证明孙悟空祖籍福建,但可以证实中国本土文化中称为齐天大圣的猴故事确实独立存在过,并通过杂剧《西游记》与以佛教色彩为主的孙悟空猴合二猴为一猴,最后产生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精彩的大闹天宫故事,便是中国本土猴‘齐天大圣’家族对《西游记》的贡献”。

由福建顺昌《西游记》文献的新发现还引发了人们对孙悟空及花果山原型问题的关注,比如仅孙悟空的籍贯就相继有福建、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说法。经过媒体的宣传和渲染,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在这些新说中,以杜贵晨的山东泰山说较为引人注目,本年度他相继发表《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等文章,阐明自己的看法。在《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一文中,他提出《西游记》“四大部洲”的“东胜神洲”拟山东古齐地,与“西牛贺洲”相照应;“傲来国”、“花果山”拟自泰山主峰西南之傲来山,泰山有“水帘洞”;孙悟空“齐天大圣”名义为与泰山“东岳天齐”相反相成,而远远古齐之“天主神”;泰山有“玉皇顶”、“一天门”、“南天门”、“三天门”、“王母池”、地狱等等,为《西游记》虚拟“三界”之地域背景。其结论是“《西游记》写孙悟空‘籍贯’、‘故里’及其所大闹的‘三界’,有现实地理环境的参照即背景。这一背景是“五岳独尊的东岳泰山;西游故事最后形成的‘齐天大圣’是一只‘泰山猴’”。在《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百回本《西游记》描写原型为泰山独有的景观和可推断为泰山景观,以及可资联想到《西游记》故事的景观约有三十余处。这诸多景观与《西游记》所写地理环境对应的一致性或相关的密切性,表明泰山景观是《西游记》地理环境描写的主要蓝本,《西游记》的神魔环境与‘五岳独尊’的泰山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有摹本与原型的对应关系。泰山不仅是孙悟空“故里”,而且是大半部《西游记》故事的舞台背景。而《西游记》作者必是一位久居泰安熟悉泰山的文学家。这实际上已涉及到《西游记》作者、成书等核心问题。

山东泰山说之外,原有的江苏云台山说继续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其代表人物为李洪甫,本年度他相继撰写《花果山原型考略》、《〈西游记〉与连云港市云台山“三元”》等文章,申述此说。在《花果山原型考略》一文中,他提出就地望属性而言,花果山在“东方”“海外”,地近东海和淮水,云台山与这一属性没有抵牾;就《西游记》作吴承恩祖籍和诞生地而言,云台山是“淮海浪士”家乡的一座名山;就吴承恩亲朋故旧而言,云台山地域有其舅舅、老师、挚友,尤其是云台山有一支与淮安吴氏同宗相知的吴氏家族的聚居地,甚至有(下转第35页)



金苏大涧

与

《西游记》

※ 蒋金明

在我发表《破译通天河》一文后,我深深地迷上了《西游记》这本书。日常生活中自己不知不觉地对周围地理环境沉思着、探索着,想从某些地理环境中发现更多的西游文化背景。

要想领悟西游文化,必须阅读或者确切地说需研读《西游记》这本书。从阅读中发现、寻找书中有关故事情节地理状况,与今天花果山及周边地区的地形环境有相似的迹象,通过这些迹象再用心体会,同时感悟西游记中故事的内涵,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一步揭示西游文化与我市云台山的关系。

翻阅《西游记》如此厚重之文,要想读懂它谈何容易。一天翻阅《西游记》书时,看到《西游记》目录中第十五回时,标题“蛇盘山诸神暗佑,鹰愁涧意马收缰”中的“鹰愁涧”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为啥鹰愁涧的名字钩住我的思绪呢?因为金苏大涧有一形象石,此石很像老鹰之嘴,所以当地老百姓给它起名叫“大鹰嘴”或“鹰嘴石”,它的下面就是有名的金苏大山涧,鹰嘴石与山涧同在一处,鹰愁涧是否与此大鹰嘴下的山涧有联系?这些浑然不知,但不管怎样,先看看第十五回内容,然后再作分析。

《西游记》第十五回是这样介绍鹰愁涧的:“这涧中自来无邪,只是深陡宽阔,水光彻底澄清,鸦鹊不敢飞过,因水清照见自己的形影,便认做同群之鸟,往往身掷于水内,故名鹰愁陡涧。”从鹰愁涧介绍中可得知,在400多年前,吴承恩老先生对此山涧分析,“鸦鹊身掷水内”,是因为飞鸟们,在飞行中看到涧中水清照见自己形象,误认为是同群之鸟,便飞到一起,这样身掷于水内,造成鹊鸟或伤或亡。久而久之,这种伤亡现象引起鸟类害怕,所以吴承恩老先生把这山涧起名叫鹰愁涧。

在今天的金苏大涧里,有时也会拾到伤亡之鸟。这些伤亡之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西游记》中说鸟飞过山涧时,身掷水内而亡。今天我们无法验证鹊鸟在飞过山涧时,是否是这样的反应,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金苏大涧的特殊地形,容易造成飞鸟伤亡。就是此涧有田横岗将山涧撑开,使山涧成“丫形”,即山涧上游由两条山涧分别汇集一处,再成一条总涧。由于上游两条山涧分开较远,涧深又陡,较远的距离,山谷中形成的气流温度差异大,鸟类在沿山谷飞行时,交叉气流的变化使它短时间控制不住自己飞行,可能是易撞击山崖或身掷水内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又可能发生在幼鸟试飞时或夜里受惊之鸟伤亡现象可能比较多些。当然不管怎么说,金苏大涧飞鸟出现伤亡现象,是和《西游记》书中所说的鹰愁涧鹰愁现象极其相似。当熟悉金苏大涧环境的人们读到《西游记》第十五回时,会一下子便将金苏大涧纳入“鹰愁涧”范畴思考之中。另外,金苏大涧不但和“鹰愁涧”有相同的鹰愁现象,还有许多方面和“鹰愁涧”有相同相似之处。

如:“这涧中自来无邪”。时日金苏大涧有飞鸟在涧中伤亡现象,老百姓认为小鸟不慎撞上山崖而造成的,调查附近村民们说:山涧内没听说什么鬼怪之事,无论人们在涧里白天砍草洗衣服,晚上乘凉或行走山路的,都未有什么被鬼怪吓过。所以金苏大涧这里也是“自来无邪”的。

还有《西游记》书中所说的:“这条涧千万个孔窍相通……”这是描写鹰愁涧的,而金苏大涧涧底全是大小不一的石头,从山下一直相拥叠致,几乎是满涧底,石头与石头之间相互形成千万个孔窍相通的孔隙。水在石间孔隙中流走,形成



“故此波澜深远”。当然在雨水较大时,山涧水流才会涌上乱石来,又形成“千仞浪飞喷碎玉”的壮观美景。

又如:解释鹰愁涧时,又着重强调是“陡涧”。而金苏大涧是在高大的南云台山北坡,而北坡本身是险峻坡陡,山涧是依山势而成,所以山涧是陡的,这也是事实。

“鹰愁涧水光彻底澄清”才造成鸦鹊往往身掷于水内。金苏大涧涧壁陡峭,每次雨水过后,形成水流直射山下,水中杂质被洪流带下山去,常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山涧水中几乎没有杂质,所以涧水形成“水光彻底澄清”。另外,高大的山体,岩石中有渗透的山泉。云台山的山民们都知道,山有多高,山泉水就有多高,那几百米高的山谷,不知有多少泉眼,众多的泉水汇入山涧中,更显得“水光彻底澄清”。

“千仞浪飞喷碎玉,流归万顷烟波去。”这是鹰愁涧的水飞喷击石成碎玉状,最终流归万顷烟波。“万顷烟波”当然是很大很大的水面。早在《西游记》成书年代,云台山还处在汪洋大海之中,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的1712年前后,因黄河改道,云台山与大陆之间“渡口渐塞,忽成陡地”。《西游记》成书时离现在有400多年了,400年前的金苏大涧的山下,本身就是一片汪洋大海,这山涧之水下山入海,正是“流归万顷烟波去”的写照。从以上诸多方面分析,金苏大涧和《西游记》书中的鹰愁涧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用今天的话来说,金苏大涧应是西游记中鹰愁涧的原型,很值得人们去思考、探就。

《西游记》书中叙述鹰愁涧里被观音菩萨送条小白龙来,后来小白龙把唐僧的白马给吃了,在观音的指点下,又变成神通广大的龙马。现在我们了解到《西游记》书的创作,主要描写某处山、石象某种动物形象,并拟人化来叙写故事情节。但在今天的金苏大涧里,既没发现龙的形象石,又没发现马的形象石,看样子这里无法找到龙和马的踪影。龙和马的踪影找不到,虽然前面介绍金苏大涧许多特别之处和鹰愁涧极其相似甚至相同,但是,龙和马应该在这里有所发现才行。但为什么又找不到踪影呢?——自己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沉思了好久时间,由于找不着方向,使自己的思索陷入一片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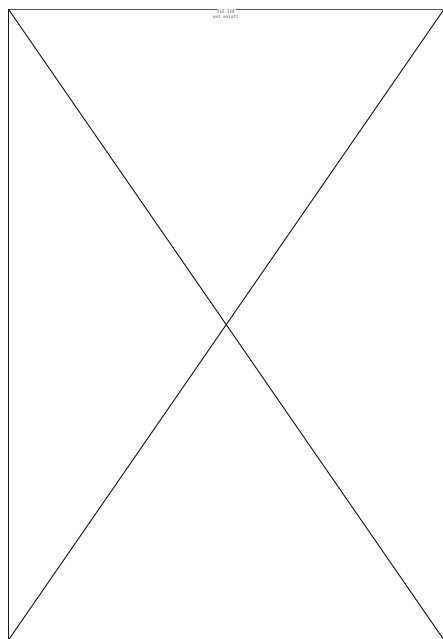
据西游研究者们认为,《西游记》故事是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编写成的。这一看法,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在思索中,发现金苏大涧在本地还有不同名称,如叫龙潭涧的,还有叫大青涧,南大涧,云中涧等等。为什么叫龙潭涧呢?在民间传说中,流传着这样一段民间故事,即“小白龙探母”的故事。讲的是小白龙母亲犯了天规,被天庭关压在西海龙宫后花园八角琉璃井里。等到小白龙长大成人后,小白龙问别人他的母亲在哪里,别人对他说,你母亲犯天规被天庭关压在八角琉璃井里,于是小白龙到天庭讲理讨个说法。但天庭根本不与理睬,于是小白龙气极败坏地将天庭的宫灯给砸了,被天庭武士们捉住。这样小白龙罪孽深重,玉皇大帝气极了判小白龙终身关在金苏山涧里不许出来。小白龙听后不服,并哭闹不止,要求天庭给具体说法,天庭回答:要等铁树开花马长角,才能出来。这是给小白龙一个骗局。铁树怎么能开花呢?马怎么会长角呢?于是小白龙仍然在哭,哭得惊天动地。小白龙知道无法出来,更无法见到他的母亲。原来在家时,他经常到后花园八角琉璃井旁喊他妈妈,并和她见面。小白龙是孝

子,特别孝敬他母亲。小白龙如此孝敬母亲,玉皇大帝知道后,批准他每年六月初三这一天回家看望他的母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小白龙探母”的故事。

说也奇怪,在大多数的年份里,每年六月初三这一天早晚,在金苏大涧深谷处或是山巅上,会出现淡淡的云雾。注意的人们就会说:小白龙今天又要去探母了。另外,当地群众还有这样的农谚:“六月初三发发燥,高山顶上也收稻”。这农谚不但说明很早以前金苏大涧山顶有云雾会出现,这云雾变化无穷,能变出各种形象,当然有可能变相出龙形。同时说明六月初三前后,金苏大涧这个地区雨水较多,高山顶上也能长好水稻。在古代云、雾、雨水又和龙有联系的。从上面就可得知这些云、雾和雨水的变化,可能就是这个故事的原由吧!

从《西游记》书中看出,第十五回中也有一条小白龙,书中是这样写的,“这厮本是西海敖闰之子。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又如观音对身边的揭谛道:“你去涧边叫一声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观音在此。他就出来了。”观音又说:“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讨他在此(鹰愁涧)。专为求经人做个脚力。”(玉:白色。是社会公认的颜色,所以今天的电影、电视、动画片等,都将玉龙称之为白龙。)《西游记》书中小白龙和民间传说“小白龙探母”故事中的小白龙大致相同,特别是小白龙的姓名、身份、籍贯都是一样的,都是西海龙王三太子,所作所为及罪行处理,也基本一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民间故事与《西游记》中的小白龙情况具体分析对照一下,揭示两处小白龙是怎样的关系。

- 鹰愁涧中的玉龙
- 1、身份:西海龙王玉龙三太子。
 - 2、涧里本来无龙。
 - 3、小白龙来源:那条龙是我(观音)亲奏玉帝,讨他在此。
 - 4、罪行:天庭上犯了死罪。
 - 5、宽容条件:愿意改造,为求经人做脚力。



金苏大涧瀑布



金苏大涧里的小白龙

- 1、身份：西海龙王三太子。
- 2、涧里本来无龙。
- 3、小白龙来源：小白龙犯天规，被玉皇大帝压在此山
- 4、罪行：被天庭判无期徒刑，铁树开花马长角才能出来。
- 5、宽容条件：每年六月初三回家一次看望母亲。

从以上《西游记》书中与民间故事分析出，《西游记》中“鹰愁涧马收缰”这一回，基本上运用“小白龙探母”中的故事情节，将小白龙原本写进书中。特别指出的是，鹰愁涧的小白龙和金苏大涧的小白龙，他们的姓名、身份、籍贯等都相同，都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当然就是同一个人。反过来证明，《西游记》书中的小白龙所在的鹰愁涧，和民间传说的小白龙所在的金苏大涧也应是同一个山涧，用今天的话说，金苏大涧就是《西游记》中“鹰愁涧”的原型。

吴承恩老先生在书写《西游记》小白龙故事时，将“小白龙探母”民间传说简略改动一下，所不同的是民间传说中的小白龙被天庭判无期徒刑，只是每年回家一次看望母亲。而《西游记》中是安排了“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理念。如观音说：“是我亲奏玉帝，讨他下来，教他与唐僧做个脚力”。在鹰愁涧里观音又对小白龙吩咐道：“你须用心了还业障，功成后，超越凡龙，还你个金身正果”。小白龙用心领会，于是兢兢业业为唐僧做脚力。

谈到这里，会有人提出相反意见，即你介绍的民间传说，也许是来自《西游记》吧？笔者认为不可能。如果这一民间传说来自《西游记》书里而传至民间，那小白龙吃马变马这段故事就会夹在一起于民间流传，实际民间没有将这个过程接过去。《西游记》这本书已经面世四百多年了，根本没有听民间还有小白龙吃马变马的以及其他传说，更没听到“小白龙探母”故事与《西游记》有什么瓜葛。因此，可以说，《西游记》中的小白龙故事是来自“小白龙探母”民间传说。

至于书中讲到小白龙吃唐僧的马，后来又将小白龙变成马，即龙马。这是吴老先生为解决唐僧取经中的行程问题所精心设计的。现在大家知道，唐僧取经西天之路是青藏高原等荒无人迹之地段，爬山越岭，过河涉水，是非常艰辛和危险的。唐僧是肉体凡胎，“这万水千山，怎生去得！”观音菩萨安排好取经人，除唐僧外，还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在鹰愁涧时，八戒、沙僧还未入此队伍）。后三者孙悟空等人神通广大，能腾云驾雾，飞越天险，行路没问题。但唐僧不同，必须有较好的交通工具帮助才行。当时唐僧取经出发时，唐太宗送了他一匹白马。马是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这马再好，也是凡马，无法飞越天险，无法攀崖过河，怎到那灵山佛地？是凡马，还得吃料放牧，如果马生病跌伤怎么办？中途重新换马怎么办？等等。这些都要花费《西游记》作者大量笔墨，太多的罗嗦，引发吴承恩老先生的思索。正如观音所说：“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万水千山？怎能到得那灵山佛地？须得个龙马，方才去得。”但谁又愿意去西天取经吃苦呢！只有犯罪又得宽恕之人，于是想到了小白龙。龙有腾云驾雾飞跃天险之能势，马有大地奔跑和运输的能力。在吴承恩老先生的笔下，由龙和马具备的共同能力结合而成的马最好，即龙马。也是吴老先生想要得到的“意想

之马”。于是安排小白龙吃了唐僧之马。孙悟空和小白龙打斗，小白龙钻入草根与千万个孔窍相通的石缝里，让孙悟空使不上劲，又去找观音。当小白龙知道他们都是帮助唐僧取经之人后这才化解了误会。后来小白龙在听从观音发旨，“观音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即变成他原来的马匹毛片。”这样白龙马就问世了。

从《西游记》书中得知，小白龙吃马变马的全过程，都是在鹰愁涧中进行的。又从前面分析得知，金苏大涧就是鹰愁涧原型，书中小白龙和民间传说中的小白龙又是同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就是从金苏大涧这里走向西天取经之路的。

当我将《金苏大涧与〈西游记〉》这篇文章介绍给周围的人听后，有的人便产生疑虑，认为《西游记》书中的鹰愁涧原型不一定是金苏大涧，也许是别的大涧呢。这一问题提得好，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云台山的其他山涧吧？如渔湾大涧，它的最大特点除有多处瀑布景观外，再就是涧底漫坡山岩，流淌着清凉的山泉，涧底积石稀少，构不成“千万个孔窍相通”现象。所以说此涧不能是鹰愁涧原型。另外南云台山的东磊大涧，此涧底有许许多多石块聚积，但大多是小石块，漫于水底，有时露出水面。另有地段大石聚积一处，但面积量很小，也构不成“千万个孔窍相通”现象，这里需要说明是，此山涧也是丫型山涧结构，但在丫型交汇处，地势平缓，涧容宽阔，涧内产生气流变异小，一般不会产生飞鸟伤亡现象。所以东磊大涧也不属于鹰愁涧型的山涧。

有人说，你刚才举了两个山涧情况，那看朝阳的山涧情况是怎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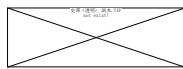
《西游记》中是这样描写朝阳地理环境的。在第二十二回开头，唐僧师徒“行过了八百黄凤岭，进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可以见得，在400年前《西游记》成书年代，虽然整个云台山在海中，而朝阳“却是平阳之地”。难怪今天人把这块地方叫朝阳，是否也吸收了《西游记》中“平阳之地”观点。既然那时的朝阳已是陆地，那么朝阳的山涧之水下山后，就没有“流归万顷烟波去”的景象了。因此，朝阳内的大小小山涧，也不属于鹰愁涧类型。

云台山的其他山涧就不一一例举了。

总之，各个山涧所处环境不一样，所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要找出于鹰愁涧相似或相同之处的山涧，需将你已知山涧特点分别和鹰愁涧对照。不能随意说某某山涧是，某某山涧不是。我们应积极挖掘西游文化，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金苏大涧之秘被揭开了。而金苏大涧在哪里呢？在连云港经济开发区中云乡金苏村的南云台山上。这里风光秀丽，山水清凉，是人们休闲旅游好去处。今天《西游记》中的取经五圣之一的白龙马在这里被揭示出来，大大增加了这里的西游文化内涵。加上原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再经过金苏人的努力开发，要不了多久，这里将焕然一新，吸引更多人来欣赏自然风光和品味西游文化，这里将成为我市西游文化继花果山之后，又一新的旅游热地。

（作者单位：开发区中云办事处）



李楨考(续)

※ 李正耀

李楨,字,维卿,安化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高平知县,征授御史。自走上仕途,前后二十七八年间,出任明万历时期的右、左佾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并摄事,最后在南京刑部尚书的岗位上,因病归于安化,卒、葬于今甘肃省庆城县十里坪公路东侧约30米处。

但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康熙海州志》、《朝阳镇志》均有“都察院副都御史”之职。但《明史》关于都察院这个整肃朝廷风纪的机构中,设的是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佾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而李楨仅任过右、左佾都御史。州、镇志所载,与史不符。

上述三志中,提到李楨与张元汴同榜进士。这里的“汴”应是“忭”。《明史》第1489页:“张元忭”,《二十五史·明书》第896页:“隆庆五年辛未策贡士邓以赞等四百人,赐张元忭……等及第。”

《康熙海州志》(下称《康熙志》),说李楨是“海州人”。而《李楨传》载明“安化人”,并未讲到有关他在海州的经历。一位友人说,他曾看到由台湾出版的《海州文献》中有人说李楨还曾在苏州阊门上学的事,笔者在韩李亦听到过此传言。这些事,是还非?笔者还是以事明理。

闻世于隆庆六年(1572)孟冬的《隆庆海州志》(以下简称《隆庆志》),没有李楨的只言片语,笔者在《李楨考》一文中,同样没弄清。现经数月耕耘,终于有了结果。原来《隆庆志》中有两篇文章给我指点了迷津,这就是《重修海州城记》和《城池》,都提到李维东,而且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海州古城城墙的修

筑。两篇文章一个说是“迨别驾李公署篆”,一个说是“署印通判……李维东”,上述之李公,文末点出就是李维东,而且是安化人。《光绪十年淮安府志》通判一栏,李维东系隆庆元年(1567)出任此职,而据《重修海州城记》一文交代,李维东是在隆庆五年之前,就已经在海州代理知州(署印或别驾署篆是一个意思)。一直到隆庆五年郑复亨就任海州知州。而隆庆五年恰好是李楨进士及第的年代。或许有人会说,李楨与李维东还能是什么关系,这不是拉郎配吗?笔者不是这种看法。他俩不是一般关系。因为李楨字维卿。维东,维卿,字辈相同。炎黄子孙,绝大多数是一姓一名,李维东就是一例。而有名又有字的,李楨字维卿是也。《颜字家训·风操》指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四书五经·礼记》指出:“男子二十冠而字,君父之前称名,他人之前则称字也。”意思是说,名只能由君王、长辈来叫,平辈或不熟悉的人只能称字,以表示对此人的尊敬。关于维东与维卿是弟兄的认识,还因为:他们同是安化人。明隆庆年间安化在陕西布政司庆阳府来说,是拥有32里(五户为邻,五邻为里)的一个县。李姓同姓而居,今天的朝阳镇,比比皆是,比如,张巷、张庄、刘巷、唐巷、李巷、孙巷、韩巷、曹巷等等,皆以姓氏冠巷名。我想,这是炎黄子孙的传统风俗。明朝也不例外。再如《周书·列传二·宇文导传》(详见154~158页)载:“导五子:广、亮、翼、椿、众。”他们的字分别是:“乾归”、“乾德”、“乾宜”、“乾寿”、“乾道”,都用“乾”字,这就是极好的证明。而且李维东是长,李维卿为次。原因很简单:当时,长的已是淮安府通判,次者刚才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笔者费了如此功夫，只证明二人的兄弟关系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呢？请允笔者——道来。

《明史·选举》对科举考试之政策中，有“依亲”制。意思说，品官子弟要想当官，必须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三年大考，“乡试”，中为举人，“会试”，中为状元，……若家有朝廷一至七品的官员，子弟可以投靠之。“依亲者，回籍读书”。这种政策，对于李楨而言，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兄弟情同手足，互相提携理所当然。所以，李楨完全可以在安化读书，在隆庆五年春由安化直接去京师参加会试，身份则是以海州人入试。进士及第即“除高平知县征授御史。”并非如镇志所言，1573年还在海州，上述已经阐明。李楨从始至终就不在海州。所以也就谈不上离开海州的情况。否则，身为知海州的郑复亨，组织了“易君仕，沈君廷臣，县学博于君榘、暨州之博士子弟员十人”并“爰请乡先达、光禄裴公（天佑）为《隆庆海州志》稍加增饰”，说明《隆庆志》资料不仅涵盖了张峰的资料，也有整个隆庆年间的史料，比如隆庆六年的“岁贡”、“韩守约”，同年孟冬《重修海州城记》均载于志，唯独没有李楨。这只能用当时信息闭塞来解释，否则，李楨真是海州人，偏僻角落出了进士，还不是锣鼓喧天，喜报上门，家喻户晓。而结果是，知州、易、沈、于及州子弟十余人，裴天佑等在州志上不反映李楨，岂不是贻笑大方了。

斗转星移近百年，《康熙志》问世了。时为知州的毕秀，又在《隆庆志》的基础上，搜集了明朝天启甲子岁（1624年）（此时的朝廷文献中有了海州人李楨）清朝顺治戊戌（1658年）、顺治庚子（公元1660年及随后10年的资料，编纂的《康熙志》才第一次有了李楨的点滴材料，而且出现了“都察院副都御史”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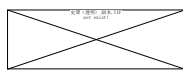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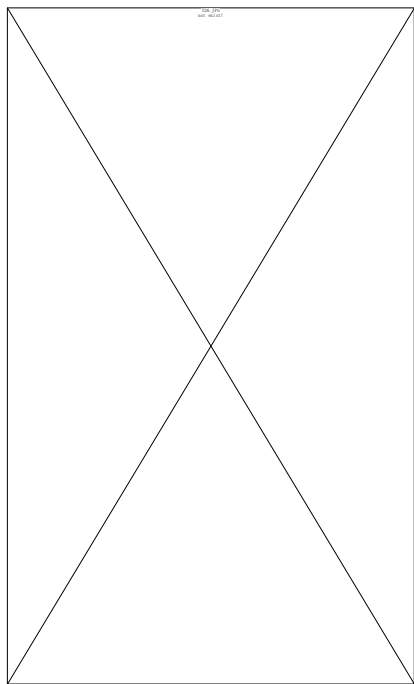
关于来自庆阳市庆城县博物馆以及庆城镇十里坪村的史料，笔者虽在《李楨考》一文中有所交代。但是交代的还不够清楚，甚至也有不当之处，除向读者致歉外，想再进一步交代明白，并将错误改正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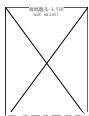
经过再次电话交流，李楨的墓制情况是：墓前神道两侧分别设有翁仲（石人）、石狮各一；石坊三间；石虎、石羊、石鸭各一。（《李楨考》讲石人四，错了）石坊额题：“帝臣封兆”，“诰封谕祭文碑”、石柱二，“工部奉旨营建”。碑高八尺，宽（广）三尺，厚五寸。碑文：“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刑部尚书前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佾都御史克庵李公神道。万历二十八年正书”。（《李楨考》一文中“大明”二字多余，“副”应为“佾”）庆阳的史料是否符合明朝的有关規制？我们从李楨传知道，他“不俟报径归”而被去职。但该传中提到“大学士叶向高言：‘楨实病，不可深责’”，《明史》又指出：“凡致仕养病终养听用等官，祭葬俱与现任官同”。因此，李楨“质直方刚”，虽然帝怒而去其职，但其鸣不平的大臣们还是上疏神宗，为他举行了品官应该享有的待遇。《明史·卷六十·志第三十六·礼十四·赐谥》中曰：“亲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同”。李楨的号：“克庵”出现在“帝臣封兆”“诰封谕祭文碑”的神道碑上，这实际上就是

神宗皇帝对李楨的赐谥。以表彰李楨仕途二十七八年来，“行业俱优”，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甘于清贫的高风亮节。《明书》指出：“一品至五品与诰”，李楨有“诰”。即“诰封谕祭文碑”。《明书·职官志·定制文武则例》中指出：朝廷官员有公、侯、伯爵，有号之别，还有阶，在阶的规定中，“一品至九品，文（官）皆称大夫”，“凡正一品，分初授、升授，为特进荣禄；特进光禄。从一品，除特进二字。”此文进一步证明朝阳韩李村大李巷的李楨碑文中的“荣禄大夫”于史无据。“其二品以下，分初授、升授、加授，文为资善、资政、资德”。《职官志·定制文职》之赠官“太子少保”正二品。史书反映的方方面面，可以充分地反映出庆城县方面的馆藏的墓制史料，即神道碑上的文字、与历史上的李楨完全合辙的。

《明史·礼十四·碑碣》一文指出：“文武大臣薨逝”，“立神道碑”“五品以上用碑龟螭首”，“功臣歿后封王者”，“碑高九尺，广（宽）三尺六寸”，其高广按官的品级分别“递杀”五寸、二寸。“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李楨墓前神道上的情况与史书之規制亦基本相合。这更说明庆城的馆藏史料价值更高，其真实毋庸置疑。

《明史·礼十四》还指出，“墓中应有志石两片。其一片盖，上书某墓；一为底，书姓名、乡里、三代、生卒以及下葬年月日、子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等内容，二石相向，铁束埋墓中”。“三品以上”官员“袭衣三”，“棺槨，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槨用土杉”。然而，李楨的墓、碑、神道的被毁，如今什么也见不到了。真让人扼腕痛惜。





港城历史名人(九)

※ 本刊编辑部

符竹庭

符竹庭(1912—1943),江西省广昌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参加红军,并转为中共党员。

1929年后,历任中央红军独立二团大队政委、红三军第七师特务团政委、七师二十一团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和平型关大战。

1939年秋,符竹庭与肖华等率部转入鲁西,与杨勇、肖华一起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符竹庭率部转入鲁南,任一一五师教导三旅政治部主任;年底,调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委员,兼鲁南区党委书记。1941年春,符竹庭率教导二旅进入山东滨海地区;3月,率教导二旅及山东纵队二旅一部,成功他发动了青口奔袭战,建立了滨海抗日根据地。1943年1月,符竹庭与曾国华率教导二旅,攻克日寇在鲁南的重要据点郯城,彻底粉碎日寇对我滨海区的扫荡。1942年4月,符竹庭任滨海军区政委、滨海区党委书记。11月19日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符竹庭与陈士榘率部攻克赣榆县城,获赣榆战斗大捷。

赣榆城被攻克后,我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赣榆县西北部山区,符竹庭于11月26日晨,在马旦头村南遭敌人伏击偷袭,壮烈牺牲,年仅31岁。符竹庭牺牲后,遗体安葬于赣榆县抗日山(马鞍山)烈士陵园。为纪念符竹庭,1945—1950年赣榆县曾改名竹庭县。

汤曙红

汤曙红(1915—1939),原名宜秀,灌南县汤沟镇人。1929至1933年,先后就读于淮安中学、上海正风中学和东海师范。

1933年秋,汤曙红回到家乡,在汤沟小学任教。在他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抗日读书会,组织校内外青少年100多人,阅读进步报刊。他们还走上街头,大唱抗日歌曲,演讲抗日道理。1937年10月,汤曙红创办了汤沟剧团,自任团长,先后排演过《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春,汤曙红在家乡发动民众1000多人,成立汤沟乡民众抗日武装自卫队,任队长。8月,经乡民选举,当选为汤沟乡乡长。

1939年3月,汤曙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沭阳县委军事部长。3月底,东(海)灌(云)沭(阳)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汤曙红任总指挥。4月,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汤曙红被任命为团长。7月5日,汤曙红率领三团战士,在盐河、涵养河的交汇处五里槐,伏击日本侵略军,歼敌多人,击沉击翻日军汽艇、木船多艘。紧接着,汤曙红又带领精干小分队10多人,奇袭土匪头子贾锡福的巢穴孙二庄,击毙贾锡福及其部下匪徒共37人,缴获大盖枪

10多枝,子弹两箱,为灌东人民除了一害。为了团结抗日,7月17日傍晚,汤曙红只身前往汤沟乡公所,和国民党沭阳县常备大队长王绪五谈判,被王部小队队长周法乾杀害,时年24岁。

陈伟达

陈伟达(1916—1990年),原名王金纬,又叫王经纬,灌云县宁海乡清河村人。他先后就读于响水口第五小学、灌云县板浦初级中学、东海中学高中部(即海州师范学校前身),1935年,考取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在此间,他积极参加并领导进步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上海领导人之一。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间,被派到江北工作,历任中共江北特委委员、如西县工委书记、苏中第四地委副书记等。1945年初,担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先后担任新四军一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1948年4月后,担任第六纵队十七师、第二十四军七十一师政委。

浙江解放后,他先在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为党委成员和公安部长。先后担任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务。是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丁文斋

丁文斋(1922—1996),原名丁五和,出生于灌云县板浦镇。

1940年冬,他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海县委负责人宋云龙的警卫员、东海县大队警卫团排长,新四军第三师连长、第三十九军一一师炮兵团团长。1950年11月,奉命赴朝作战。归国后,从第三十九军调到炮兵一三三师工作,历任师参谋长、师长,吉林省军区国防工办主任和党委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陈学春

陈学春(1943—1997),出生于灌云县白蚬乡合兴村,1964年10月入党。1961年4月应征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坦克第三三〇团坦克营二连排长,第二〇〇师坦克三三〇团司令部参谋,坦克第八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第三十一团三营营长、团作训科科长、坦克第三十团副团长,第四十六军司令部装甲兵处处长、坦克第八师副师长,第二十六集团军坦克旅旅长、坦克第十一师师长。1994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中国共产党名称和建党方案的最早提出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天津交换建党意见,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后称“南陈北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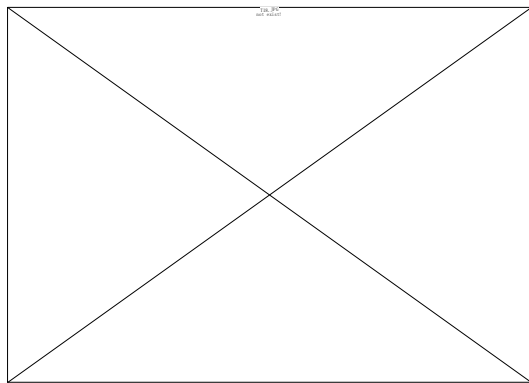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等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随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相继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担负着筹建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7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讨论新民学会方针时,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可有的同志则提出不同意见,蔡和森将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于8月13日、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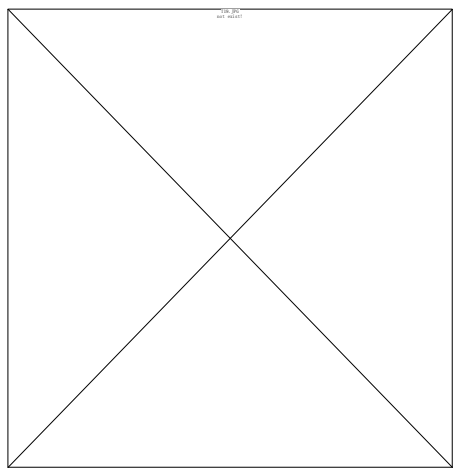
1920年12月、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回信,专门讨论了建党问题。通信内容涉及党的名称、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原则、入党条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蔡和森提出“中国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党”,指出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4种利器”。强调

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还提出革命出发点是唯物史观,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方法是阶级战争加阶级专政,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还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主张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板浦曾经“城”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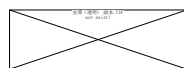
※ 俞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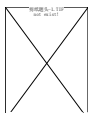


2004年,笔者受托主修《灌西盐场志》,无意中发现一封半个世纪前板浦写给灌西盐场赵股长的介绍信。信纸约18厘米见方,纸质较薄,钢笔书写。从字体看出开具者文化不高,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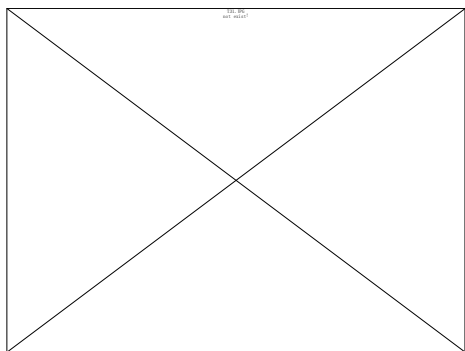
除落款,紧要处还加盖两处印鉴。此信大体内容:工人张开祥曾在灌西盐场因工负伤,现介绍前去领取残废抚恤金玉米1400斤。吸引我眼球的是此前闻所未闻的落款及朱红印鉴“灌云县板浦城城工会”。板浦是我故乡,据以往所知,板浦在建国初几年一度为灌云县城所在地,建制先后为区、镇,从没听说过称之为“城”的,查阅《灌云县志》、《板浦春秋》均无此记载。但白纸红印,决不是空穴来风。三年来我多方查询,后经县政协常委、板中校友孙志俊先生及吕达阶先生的热心帮助,终从板浦老居委会干部项长柏处得到证明,板浦确实在1952年建制为“城”,但时间不长,大约半年左右。城在县领导之下,而城工会属城一个工作部门,负责工人工作。问及审批机关及是否还有伊山城、杨集城等,答曰“不知”。

(作者单位:灌云县关工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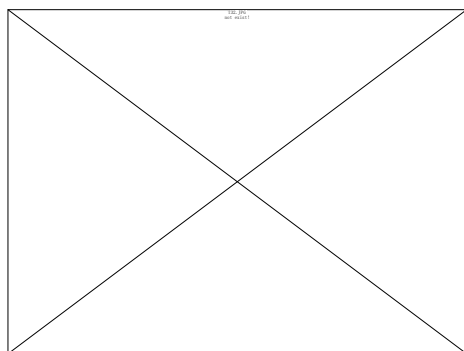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来我市调研



6月15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来我市调研。调研期间,李忠杰副主任亲切地看望了我市市县党史系统工作人员,对我市的党史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讲话中指出,党史工作很辛苦,党史工作者要有甘于清贫的精神,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扎实做好党史的征编研工作。党史工作的内容很丰富,基本工作是研究,但不能只限于研究,

而是在研究基础上,把宣传、资料征集、人物的研究、纪念活动等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党史是资源,做好党史工作对现实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忠杰副主任最后强调,新时期党史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党史工作者要抓住机遇,做好本职工作,以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回报党和人民。

(连史宣)



我市开展系列活动 隆重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 颁布实施一周年

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值《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市地方志办公室精心策划,扎实开展系列活动,隆重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

《地方志工作条例》,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内人流量最大的商业步行街——陇海步行街设置大型拱形门及气球,在市区主要干道设置过街宣传横幅,宣传《地方志工作条例》。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市地方志办公室携《连云港市志》和《连云港年鉴》100余家编纂成员单位在《连云港日报》刊发公益性广告,在市行政中心大厅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祝贺标语,营造浓厚氛围。该办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市机关干部点击率最高的网站“机关家园网”设置宣传专栏,内设《地方志工作条例》全文、《连云港市地方志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连云港市地方志工作主要成果等。同时,在机关刊物《连云港史谭》开设“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专栏,刊发学习文章。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地方志工

召开座谈会、学习培训会, 深入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为此,市地方志办公室专门组织市内地方志系统的专家、学者和部门分管领导进行座谈讨论,大家以《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切入点,畅谈我市地方志事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市电视台还制作了专题访谈节目在《直播连云港》中播放。为了让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更加深入地理解《地方志工作条例》,在即将召开的全市续修志培训会上,将对全市续修志人员进行专题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培训。

(连史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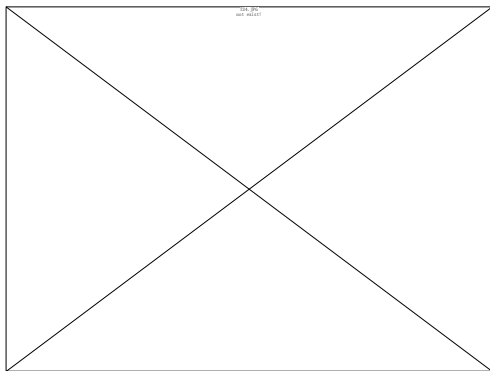




我市组织业务骨干参加 全省地方志专业人员业务培训

为了进一步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素质,更好地推进二轮修志工作,6月12日至15日,我市组织全市各县区修志业务骨干17人参加全省地方志专业人员业务培训班。在为期4天的培训中,南京大学的伍贻业教授讲授了《古代方志史述略》,扬州大学的许卫平教授讲授了《近代方志编修的发展创变及传统志书续修方略对第二轮修志的启示》,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专家则从微观操作层面系统讲授了关于修志工作中资料的搜集整理、方志编纂的步骤和方法、方志的体例和篇目、专业志的编写、市县志中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等内容。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及时记录,积极讨论,并与专家学者进行了个别交流。在培训中,大家还积极与兄弟市县的同仁进行了沟通、研讨,及时了解全省各地在二轮修志过程中的好的做法和体会。

(连史宣)



东海县委党史工办编纂出版 纪念安峰山事件60周年文集

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日前,东海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纪念》。东海县委书记郑平同志为

今年
是安峰山
事件60
周年,为

书作序并作了“继承先烈遗志,建设美好东海”的题词。该书以大量的篇幅和翔实的资料反映了当年广大军民英勇反合击的光辉历史,讴歌了革命烈士英勇不屈的崇高风范,歌颂了军民一家、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是该县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东海县委党史工办 王文岩供稿)

新浦区地志办深入基层 督察《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及二轮修志进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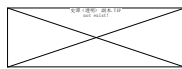
新浦区地方志办公室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下称《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为契机,组织人力,深入有二轮修志任务的各基层单位,督察学习《条例》情况和推广基层修志工作经验。

5月15日至17日,区志办副主编孙寿鹏等三位志办人员,到区检察院、教育局、城管局、粮食局等12个单位,督察学习《条例》、落实区《新一轮修志工作分段安排》情况。通过督察发现,各单位都能以集中学习、自学、写心得体会、发布信息等形式学习《条例》,基层编修人员依法修志意识不断提高,均能做到以《条例》为依据开展工作,各有特色,创造了许多基层修志的工作经验。

区城管局落实“五到位”,明确一位副局长专抓,安排两名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干部撰稿,下属各队均有资料员,形成上通下达的修志网络。区教育局、粮食局反复修改分志初稿,找资料补缺。区检察院将已收录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用于布置院史荣誉室,并制成音像资料。区志办督察人员现场参观了该院院史荣誉室,观看了音像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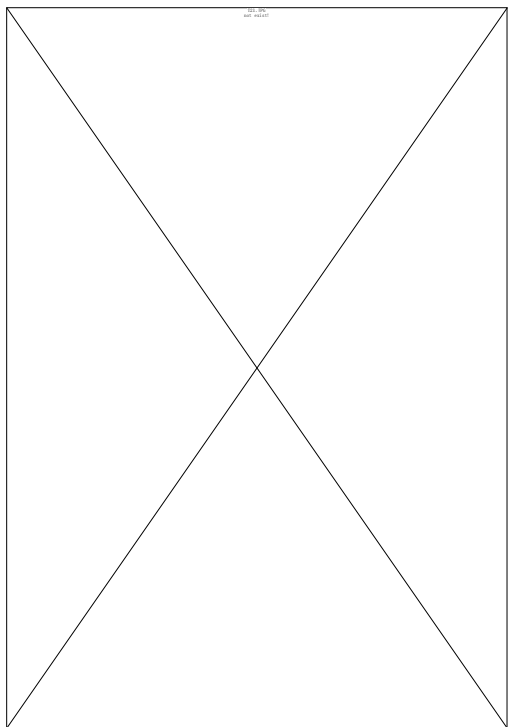
通过督察,全面了解了全区各单位的《条例》学习情况和修志进度,区志办及时将督察情况通报全区,并建议区目标管理办公室将二轮修志工作列入对各单位的年度考核。

(新浦区地志办 徐一德供稿)



卧游太白涧

※ 张树庄



王仲廉校长 1988 年留影,陈明树供稿

静。涧中有一块“太白石”，横卧涧心，涧水从石下流出，叮叮咚咚，如龙口喷泉；涧左有一巨石，上面刻有张学瀚于光绪末年刻的《红叶山房》诗六首，并有诗序及四位石工的名字，计四百五十字左右。正楷工书，齐整丰腴。太白石上有“太白石”三个大字，基本完好。“相传李太白饮酒于此”，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五岳寻仙不嫌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来说，云台山对他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怪不得李白有《哭晁卿衡》“白云愁色满苍梧”的诗句呢！

但是每次太白涧归来，兴奋、满足之余，总有一些遗憾，那就是没有看完，没有看透。2007 年朝阳镇编写《朝阳镇志》的原班人马在镇志出版以后，又开始《连云港朝阳景区旅游文化史丛》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套丛书共六本：太白涧、娘娘庙、新县古城、石观音、白龙潭、吕母崮。前两天几位老人送来了他们的新作，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太白涧》，让我先睹为快！

该书的封面，即太白涧中的一景，李白觞月的汉白玉石刻，生动鲜活，晶莹洁净，后面衬以红桃绿柳，翘虬虬松，把人带到朝阳风景区的最佳处——太白涧。我轻轻翻开，细细读来，风光秀丽的太白涧又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卧游了一番，温习了一下。书中写的那些景点，我曾到过的地方，读来倍感亲切；那些未去的地方，甚至还不知道的地方读来令人惊奇、向往！细读文字，随着作者的描写，我的卧游也开始了，太白涧那美丽的风光，像过电影似的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太白石、太白酒店、乌龙潭、千亩桃园等相继展开。而传说故事、诗词典故在作者畅达的文字中，不时显耀出来，平添了卧游的情趣。然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我还没有去过，也没有听说过的景点，像“神石奇洞鬼门关”、还阳洞、镜子石、北海观音寺遗址、雾崖石城、红鹤岩、红鹤林、彭家园及彭祖的传说等，更让人向往并陶醉其间。

该书由李正扬、张义壮、胡维仁等同志编写而成，他们为弄清景点胜迹的具体位置与现状，曾四次爬山越岭，攀崖过涧，摄影拍照，掌握第一手材料并根据实际情况多次修改文稿。初稿完成后，又连续十多次座谈讨论，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六易其稿，终于成书。该书文辞畅达，情满笔端，充满对家乡山水人物的热爱之情。有叙写，有描述，有咏叹，有议论，并且图文并茂，除封面外，书中还有 25 幅图照。读读文字，看看照片，平添了无限情趣，不失为一本介绍旅游景点的好书！

(作者单位:连云港地区地志办)

朝阳的太白涧，我曾多次游览过。那葱茏的山色，清澈的溪水，丰富的传说，珍奇的史迹，无不让人留连，让人感叹。1984 年夏天，我第一次游览太白涧。时骄阳似火，我与张义壮兄顺着山间小道，踏着涧边青石，溯流而上，寻幽探奇。从新县往南，上行约 3 里，便到乌龙潭。乌龙潭瀑布喷激奔腾，隐隐若雷；潭水清澈，玉女峰倒映水中，倩影婀娜。潭旁有新县诗人张学瀚 1907 年题刻的《题龙潭飞瀑》诗，有句云“行人半山凉似雨，不妨依树听流泉”，正是此情此景。从乌龙潭向上再东行二百多公尺，即到小乌龙潭。潭在大雾崖前，玉女峰下，石门对峙，水急潭深，是旅游避暑的好去处。《云台导游诗钞》上曾有四首五绝描写这里的四时风光：春来“水落游鱼少，山深啼鸟多”；夏到“涧险泉流壮，崖高水怒鸣”；秋临“半林霜落后，黄叶满溪桥”；冬至“西风吹谷口，梅放满寒溪。”

从小乌龙潭再上行，就是太白涧了，传说李白游海上，曾在此饮酒。涧距新县约四里，危崖壁立，怪石森严，十分幽僻清





中共党史上的书记处

※ 李海文

我党成立 80 多年来,中央机构几经变化。最初,中央只设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后来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到上世纪 30 年代,中央设立了书记处,1966 年 8 月停止工作。1980 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那么中央书记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与中央政治局是什么关系?这要先了解我党中央机构的变化,这个变化与党的发展紧密相关。

以古时职级很低的“书记”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称谓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只有 50 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中央只设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 87 页)。“书记”在古时指官府中主管文书工作的人员,职级很低。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委员长或总书记“总理各级党务”,既是决策机关,也负责日常工作。

党的五大首次将决策机关与日常工作机关分开

1927 年 5 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夜召开五大时,我党发展为 5 万多人,成了一个政党。中央机关仅有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地领导全党。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将决策机关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第一次分为两个机构。大会通过的党章对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职责做了规定:政治局是决策机关,常委处理日常工作,总书记是常委之一,既领导决策机关也领导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

不久,中共中央搬到上海,常委分散在各地领导斗争,因严重的白色恐怖,不能自由来往于上海。11 月中央成立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主任先是罗亦农,后是周恩来。这与当时苏联联共(布)的机构分有政治局、组织局是一致的。组织局的职权同后来成立的书记处的职权是一样的。

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沿用五大的惯例,仍是政治局决策,常委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常委中选举总书记一人。随着全国各个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常委分散到各个根据地担任第一把手。此时,各个根据地均受到敌人的包围、“围剿”,难以召开常委会,党中央领导力量显得有些薄弱。

初设中央书记处的确切时间,尚待进一步查考

1931 年 6 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很快叛变。因白色恐怖,党中央几次身处险境,领导人员几经变化。1933 年初,党

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各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 30 万人,党员也达 30 万人。仅一个总书记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中央书记处成立的确切时间,目前尚无法查考清楚。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因将装文件的担子挑错了,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都留在了苏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敌人大肆“围剿”,根据地丢失,环境险恶,项英下令将中央留下的文件全部烧毁,不留片纸。按理说,共产国际的档案会保存着书记处成立时间的根据。从建党到 1934 年 6 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电讯联系,共产国际会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给国际的报告。但这部分档案现在尚未公开。

现在能见到的材料最早是 1934 年召开的五中全会,当时选举的中央书记处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这是从这些同志填的干部表格中佐证出的。见诸文件的是,1935 年 1 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中有:“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由此可见,书记处最晚在五中全会时成立。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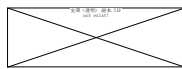
既然书记处不止一个人,那么就应有一个总书记。遵义会议前是博古,遵义会议后是张闻天。长征到延安之后,书记处权力比较大了。1943 年 3 月,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用的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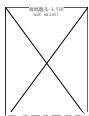
虽然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不断变动,但是这个机构一直存在。

毛泽东一直认为,七大选出的书记处最得力,得心应手

1945 年 4 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了书记处。党章还规定设主席:“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年毛泽东 52 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既领导决策,又亲自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

大会结束后,政治局委员分散在全国各地领导战争和建设,工作繁重,不能经常到党中央所在地开会。七大选举的书记处成员有 5 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基本都住在一起(或在延安,或在西柏坡,或在北京),只有 1947 年春到 1948 年春一年的时间里分为两地。他们经常在





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是,是党中央的中枢,人们称他们为“五大书记”。五大书记统管,非常得力,保证了战争的迅速胜利。毛泽东一直认为,七大选出的书记处最得力,得心应手。

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

1956年9月召开八大。八大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这样一个大国,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此时的总书记与五大时不同,五大时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而八大时最高领导是党中央主席。

八大党章对主席、副主席的规定与七大不同,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七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真正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毛泽东这样安排自有道理,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就是跑跑龙套工作的。他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起初不愿当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党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多位。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有一次召集秘书长会议,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不愿意做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所说“不顺”,一是和刘少奇不顺。刘是副主席,是接班人。二是和周恩来不顺。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岁,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的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他明确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做工作之后,小平接受了。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即52岁,和毛泽东在开七大时的年龄一样。书记处成员没有像毛泽东预想的那么多,仅有10个人。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书记处的同志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还灵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据查,副主席只有周恩来经常出席书记处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的同志消息更灵通。

书记处成员中,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从1956年到“文革”前夕,书记处人员几经变化,有出有进,后来又增补了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副总理罗瑞卿,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叶剑英元帅。从这张名单可看出书记处之重要。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中央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王稼祥、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谭震林、康生、陶铸、李雪峰。候补书记是刘澜涛、胡乔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很快就停止工作。

1980年,根据邓小平提议,重新设立书记处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虽然书记处增补了谢富治、刘宁一两位,但是因邓小平受到批评,书记处很快就停止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已有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的趋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如康生、陈伯达等,各中央局派一副书记或常委参加。李雪峰等书记处成员都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能毛泽东已估计到中央书记处将不再工作。那么,书记处的这些同志放在哪儿呢?进入政治局。于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谭震林、陶铸、叶剑英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过了14年,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邓小平提议,会议“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从此,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仍是决策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